

校内外右派言論匯集

(內部參考)

北京大学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印

一九五七年八月

編 者 的 話

自大鳴大放以來，牛鬼蛇神——右派份子充分显露了頭角。為了便於人們認識他們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醜惡反動的本質，特將他們在報章、刊物和大字報、油印報上的一部份言論匯編成集，作為進行社會主义思想教育的反面材料。

在這些右派份子中，有些是社會上臭名遠揚的人物，我們不必介紹了；屬於校內的，有“百花學社”和“廣場”等反動小集團比較出頭出腦的人物，如譚天榮、張元勳和謀士叶子瀅之流，有煽動反革命暴亂的匿名宣言作者錢如平（即“談論”，已逮捕），有叛黨份子龍英華等等，有煽動學生鬧事的頭目西語系講師黃繼忠，也有為章羅聯盟在經濟學界草擬綱領、招兵買馬的干將經濟系教授陳振漢，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他們都自命是“有頭腦的人”，但這些材料表明，他們的頭腦不過只会販賣些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罷了。毒草被鋤過後有肥田之效，這些反動思想被批判過後，也會有提高我們革命覺悟的作用。

1957年8月

目 录

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对反右派斗争的污蔑

烏“畫”嘴	徐仲年 (1)
如此伎倆	陳奉孝 (3)
第四株毒草	譚天榮 (4)
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譚天榮 (7)
是时候了	張元勳 (8)
論“五一九”阶段馬克思主義的啓蒙运动	沈澤宜 (9) 龍英華 (9)

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对用阶级立场看問題

我認為阶级分析方法已經過时了	張祖榮 (15)
关于人性和阶级性	譚天榮 (16)

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否認和污蔑三大改造、三大运动成績

关于成立“平反委員會”的發言	羅隆基 (18)
肅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	汪長鳳 (20)
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获的收入	章乃器 (20)
重申贖买廿年的主張	李康年 (22)
为什么还要把阶级关系和兩面性抓住不变	畢鳴岐 (26)
怎样看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學習什么？	吳金萃 (32)
加強党对非党知識分子的团结	羅隆基 (38)
三个問題	徐中玉 (42)
对經過几陣“暴風雨”的看法	陳新桂 (47)
白毛女申冤	劉奇弟 (48)
胡風絕不是反革命	劉奇弟 (50)
肅反問題	張錫鋗 (51)
肅反运动論綱——与党委前書記史夢蘭商榷	江 文 (52)

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否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

馬哲民的反社会主义言論	馬哲民 (54)
党已經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	王德周 (56)
在西語系英法教研室座談会的發言	胡豫胎 (57)
在二次西語全系教師会上的發言	胡豫胎 (58)

五、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

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章伯钧 (60)
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黄绍竑 (62)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 (64)
“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	葛佩琦 (65)
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民盟中央纲领)	曾昭倫 (66)
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	叶笃义 (70)
关于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的发言	费孝通 (71)
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 (第一稿, 第二稿)	陈振汉等 (74)
在经济科学座谈会上的二次发言	陈振汉 (87)
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人民	刘地生 (90)
群众要推翻共产党	葛佩琦 (91)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萧乾 (91)
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停留在 1895 年的地方	雷海宗 (96)
才与德	施蛰存 (98)
一株毒草	谭天荣 (99)
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谭天荣 (100)
几句人情话	谭天荣 (103)
自由主义者宣言	严仲强 (104)
谈党的领导	王存心 (106)
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气三一羣同学 (106)
宗派主义的鼻祖, 官僚主义的根基——驳党的领导不能分割	蒋兴仁 (108)
党天下	蒋兴仁 (109)
1. 墓志铭 2. 人之歌	张元勳 (110) 沈泽宜
世界何处去, 中国何去处, 北大何处去	龙英华 (122)
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	黄繼忠 (125)
新“九品”释	朱承立 (129)
关于社会学, 說几句話 第三节	费孝通 (129)

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人民民主專政

无产阶级專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	陈新荣 (132)
宪法有的被破坏, 有的有名無实	顧执中 (133)
論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麗卓恒 (134)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江文 (150) 陈爱文

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 林希銘 (115)

論人事檔案制度——請教严仁慶校長助理并致国务院 江文 (154)

七、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對民主集中制

剷草要除根 趙超南 (156)

三害根源 張錫鋐 (157)

論現行選舉方式的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實行——要求民主選舉學生會 蔣興仁 (159)

反正一樣——再論現行選舉方式的虛偽性 蔣興仁 (161)

我看民主 叶子生 (162)

八、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蘇的謬論

反蘇謬論 龍云 (164)

九、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個人主義的謬論

利己主義原理 王存仁 (165)

利己主義者宣言 氣三一羣同學 (172)

十、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自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謬論

這是为了反對三害 譚天榮 (174)

論美國民主和我國現行民主比較優越性 蔣興仁 (175)

人民日報為廣大人民服務還是為個別統治者服務——論宣傳工具的傾向性 蔣興仁 (176)

有頭腦的人不能那樣想 王國鄉 (177)

十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絕對平均主義的謬論

我對目前局勢的看法 周大黨 (179)

論階級的發展 論 論 (182)

再論階級的發展 論 論 (183)

談談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 論 論 (187)

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右派反動哲論

參考資料索引 (190)

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反右派斗争的污蔑

烏 “畫” 啼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徐仲年

烏鳳和鳴

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鳳鳴”与“烏鳴”的問題。“鳳鳴”指的是“报喜”，“烏鳴”指的是“报憂”。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鳳鳴要听，烏鳴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烏鵲叫，当烏鳴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烏鵲固然没法再鳴，可是連鳳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烏鵲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我没有在这个問題上用过考証功夫，因此作不出結論。不过可以肯定：①烏鵲是益鳥，——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鳥；②古人以为烏鵲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題要解”中关于“烏夜啼”的解釋）。

一般人以为鳳凰是很美丽的鳥，其实不然！它是：“麟前鹿后，蛇頸魚尾，龍文龟背，燕領鷄喙，五色备举”（“說文”），实在沒有什么好看！何况还有假鳳凰，为数相当的多！

因此对于鳳凰和烏鵲的估价，应当辯証地看。能够烏鳳和鳴，那是最好的好事！

我摹仿“烏夜啼”，作“烏畫啼”。

是否提防獵人的槍？不在考慮之內！

毛毛雨下个不停

和風細雨……

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时候，用不到大張旗鼓，只須和風細雨就够了。

在原則上，这是对的。

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該以不变应万变！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爛，棉不結鈴。田初湿时是軟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紛紛”，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

而淫雨一半載，老百姓就得餓死不少！

和風細雨自有他的妙處，但迅雷烈風也有扫蕩陰霾之功！某些時候，錯誤嚴重，態度頑強：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風了；在這種情況下，和風細雨不足以息民憤！

尤其不希望對自己和風細雨，對人迅雷烈風；對黨外人士要求自我批評，對黨內人士則要求批評別人！

我聽了許多代表所反映的內容，有些事真令人髮指！小民主解決小偏差，大錯誤就得用大民主來糾正，正如對症下藥，有些病該用霸藥來治。

小論帶坑臭

有那麼一種說法：舊知識分子在舊社會里生活久了，難免有股“帶坑臭”！話是對的。

但是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據我所知道，共產黨黨員不是從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煉出來的，確確實實也是從舊社會中來的：那麼，在他們的身上，難道就沒有一絲一毫的臭氣？

有人說：“他們早就參加了革命，不論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們身上的臭氣早已拍掉了：這就叫做‘發展觀點’！”

我回答道：“承教了！發展觀點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據我所了解，所謂‘發展’有‘縱’的發展（時間上的發展）和‘橫’的發展（空間上的發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帶坑臭”這頂帽子只望舊知識分子的頭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運動中，對於知識分子的‘評定’都是斷章取義，不問發展，不問聯繫，——要不然只追究‘壞的’聯繫，——這樣就造成了：我發展，你不發展的嚴重偏差！於是高牆聳立起來了，嗚呼！”

（原載6月18日文匯報，本報略有刪節）

如 此 技 倆

自从我校反右派开始以来，保守派为了挽回他們已經破产了的名誉，为了挽回他們在羣众中的“威信”，竟不惜採取造謠誹謗破坏別人名誉进行惡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羣众的目的。

第一，保守派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宣布了广場是反动刊物，他們明明知道这样做在北大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他們仍然不惜採取这种手段来欺骗外校同学，打击北大的民主运动，造成外校同学对北大民运动的疑惧和仇恨。

第二、保守派拼命制造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莫須有的罪名加在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头上，好像只有他們才是代表党和社会主义似的，利用所謂批判会的手段来威胁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並爭取羣众。

第三，他們利用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惡毒的人身攻击，破坏别人名誉，把人家說成是小丑，坏蛋，流氓和打手，以便造成羣众对这些人的怀疑和仇恨，从而孤立他們。

第四、虽然保守派利用了上面的手段，但他們也还很清楚，还有有許多人支持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大多数的同学对保守派还有怀疑态度，因此根据前車之鑒，他們还有最后一張王牌，那就是他們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社”和“广場”編輯部中找出一个所謂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来，他們現在正在对某些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逼問，搞得他們思想混乱用威胁的手段逼他們承認所謂反社会主义罪行，並找出这次运动中的組織者进行逮捕和法办，这样他們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說“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場”是反动刊物，你們不是不信呀！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

同學們不信請等着看吧！这样手段保守派迟早会施出来。最后，我們必須申明：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組織者，我發起創立了自由論壇，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場”編輯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因为我認為“三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現象，要根除它必須依靠羣众力量，所謂小集团在根除，“三害”中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保守派們，我是这次运动的組織者，你們对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么請你們来找我吧，我知道你們会用捏造和無穷的推論的方法給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願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們不必再折磨那些無辜的人，同时，我公开要求那些跟我接触过的人不必再顧什么情面，把你們所了解我的一切言行全部講出来好啦！我絕不会怪誰。

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人（不管是誰）願意共同跟我把問題搞清楚那么

我歡迎，如果有人要做什么坦白交待那絕對办不到！保守派們！你們不是掌握着
权利机关嗎？那麼，你們現在就用吧！不必再用所謂批判會的手段來欺騙群众了。

保守派們！雖然看來他們勝利了，但是你們曉得嗎？五一九的火種已經播下了，它遲早會變成燎原大火把你們燒盡的。

陳奉孝 7.5

第四株毒草

物四 謝天榮

五一九運動結束了。

從北大的民主空氣最活躍的那一天（江隆基語）開始的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結束了，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將又是欺凌與忍耐壓服與屈從叫嚷與沉默的相互滲透。總之，彷彿向五一九以前的階段的複雜，為此“勝利者”江隆基作了一個“初步總結”得到了不少的掌聲與此相應，另外還有些人不同意，作為一個“右派份子”我願意以我自己的方式對這次運動作一些片斷的判決。

（一）“五一九”是一個光輝的日子，在國際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中國青年第一次顯示了自己的力量，看來是那麼強大的習慣勢力在他們面前表現了多麼可怕的貧乏與卑劣呵——習慣勢力的代表們在他們真理與正義的呼聲面前，難道比老鼠在貓前更勇敢嗎？他們在理性與法制的呼聲中，難道比魚在空气中更有生命嗎？他們在民主與自由呼聲之下，難道比冰雪在太陽照耀之下更堅強嗎？可是看看，我們“右派份子”吧！大字報中激動人心的語句辯論會上鋼鐵般的邏輯力量，實際工作中那種中國式的刻苦耐勞，鬥爭會上，面臨凌辱的從容的風度。以及在他們個人獨處時平靜的心靈，哪來的這樣蓬勃的生氣呀！哪來的這種永遠不枯竭的精力呀！還有比這種無地的靈魂天真，這種隨時地創造奇蹟的信心，這對於一切事物——即使它是難苦的——的愛好更美妙的東西嗎！然而按照生活的意志，他們暫時地退却了，如果把凡是受批判的人都算作“右派分子”，那麼，他們的表現遠不一致的，他們的遭遇也不一樣。

在他們面前既不是噴射死亡的機槍，也不是各式各樣的法官，這是一種別有風趣的考驗，他們面臨着的是對邏輯施以暴力的批判，拙劣的捏造下流的人身攻擊，還有那些正直的輕信者的反對和來自外面的敵人別有用心的舉場。

對於這些西臨決戰的戰士，這是一次必經的考驗，生活就是這樣地挑選着它所需要的人。

有些人在运动中受尽了迫害，可是却为自己赢得了平静与骄傲，却避免了损失。

有些人饱尝虚荣心，被蹂躏的痛楚，孤独的折磨，为自己的名声和出路而坐立不安，可以留下的，只是被生活遗弃后，那特殊的帳號。

然而，也有这样的人，运动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肩上留下各式各样的考验，而他们熬了过来的，忍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更不吝惜神经与勇气。

呵！“右派份子”——人类的傲骨。

(四)如果承认“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那么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就不得不承担，负起对这“五一九”运动的起因作历史分析的责任了，他们可以一般地分析，近年来人们大脑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特殊地研究某个右派份子神经系统的奇异特征，在他们得出结论以前，我想从一个相反的立场出发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五一九运动是全国范围的整风——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表现而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教条主义是列宁逝世以后，整个一个历史时期，苏联整个民族的特征，它贯穿于各个阶段，渗透入一切领域，教条主义产生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相对闭塞的条件和与此相适应的局面(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肃反、文化革命、卫国战争)而不是全面资本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全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世界性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如列宁所研究的)问题的对象，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一否定是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的转化，修正主义是教条主义自身的对立物，它们寓于同一对象，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过比斯大林更多的“修正”

教条主义的一般表现可以用哥穆尔卡同志的话来阐明。

“执行六年计划的实践是在某些挑选出来的部门，集中了最高限度的投资，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不能牺牲某些部门，而对另外一些部门过分偏爱，因为失去正确的比例，会使整个经济受到损害……

“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信任他们掌握管理国家的责任的代表，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利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尽了义务之后，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了工人阶级的信任，意味着失去权利的道义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是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筑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治的做法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却失去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一种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的阶梯，每一种这样的崇拜都包含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

在波兰，也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实，当时有一些无辜的人被弄死了，只有许多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常常被监禁许多年，虽然是无辜的，许多人遭受残酷的酷刑，恐怖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盛行，在个人崇拜的土壤上，产生了违反甚至取消人民政权的最深刻意义的现象……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國內版的貝利亞主義，貝利亞主義是和它的一切总的变相成为个人崇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份，貝利亞主义这是用挑撥、血、监狱和折磨無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有，只是程度不同，这就是我们要反对的。

当社会主义突破一国范围进入世界体系时，需要重新全面地分析问题，表现为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就暴露了自身的局限性，按照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原则，这种历史转变要求人们付出极高的代价，这就是南斯拉夫问题和波匈事件，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表现得特别温和，因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要求共产党在一定的程度上掌握辩证法，克服教条主义。

(三)一切过程都有两重性，货币之转化为资本其反面表现就是劳动力之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其反面的表现是使用价值的转移，在物体的相互作用中主动的作用永远伴随着被动的受反冲，物质的渗透永远伴随着运动的渗透。

整风——民主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是前者的反面表现，与此相适应的是：整个过程贯穿两种力量，保守与革命的相互斗争。

自然界到处都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它们处于统一体中，似其相互作用以及到达极端时相互转化决定着自然界的命，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从产生的消灭不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按照这种观点看问题，就可以消除“右派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觉”

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也是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还是苏联共产党，1948年以前建设社会主义波兰的是统一工人党”把哥穆尔卡同志下监狱的也是统一工人党，用秘密投票一致通过哥穆尔卡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还是统一工人党。

我们热爱的党是不断革新，不断变化的党，而这种革新和变化是一个政党根据自身的要求发展的，这种革新和变化就是保守力量与革新力量的相互转化，而这两种力量通常都称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我們反对这种傾向：領導者把工作中的一切差錯和弊病，加以各種粉飾和弥补，完了就归之于党和制度，說这是党的意志，說这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如是对任何一种現象提出与某个領導者不同的意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四)我按照我意識到的历史使命工作和战斗，我的一切行动自己負責，我不会受任何人利用，至于和我換有同样觀点的人或有相似意見的人，無論是他們的个人品質和社会关系，我都沒有兴致去研究，如果台灣和美國兴高彩烈，那是他們的事，他們从来就是这样愚蠢的。

(五)冬天如果來到，春天还会远嗎？

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物四 譚 天 荣

一、自从二十大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这是空前規模的羣众性的运动，这次运动的兩种力量——教条主义者和馬克思主义者滲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国度，一切民族，一切社会集团，一切政党和一切部門，在前一种力量中有兩個組成部份：第一，反党反人民部份，例如格罗；第二，忠于党和人民的教条主义者們例如斯大林。在后一种力量中也有兩個組成部份，主要是馬克思主义的忠实捍卫者例如哥穆尔卡，但也有打入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例如：納吉这种現實情況用哲学家术语来表达这是“对立之相互滲透”

国际教条主义运动以波蘭的胜利为一高潮匈牙利事件后，这次运动轉化为自身的反面，这一轉化以不堪忍受的思惟虛空为其特征的“再論”之發表为标志。

二、整風——民主运动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反映，这場运动就其主流来看是一場“三害份子与民主份子”的斗争，在前一种力量中有正直而受騙，奴役的人后一种力量中也打入少数真正的右派份子，例如李康年，此乃对主之相互滲透这一普遍規律的表現。

現在整風——民主运动按照歛的必然性轉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三害份子借右派份子为名，对民主份子(例如儲安平)实行反扑是以缺乏理智为特征。

三、五一九运动是整風——民主运动在北大的反映在这次运动中的兩种力量可命名为正統派和反对派，五一九运动开始發展时完全符合和風細雨的原則，但6月8日以来人民日报社論煽动起人們最卑劣的情感，运动立即以最恶劣的方法轉化为自身的反面，現在正处于兩次否定之間阶段，这一阶段將以基本羣众的兩極分化为特征。

四、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驟，都必然是对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是对于旧的
衰頹的，但为習慣所榮奉的秩序之叛亂，一种前进的發展過程不管有任何表面的
偶然性也不管有暫時的倒退終于會給自己开拓出道路。

是時候了

沈澤宜 張元勳

(一)

是時候了，
年輕人
• 放开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
和愛情
一齊都寫到紙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憤慨，
背地里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一見天光。
讓批評和指責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陽光耀！
我的詩
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
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無法遮擋，
因为它的火种
來自——“五四”！！！

(二)

是時候了，
向着我們的今天
我發言！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能用柔和的調子
歌唱和風和花瓣！

今天，我要鳴起心裏的歌，
作為一支巨願，
鞭笞死陽光中一切的黑暗！

為什麼，有人說，團體里沒有溫暖？
為什麼，有人說，牆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麼，你和我還不敢坦率地交談？
為什麼……？

我含着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中文系 沈澤宜
張元勳

五月十九日

論“五一九”——現階段馬克思主義啓蒙運動
與初步批判“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濟”

龍英華

1957.6.5.

“五四”過了十幾年才被認識了意義，現在“五一九”運動是困難的，這個運動
有什么意義，需要討論，我認為“五一九”乃是現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啓蒙運動。

什么是現阶段的馬克思主義呢？是兩個体系（指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兩個体系，一註）共处和斗争时期的馬克思主義，这是与馬克思、列寧时代都有不同，目前世界上有二个体系，現条件要求馬克思主義發展，这是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不同于列寧爭取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社会主义胜利，現在仅是列寧學說是不够了，仅是斯大林學說也不够了。

“再論”的缺点：

我今年28岁，解放前入党，47年接受党的教育，解放后作党的种种工作，人事档案工作，参加了各种运动，我的思想是党教育的結果，我的看法也可能錯的，也可能对的，所以叫做哲学講座，因为牽涉到很多哲学問題，也算是“大言不慚，狂妄自大”。

“再論”偉大的历史功积，可与“共产党宣言”比美，我同意这个看法。它一般看不出什么問題，这个时候美帝进攻民族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由革命事件变为反革命事件的动盪，馬克思主義，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斗争，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动盪，这种形势要求一篇反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綜合情况的，強調團結的文章，以緩和內部矛盾一致对敌，对教条主义不能深刻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是主要的，这篇文章捍衛了苏联建国五条普遍經驗，但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談得少，对于什么制度有问题，什么环节有问题，对斯大林的问题什么都談了对品質等談得多一些，根源到底是什么沒有講清，（我不同意譚天榮認為，“再論”亦是裸裸唯心主义）对教条主义批判不够，对南斯拉夫的肯定的东西，肯定得不够。“再論”只能这样写，人民日报可以“三論”“四論”理論問題大家可以討論。

“再論”沒有分析清的几个問題：

对斯大林錯誤，苏共廿大过份責备了斯大林，“再論”也沒有解决，其实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問題，問題还在于一个阶层——官僚阶层（由老革命英雄轉化而来的）在支持着，坐轎子的必須有抬轎子的，这些人是抬轎子的，斯大林是坐轎子的。

社会主义中是有阶层的，由其本人的政治，經濟地位来支配。这是不同于阶级社会中的矛盾是主要的一致是次要的，在無阶级社会中一致是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斯大林的錯誤是有阶层的原因，这些人都是老革命，年紀大了，要享福了，學習放松，用的理論是老的，教条主义了，很大一部份人官僚化了还有一些人是馬克思主义者，当时不官僚化的人也不得不官僚化，要为他捧場，否则就不能工作。不單是官官相庇，但还是有革命的一面，赫魯曉夫、米高揚等同志过去不与斯大林进行斗争，历史条件不成熟。

官僚化所以存在是有政治制度的支持，选举时，党委提了名必可选上，人民监督不了他，这些人做了部長會議委员就可以任意决定什么，要举选誰，就通过

各系統布置一下。人民选了不能监督他罢免他，选举制度不健全。官僚制度在工業也很多。这些人在革命时是代表人民意志，在阶级斗争结束，这些都不适合了專政的意义小了，制度对着人民了，这些干部腐化了，官僚化，貴族化要享福了所以影响了人民享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好处。不适合的要下台，違法亂紀應法办，党外馬克思主文如吸收到党内来，新力量有天才的应吸收到国家領導中去。

工厂管理制度最伤腦筋，以党代政，不合邏輯，不合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符合民主集中制，以党员代表的多数來保証领导，在工厂里也应该爭取党的多数來领导，为何如此：因为馬克思主文理論不完善，因为在否定資产阶级民主时，強調了專政忽視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無产阶级專政學說不够了，“人民民主專政”就全面些，毛主席一直是反教条主义的，是最馬克思主文的。

为什么要整風，要解决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解决呢？要开展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使官了主义站不住脚，大家監督，大家說話，有大字报就黏，學校貼，机关貼，工厂貼，农村貼，这是医官僚主义最好的东西，影响大。我們北大現在爭得了民主牆，民主万岁，工人阶级还受官僚主义統治很严重，他們要选厂長，工人阶级还没有起来战斗，工人要民主管理工厂，建立工人委員會管理工厂。我們比資产阶级好，是毫無疑問，我們不要歌頌。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設时，只是工業化集体化，还缺了政治上民主化，我国要勤儉建国，也要民主建国，在集体化，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工業化中我們对馬克思主文有了發展，但在管理工厂学校方面就沒有弄好。

在昨天阶级斗争时期是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是教条主义了。文化問題，強調了阶级性，問題是要对資产阶级文化进行改造，不仅是建設，如資产阶级人口論，过去不使它，解放后这些專家不管他，实际上很有用处，只要去掉阶级性就可以，毛主席对这个問題很沉痛，吃了教条主义亏馬老过去早已提出来，大家不重視，人口論是馬克思主文主要部份，我們批判馬尔萨斯人口論，我們認為他是了不起，提出这个問題應該要學習。自然科学沒有阶级性的，也講成阶级性的，什么东西都是苏联的，苏联国内百家争鳴百花齐放很少，只有米丘林派，不能讓摩尔根派争鳴。馬列主义老师講文化时还是强调阶级性。現在到处强调繼承性，他还在强调阶级性。

現在的資本主义是新的資本主义，是廿世紀五十年代的資本主义應該有新的解釋，还是强调老一套，貧困化，危机这一套就不行了，廿年來沒有危机，工人工資上升，他們滿意，工人不跟你走，跟共产党走的少，这就是教条主义的危害。

“再論”提出了教条主义的很多原因也分析不清，毛主席看得很清楚，中央有一些同志不一定清楚，斯大林的錯誤态度造成与南斯拉夫分裂，南斯拉夫創造了新的东西又建立工人委員會民主管理工厂。只有这样才能發揮積極性，只有这样

才是工人的。否則既是我又不是我的我對南斯拉夫有些問題不清楚是新聞不自由，“再論”對他們錯誤批判了，對他們創造也肯定不够。

毛主席說匈牙利事件好得很。別的人敢這樣說嗎？它說明了官僚主義破產教條主義破產如果還是斯大林時代拉科西統治，我怎麼講了，下來就可能挨打，現在是毛澤東時代所以能够這樣自由地講。

目前二個體系對立社會主義的强大，但還不是壓倒優勢，將來一定會取得絕對的優勢現在正在取得。

民族主義體系是民族解放的國家印度尼尼埃及他們知識份子擁護公有制擁護社會主義。但對革命看法不同，不同意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意大利，道路不錯，陶里亞蒂很英明，英美二國正在找道路，馬克思主義必須要找到國內生活方式，光是消滅私有制階級鬥爭是不夠的，蘇聯的工業管理改革是很好的，一長制黨委員負責制都不是民主集中制，蘇聯還是第一步還是第二、三、四步，對赫魯曉夫我們很相信，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大字報，在階級鬥爭時候不需要，貼大字報是馬克思主義者，反對貼大字報是教條主義者。

目前中國在大發展，馬克思主義是要求新的，馬克思主義要求大放大鳴要求大字報……。目前馬克思主義傑出的代表者是毛澤東、鐵托、陶里亞蒂赫魯曉夫。蘇聯的教條主義更多赫魯曉夫的家也難堪當。毛鐵陶赫要結合起來，結合產物是現階級的思想現在在結合階級所以是啓蒙，“五一九”運動開頭就是上述諸人思想的結合，這就產生現階段的馬克思主義這些東西都是啓蒙的東西。作為一個體系是啓蒙的，我們還要去和工人結合。

民主管理在蘇中工人中間是苦悶的東西現在在官僚制度是新的不平等新的剝削。

斯大林問題官了階層抬着走理論不完善就不能產生完善的制度。

目前整風中國共產黨不改造自己就有不能為人民服務的危險，不改造是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利益有墮落危險脫離人民的危險，對中國人民講是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本質（靈魂）是思想問題。是新的思想運動，現階段馬克思主義啓蒙運動。是建設社會主義中新的馬克思主義誕生是新的五四運動對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有很大影響，使民族主義國家更相信我們，也能團結社會主義民主黨工人運動可以團結起來。

上海北京還比我們先搞但他們是領導階層大干部大知識份子，沒有羣眾性，沒有大搞，沒有提出懷疑胡風問題，提出胡風是否反革命是一個舉，批評胡耀邦報告（即三次代表大會報告）其他地方都不敢，北大的運動帶動了，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都動起來了，知識份子知道得多天不怕地不怕革命性強——我們革命性羣眾性大我們搞了“控訴會”和平地控訴，为什么不

可以呢？我們有一株毒草它的武斷是不对的但对教条主义是無情諷刺主要的是革命精神，但是有缺点。我們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詩歌詞…等它是新的經濟运动政治运动也是新的文学艺术运动，需要有革命性文艺揭露黑暗的文艺才是时代需要的。

“五一九”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是：苏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錯誤。匈牙利打倒拉科西，南斯拉夫的經驗波蘭的革命最重要的是毛主席二个报告，否則不敢發言，画大字报，要禁阻思惟等等。

（以上是由二人記錄湊成，可能字句上有出入，基本意思是这样的。

整理人：王义近

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對 用階級立場看問題

我認為階級分析方法已經過時了

南開大學物理系，張祖榮

“三害”的根源之一：在青年中堅持已過時的思想方法——階級分析方法。

我的論點：

(一) 思想方法指導人們行動。斯大林的關於階級鬥爭尖銳化這個公式，指導了多少錯誤的行動，同樣今天在我國階級分析的方法也起着危害作用。

(二) 今天在我們國家中這種分析方法即將過時。而在青年中這種階級分析方法已過時了！

(三) 階級分析方法在它提出的年代時曾起了積極作用，而今天已轉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了——消極作用。

(四) 階級分析方法在青年工作中起的消極作用，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 這種方法製造了很多人造的牆，某人一入党，自認為是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而沒入黨的知識分子稱為小資產階級。他們之間只能做一般的朋友不能成為親密的戰友（階級地位不同而在人們的思想深處就有一條鴻溝）。一種習慣的力量認為黨員與非黨員有本質上的差別，這也造成了人們之間的鴻溝。

(2) 這種方法影響下形成一種荒謬的是非觀念，為某種人建造了特權。審查青年先不看本人而看家庭出身、階級出身。這種邏輯顛倒了多少黑白，搞錯了多少是非？！多少青年終身背着階級出身不好這一消極沈重而又荒唐的包袱！

(3) 它為教條主義者頭腦簡單的人開了萬靈藥方。同學對畢業分配有意見，負責人就會扣一個帽子——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工人階級：一切好品質的代名詞。小資產階級：一切壞思想的代名詞。這些概念這樣的抽象，這樣的萬能，教條主義者最喜歡它，其實它最不萬能。

(五) 這種分析方法有邏輯上的荒謬，一方年後，青年人仍會激動，個人與集體仍有矛盾。那時是否還能說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是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

(六) 这种方法在广大人民中形成一种極深的習慣勢力。它在危害着人們。对青年來說应拋棄这种分析方法。

(七) 青年中只有是非矛盾，原因是青年知道的少，未了解許多規律性，而不是反映各种階級思想的矛盾。

編者按：这篇文章原来是發表在南开大学的牆报上的，現在轉載在这里，供讀者們討論。

关于人性与阶级性

譚 天 荣

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曾經写道：“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質”“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的人們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会本質，就由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由于人們的阶级地位各有不同，人們的社会本質，也各有不同，过去孟子，告子，荀子等为了“人性善或人性惡”的問題爭論个不清楚，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藏人們这种社会本質(本性)的阶级差異。在阶级社会中，人們的善惡觀念就各有不同，剥削者認為善的，被剥削者認為惡，被剥削者認為善的，剥削者認為惡，离开阶级关系討論人們的性善或性惡，自然闡不清楚、假如我們不站在無产阶级、立場、就不能判断某人的好坏如何，更不能判断某人的党性如何”。

我覺得这样理解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过份淺薄一些，如果一种理論只有相对于某一特殊的阶级立場或者从某种特殊的角度来看才是正确的，那么它應該叫做宗教，不應該叫做真理。人們可以信仰，但是却不能用它来指导革命实践，当然，按照宪法的規定，刘少奇同志有权利信仰並且宣傳自己的这些观点，但是如果一定要把这些观点說成是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另外一个問題了，据我所知，关于人性善惡对立的問題，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是这样的，恩格斯在“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一書中写道：

黑格尔指出：有些人当他們說人性是善的，就以为他們說出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是他們忘記了，人性惡的這句話就思想要深刻得多！黑格尔所說的惡，是历史發展的动力，在其中表現出來的形式这里有兩個意思，一方面，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驟都必然是对于某一神聖事物的凌辱，是对旧的衰弱的但是为習慣所崇拜的秩序之叛乱，另一方面，自从社会阶级对立發生以来人的醜恶的情态——貪慾和权勢慾明明作了历史發展的杆桿”。

我想刘少奇同志之所以对中国的古代哲学採取培根式的傲慢，以致对像荀卿

那样深透的理論都抱着輕蔑态度，並且完全沒有好好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是因为过去緊張的白区工作限制了學習的条件，不管怎么样，黑格尔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有說服力得多，就以这次整風——民主运动及其反面的表现——“反右派”运动來說吧：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教条主义向馬克思主义复归，这一历史的“新的前进步驟”相适应，我們对于教条主义进行“凌辱”“对旧的裹頤的”但是为習慣所崇拜的“三害分子統治的‘秩序’进行了‘叛乱’因此我們是強壯而又心坏的惡意”的，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來理介，那么人的醜惡情慾——貪慾与权勢慾分明作了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某些“积极分子”去表現他們的麻木不仁神經過敏或利慾动心穷兇極惡以帮助人們認識三害的危害，並且最終地推動了“历史發展”的“杆桿”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相反的，如果認為人們的行动可以簡單地去归結為他們阶级出身所規定的本性，像这样的腦袋想的那样那么怎么能說明在这次运动中無論是“右派”或“反右派”的积极分子中都有出身各式各样家庭的人呢？

可見，“反右派”斗争的理論武装不仅是教条主义而且是修正主义的，如果一般的說、他們也有什么理論的話。

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否認和污蔑 三大改造、五大運動的成績

羅隆基懷疑現有的黨政機構能夠防止
和正確處理打击报复事件，他主張
另外成立一個自成系統的委員會

羅隆基發言說，最近有兩位外國記者到他家去，請他談談對於“鳴”和“放”的印象，特別是對於馬寅初、張奚若發言的意見。他說，他認為這次的爭鳴是很健康的。大家雖然提了不少意見，但並沒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是一。第二、“鳴”和“放”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根據黨中央的整風指示，集中批判三個主義。同時他還對外國記者說，他認為馬寅初老先生顧慮太多。他不同意馬寅初的意見，他說，在解放初期，許多老教授不能上課，經過學習提高，現在可以上課了。馬寅初說，整風運動以後，許多青年助教因為教條主義太多，上不了課。其實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師經過整風，拋掉教條主義，提高自己，將來就對國家有更大的貢獻。這正是辯証的發展，這正是整風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張奚若的意見。

他說，前一天，陳叔通老先生對他說，現在的爭鳴氣氛好像是“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他又續上兩句“一片整風聲，三害除多少。”他說，通過這次整風，“黨加強了，民主黨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說，有人提出要黨提出保證，在他們對黨進行批評以後，不致在未來受到打击报复。他認為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但他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么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為這樣作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分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大路通北京了；二、過去的“五反”、“三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放”和“鳴”以後，還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他還主張，“平反”的機構一定

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因為他認為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產黨領導着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有成績，也為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黨派有，其實共產黨內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里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這個機構，敢于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他以為，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因此，他還主張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

他認為共產黨組織是否發展太快了

第三，他認為共產黨在發展組織方面，特別是在發展知識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領導黨考慮的。在解放後這幾年里，黨員很快地發展到一千二百万。在他看來，在解放初期在知識分子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常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而這樣的人，他說却被黨看成是積極分子，也就是進步分子，吸收入黨。這些人多半沒有經過多年的革命鍛煉，也缺乏同自然作鬥爭的知識，他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非黨知識分子感到不服氣，既影響黨的威信，又造成了黨和非黨的隔膜。

他認為上司太多，森工部“沒法子有權”

第四、關於有職無權的問題。他認為，黨員固然有責任，機構也有問題。他說，他在森林工業部裏面是有職有權的，但是部以上有國務院的八個辦公室，有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另外還有党中央的各部，你這個部沒有法子有權。很多事情都是從上往下貫徹，往下交任務。經委和計委向部里要的數字任務，也只能是主觀主義的。計劃整個地建築在關起門來的主觀主義的基礎上。他認為經委和計委和國務院各辦公室的領導人員多是黨員這也正說明黨對舊知識分子很不信任。他以為“黨員的政治雖強，技術知識和對經濟計劃工作的經驗不一定都豐富”，應該放心地讓舊知識分子參加管理工作。

1956年是“全部的冒進”

第五、關於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還是“冒進”的問題。他認為從1956年以來主要是冒進，而不是保守。這不是那個人的問題，也不是那個部的問題，而是全部的冒進。張奚若先生說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說的它的表現。這是把毛主席所說的“穩步前進”忘了的結果。

原載人民日報（1957年5月23日）

“肅反是方針政策的錯誤”

——同濟大學衛生工程系助教汪長風在該校 青年教師大會上的發言摘要

肅反問題：我認為肅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殘。肅反問題現在党採取个别道歉，我是不同意的。我当时也是一个肅反积极分子，我也曾搜查过别人的信件，做过違背自己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啊！这种事情当然象我这种人是不应做的，組織上也沒有要我这样做，可是在当时的氣氛下認為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不願道歉，这是要由党來負責的。当时的方針，大胆怀疑是錯誤的，它不能把一切可能性变为現實性。所以肅反是方針政策的錯誤，不單是方式方法上的錯誤。因此我建議黨委應檢查方針上的錯誤，不單是个别的道歉。

章乃器認為定息不是剝削 而是不勞而获的收入

本报特約新华社 31 日訊 在今天繼續舉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講了話

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来，這樣就有利于解決。接着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从消灭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間，千方百計地想办法提高工商業者的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灭資產階級，只有这样才對社會主義有利。

他認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

他說，对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認為立場很穩，口号喊得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壓服他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这都是形而上学，沒有真正从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为这样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

接着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这只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顛倒是非來弄權，只講亲属、裙帶关系，只願听恭維、奉承。主觀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

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憑主观想像处理問題。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里虽有是非，但怕講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紗帽。他們只知唯唯諾諾，唯命是从，或做羣众的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

他說：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險的敌人。

他認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害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們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業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资本主义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們應該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說，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現代化私营企業呢？这是因为資本家为了圖利，善于选用人才，並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業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說，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調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

他說，关于公私合營企業里几种关系問題，應該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殘余，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職責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業者还有阶级关系殘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異。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強調阶级关系。另外，不能說定息都体现着阶级关系，也要看定息收入占总收入大小来决定。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業者，只有通过說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

他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应說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接着他談到定息的性質。他說，有些人認為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說不通了。我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应說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說，二千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二千元以上的都是資产阶级；二千元以下的都是小資产阶级。

他还談到羣众觀点問題。他說，不关心羣众疾苦的人，尽管每天都和羣众在一起，也不会了解羣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羣众路綫。他对大家說，对資产阶级要

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着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

他認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說，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

最后，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問題。他說，关于这个問題，已專門写了文章，即將發表出来。他認為，必須辯証地看待这个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資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強調兩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說，哪个阶级都有兩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問題。他說，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認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

(原載人民日报1957年6月一日)

李康年重申贖买二十年的主張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鴻興織造厂董事長，中国鐘表厂總經理，萃众織造厂經理李康年，就是最近報上标题所謂“定息二十年”或者“贖买二十年”的建議者。

“三 个 建 議”

我提出了三个建議。

第一个建議，我主張請政府發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業改造贖买存單二十二亿元，收回資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議据，使資本家与企業脱离关系。存單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二千七百五十万元，除1956、1957兩年已發二亿二千万元外，对資本家只發十九亿八千万元，多余二亿二千万元，作为对資方代理人、董監事与需要照顧的资产阶级分子，給予一次酬劳或慰藉金，如再有余額，即撥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項工作，拟請指令交通銀行辦理，有不願得此項贖买存單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銀行得代为暫时保存，或按贖买存單應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

贖买存單應得人既已放棄贖买存單，即是放棄剝削之表現，應得人于取得捐獻收據，或繳納國庫之憑証后，即可將此收據或憑証，作為放棄剝削之憑証，而向工会爭取入會，爭取勞保待遇，經工会审查核准，給與工会會員証后，資產階級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議不能採取，則請研究第二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办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按如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帽子。上述建議如再不能采用，則請研究第三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加代領定息業務，同時亦得代管股票，及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轉贈捐獻，或繳納國庫。按以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

此外如資方家屬的勞動就業，應責成勞動部門及專業公司妥為安排，在贖买存單發行基本上完成后，國內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職務，即蛻變而為公家職位，公私關係既已基本消滅，此時資產階級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贖买存單，其性質與國家公債大同小異，期限且較公債為長，大多數人已經必須自食其力了，與勞動人民距離更近了階級基本消滅了剝削基本消滅了，贖買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業企業改造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已完全成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議書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與批評。這一次到京以后，讀了千家駒同志的發言，他是中央經濟理論权威，也是我們工商界行政管理領導，他談到了李康年主張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極性的表現，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以外，同時還包括一個對贖買政策認識錯誤的問題。對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與他商榷。

我的答复是：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六十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八十多歲，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我建議的根據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至于我建議贖买存單年期分二十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二十二億元，定息兩字應該更正，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捏造的。當全行業合營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的社論。這篇文章，我認為是黨和國家對贖買政策的方針，亦是黨和國家對工商業者昭示了贖買政策的信條。

第一段“我国在大約三个五年計劃的时期內，基本上完成生产資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說明大約需要十五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說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資产阶级的生产資料实行贖买，並且不是一下子贖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裏，逐漸贖买。”“分給資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紅利，資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國統計，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幣，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幣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購買民族資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資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說明国家將几十亿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資料。

第五段第二节“贖买是对物的，即贖买資产阶级的生产資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問題，即对資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們的工作等等的問題”。这說明贖买是專对生产資料的，至于对資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見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預有准备，即是需要十五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資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針，是从1949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觀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嘗不可的。如果十五年再拖一个尾巴，豈不是二十年嗎？我的建議与党和政府原定計劃步驟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無的放矢？

“不同意千家駒的意見”

一、千家駒同志說，贖买不要筆細賬，何以他还認為应从1949年算起呢，筆了有什么作用呢？

二、倘然要算細賬，1949年到1962年並不是十四年而是十四年不足。

三、私营企業暫行条例和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条例（即四馬分肥办法）都是贖买，此說沒有根据。

四、他說十四年中（实际上到目前只有八年）企業收回的贖金，有的超过，有的剛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这些話完全是憑主觀的理想而毫無調查資料。就我所知，还有資本被虛盈实稅因而亏本的，（千家駒同志發言第一节中所說的）还有資本被階級鬥爭因而損失的，还有資本被五反退獄因而短少的，有的虛盈实亏，有的資負倒掛，有的資本蝕光，有的生活資料亦已卖光，也有因周轉不灵而增資的，这些豈不是客觀的存在嗎。

五、他說工商業者應該認識贖买是国家對他們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也在于使他們安心改造，我覺得他把和平改造方針的內容混淆起来了，因为和平改造方

針有二个內容，一，对物（生产資料）——贖买（利用、限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机构。二，对人（資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为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兩者之間虽互相关連，而各有区别，他說贖买是对他們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似覺不可理解。

六、無論贖买也好，購買也好，这是不是一种合理措施呢，如果說是合理措施，則資本家既將生产資料交出而政府說並不是欠他之債非还可。这成什么話呢。这是丢却贖买意义了。

七、他說贖买如認為国家欠了他們債則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65%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事实，並且对工商界說來也等子白白學習，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我說，我扣了這頂立资本主义的帽子实在有些冤枉，請問毛主席所謂不是半贖买半沒收之說，作如何理解。

八、千家駒同志說贖买应自1949年算起，茲查毛主席于1956年1月25日下午召集最高国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業發展綱要草案时說，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經濟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沒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1955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極广阔的規模和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約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可見得社会主义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来开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多說是准备时期，更說不到是贖买开始时期。

九、根据毛主席說开国以后的三年中，是恢复国民經濟时期，可見得决不是贖买时期。

十、开国之初，是增加生产，繁荣經濟，公私兼顾，劳資兩利时期，所謂劳資，即是私营企業內部組織，当时还談不到贖买政策。

十一、共同綱領訂立于1949年9月29日，其第三条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产，还没有贖买字样。

十二、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是国营經濟，合作社經濟，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經濟，私人资本主义經濟，国家资本主义經濟等，各种社会經濟成份，在国营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如果說私人资本主义經濟已在开始贖买之中，未免太矛盾了。

十三、1949年並未進行清产核資，財产數字無法估計，如照資本家賑冊記載，他們是隨意編造，各自一套，絕無标准，殊不足憑。

十四、财产重估是1950年进行的，当时估价是仅憑私方主觀进行的，並無工人阶级参加，不足为憑，且幣制还是旧人民幣。

十五、主張贖买开始是1949年者，無非欲減少贖买金額，兼可減少定息數字。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

十六、五反是 1952 年举行的，当时退款数字之大，殊足惊人，这种退款数字，都是在资产项下减除的，这时国家定息之支出，是有好处的，如果强调赎买开始在 1952 年以前，是没有好处的。

十七、如果赎买确定为 1949 年开始，则八年以来所开新厂新店怎么办呢？其问题有工人阶级劳动所得而由政府鼓励他们创办的，又将怎么办呢？

十八、如果赎买确定为 1949 年开始，则目前正在讨论的工龄问题，何以强调应为 1956 年开始呢？

“赎买应从定息起付之日起算”

所以我主张无论老合营或全行业合营，一律以定息起付之日起算为赎买开始之时，财产数字一律以清产核资时所核定的数字为准，质之于家驹同志以为何如。

(原载人民日报 1957 年 6 月 6 日)

为什么还要把阶级关系和两面性抓住不变？

畢鳴岐不同意千家駒的意見

編者註：这是畢鳴岐發言稿全文。标题和小插題是編者加的。

千家駒同志的發言批判了某人所說的向工人阶级學習什么？

批判了兩面性和赎买政策的錯誤看法我是同意的，千是我們的老师。在几年改造中是給了我們很大幫助。如果不同意見作為交換意見。

他認為对私方人員某些所謂消極思想和作風沒有批判，主要是为了先帮助党整風。

在 5 月 17 日我曾以工人阶级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为題發表了我的看法，这是我个人这样看，同时也是我在工作中所听到一些工商界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其中的一些看法高了些片面了些，我們应当肯定一点，其主要的是要求进步、迅速的走入社会主义。这些思想矛盾的發生是为了迅速走入社会主义社会。把它反映出来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关键的問題。我認為有些企業的公私共事关系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面是公方对于私方人員的心情体会不够，对于我們的进步要求还估計不足，我提出这个思想反映是从积极出發的是为了我們工商界更好的安心工作安心改造，在思想改造中使公方对私方能做到有的放矢。当然是在我談的时候有缺点因为只提出了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之后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給予应有的評價（应当声明从全面安排量材录用适当照顾已）

經是給了充足的評價，例如說民族資產階級是財富不是包袱，這是黨和政府根據全行業合營後私方人員有了積極表現給了我們這樣一個評價，這是給私方人員很大的鼓勵。但是，有職有權，受到尊重還不夠），而對於私方人員在工作中尚存在着的某些所謂消極思想和作風就沒有同時批判，因而使有的同志對於我的談話有片面性，我的看法是主要幫助黨整風，向黨反映一部分黨員同志在工作上的三大害，而對於我們工商界本身未提出檢討。俟黨將整風運動不久勝利完成後，我們還要使工商界在公私共事關係上和職工改變觀感上要求黨對於我們加強教育也給我們以和風細雨的來個整風，這次向一部分黨員同志提出批評，這種精神也就是毛主席所教導的“教育人者首先受教育”我們先協助黨整風然後再教育我們。

當着我提出了工人階級怎樣看民族資產階級的看法之後，有的同志說我給民族資產階級評價過高了些。特別是我沒把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在企業中所存在的缺點和錯誤沒有加以分析批判，相對之下顯得過高了和不適當了。總之在立場觀點和方法上是給我了很大的啟發和幫助。

他認為：千家駒把個別的少數的當成全面，這不是馬列主義的精神。

對於千家駒同志的發言所提出的資產階級的兩面和正確認識贊成政策我是一致的。至於他把我說的話加以引証之後，而沒有交待清楚給扣帽子我是不同意的。例如他說畢鳴岐同志說“民族資產階級把自己的企業交出來，不是簡單的問題，這種思想鬥爭，思想變化的情況，是很多黨員同志體會不到的。”千家駒同志引証了這個話之後接着說“的確，民族資產階級交出企業是經過艱苦的思想鬥爭，這是他們接受改造的明証，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設想放棄之後，特別是當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難時，不再存有不堪回首話當年的留戀之感，所謂‘合營前小國之君，合營後大國之臣，合併後亡國之民’，不是這種心情的表現嗎？

我們在實踐中所感覺的是經過艱苦鬥爭勝利之後那就是社會主義思想战胜資本主義思想主要是提高了社會的覺悟和走社會主義的信心。例如自解放來抗美援朝、稅收工作、公債等，受了教育之後，內因是很重要的。至於我們所發現的個別人所作的打游詩“合營前小國之君，合營後大國之臣，合併後亡國之民”，在我們工商聯和民建會提出以此進行教育，要警惕資產階級的思想，加強思想改造，我們對於工商界中所能了解到的情況不管是少數的想法或者是个別人的想法，我們是毫無保留的向黨反映，要求黨更好的深入了解，對我們加強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難道說這不是我們向黨誠誠懸老老实實接受社會主義的具體表現嗎？不能把個別的或少數的看成一般，不能把個別的或少數的當做全面，這種分析法不是馬列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他說：“民族資產階級放棄生產資料而毫無留戀，比那赤手空

拳的工人更加光榮”，這句話我沒有說過，也沒有聽說過。

我非常不同意千家駒同志說“同時，我們更不能同意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放棄生產資料而毫無留戀，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榮”。這句話我不仅是沒有說過在我的思想深處也沒有，我也沒有聽說民族資本家說過，凡是稍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們都懂得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是劳动創造世界，我們都深入人心的是：自建国以来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以他們有力的双手和智慧在社会主义建設上是取得了偉大胜利。我們的認識世界上的一切偉大創造是屬於工人阶级的是屬於劳动人民的。我不知道千家駒同志說的“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榮”是从那里来的。同时这个大帽子的底下沒有人还是摘下去好，教育人最好是以理服人採取用压力办法是不解决問題的，思想改造不是靠用扣帽子必須使我們从思想深处認清前途，一心一意的走社会主义。我們从八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深深体会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者說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走上全業合营只說成是外因而他們体会的外因並不是說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而是說“外因”是“压力”。把民族資產階級接受了教育認清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运的自覺性的一面，就根本不存在。例如在全業合营前公私合营是一戶一戶的搞，我們曾經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見，如果这样搞得搞一二十年，后来發展工商业申請的是一批一批，在1955年底全联执委會議听了毛主席的教导認識社會發展規律，認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在56年初就掀起了一个全國性的高潮，这样的高潮不是誰要它來它就可以來，人們不能創造也不能制定在党和政府在事先也沒准备來个高潮，我認為这个高潮是外因和內因相統合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難道說这样一个高潮在全国範圍內掀起來应当說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發展，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定要被先进的生产方式所代替，資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个社會發展規律。如果我們工商业者不認識或不承認这个規律，我們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我們变化也不能到了今天。誰想不承認我們已經有了走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和要求那是同样違反社會發展的規律的，（当然应当声明不等于民族資產階級改造完成，即便資产阶级消灭之后，資产阶级思想改造是長期的）。工商业者誰也不能否認。

在我上次發言中說“在我們工商界思想改造有着如此变化的情况下，还給我們扣帽子，說我們留恋資本主义，走回头路等等。这样的教育，改造方法是与实际不符的”。我們的概念留恋資本主义，走回头路是指的“貪恋資本主义制度，留恋剝削，搞地下工厂，不願在公私公营搞生产，而喜欢出来單干，虽然这是很少數的，但在工商界曾經不斷發現过。

千家駒同志所談的“所謂資本主义一面，即指資本主义的思想意識，工作作

風，工作方法等等。我們指他們還留戀資本主義是指思想情況，不是指他們還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解釋非常同意，也是給工商界解除了思想包袱。工商界的羣眾對於資本主義一面的想法正是如此，在過去在概念上有很大差別。

他認為：全業合營後，階級矛盾基本結束，還不加分析地說階級存在兩面性就存在，這種教條主義的方式是不能說服人的。

千家駒同志說“關於資產階級兩面性是否存在以及兩面性應作怎樣解釋的問題。首先應問資產階級今天是否已經全滅”。我同意以上這個提法，這是一個解決思想關鍵的問題，我們民族資產階級經過几年來黨和政府所給我們的思想改造教育多般都認清即使使資產階級滅亡，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還是長期的。沒有人設想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在階級滅亡之前而先滅亡。有階級就有兩面性，就有階級關係。這是多數工商業者所懂得的事，不過主要問題不在這裡，我們應當回憶全業合營前幾年來階級教育工作是什麼呢？我們說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有積極一面，就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有消極的一面如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等五毒行為。這個印象深入人心自全業合營後民族資產階級交出了企業，生產關係起了根本變化，階級矛盾基本結束，我們的階級教育還是說階級仍然存在階級關係存在，兩面性也存在，並沒有把階級正在滅亡過程到了什麼程度？階級關係在企業中是否是主要的？兩面性的變化的程度如何？都未加分析就簡單的說階級存在兩面性就存在，我們用這樣一個教條主義的方式是不能說服人的。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工商界可能分兩種一種是口服心不服，你說怎樣就怎樣，一種是口不服心也不服，甚至於他們說兩面性沒有了，主要是說的消極一面沒有了，因為生產資料所有權都沒了，使用什麼還去犯五毒行為啊！他們說的沒有是指的民族資本家還掌握着生產資料所有權來進行五毒行為的這種消極一面沒有了。如果把道理講清楚階級存在資產階級思想也存在，例如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等等這些屬於思想改造的範疇，我相信工商界是會同意的，這樣的觀念是會使我們接受改造更有信心。

千家駒同志說“資產階級处在滅亡過程之中，如認為已經滅亡是不符合事實的。”他提出以下客觀存在的事實作為證明，他說“事實是，國家每年還要付出一億多元的定息，國家對資產階級分子有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各種安排和照顧，公私，工私之間還有矛盾，還存在着問題，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非任何人主觀的產物”。對於以上這個解釋其中我有很大的不同看法，從定息存在階級就存在國家對資產階級分子有生活上的照顧，因為和一般勞動人民不同，因而階級也存在，我也同意至於說政治上的各種安排和照顧，公私，工私之間還有矛盾，還存在着問題，因而證明這是階級存在我不同意，那麼說在全業合營後對於我們的一切安排和照顧是由於階級存在，等到階級滅亡了是否全滅，我表示懷疑？事實

党和政府不会这样做。

千家駒同志又說“全業合營后，一方面資本家把生產資料交給國家基本上他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員，是国家干部，就这一意義說，他已經是个劳动人民了”，以上这个說法好像是階級消灭了。他又提出“但另一方面，他与一般劳动人民还有所不同，他拿定息，还有生活上的种种照顧（如高薪不減，病假期工資發50—70% 等等，因而还保留資產階級的身份”。对于以上这个分析我有不同看法，对于拿定息，高薪因而保留資產階級身份我沒意見，对于 50—70% 病假工資，因为有些私方人員不幸得病只拿到月工資的30%生活实在困难，他們享受不到什么劳保福利，因而經過反映才同意照此病假工資办法，何况至今尚未全面实行，即便实行了也不能以此就作为保留資產階級身份，此外在工商界中有相当多的人沒有定息可拿，工資还有的較工人为低，是否这些人应当宣布他們已經是工人階級呢？

最后再提出一个問題，使我們大家共同探討，平心靜氣的來研究，不要扣帽子要实事求是講道理，对于資本主义工商業改造的政策是我国新的創造，既無經典著作可以依据，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也無有經驗可供參考。

他認為：階級矛盾基本結束了，階級是否也要基本結束。为什么現在还要把階級关系，階級兩面性抓住不变？

全業合營后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階級矛盾基本結束了，階級存在的成分也应当大大起变化，因为矛盾基本結束了，而階級是否也要到基本結束，階級关系是否就很淡薄了。应当說明不管是階級存在或將来不存在思想改造是長期的。究竟階級在什么程度下可以消灭，那么說就以定息还有六年为限了，這個時間照社會發展情況看時間是長呢还是短呢？我總認為時間相當長，因为現在是在一个高度的革命变化时期，很难估計，这样死板板的規定下来还有六年是否能适合社會發展規律，啊，現在是仅仅以定息扯着有定息就有階級，有階級就有階級关系，有階級就有兩面性，这个进度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人的思想进步衡量呢？还是一定要規定还有六年呢？还是瓜熟蒂落随时摘瓜呢？我認為在今天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思想改造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看出来改造完成或改造未完成。如果說階級一旦消灭兩面性也馬上消灭了，也是很不現實。大學畢業有大學課程，对于思想改造能否有个課程是很困难，即便是还有六年也应当做出六年改造規劃。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在某一种情况下有过合作曾共同反帝反官僚反封建，建国以后就接受了利用限制改造响应各項爱国运动拥护总路綫實現全業合營，几年来在經濟建設上是有它一定的貢獻，为什么現在还把这个階級关系階級兩面性抓住不变，这在生产建設上有什么好处。現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大踏步的向社会主义迈进，但是我們民族資產階級还在縛着足，迈不开步，跑不快，要求放开足，勇往直前为社会主义貢獻更大的力量。

他認為：現在資本家已不能占有生產資料和產品，它和工人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是沒有區別的，唯一的區別就是定息，但定息終究不是占有生產資料、為所欲為的剝削。

階級：在階級社會里每一個人都屬於一定的集團的。拿什麼來劃分這些集團呢？那就以在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什麼地位來劃分。換句話說，就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與不占有，有無對產品的分配權，從這幾方面來劃分出集團與集團的區別。每一個集團，就是一個階級。資本家們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就是占有生產資料，占有生產出來的產品，並且有權來任意支配這些產品，而工人們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是不占有生產資料，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不歸自己所有，也就談不到來分配這產品。這兩個不同的集團就是兩個不同的階級，這就是階級的概念。如果從這個定義來看，今天的民族資產階級還占有生產資料嗎？若是說仍占有生產資料，就與實際不相符了，因為現在資本家已不能再支配我們過去所占有的生產資料了。同時有許多資本家都不在他原企業工作了。今天資本家也不能占有產品了，也不能支配產品了。從這個兩方面來看資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惟一的區別就是工人沒有定息，資本家有定息。當然定息從概念上說，定息的大小是從定產核資來的，因此說是剝削，是不勞而獲的。因此說也是剝削，但其手段終究不是自己掌握生產資料，而為所欲為的剝削。關於這個思想問題，是在工商界中存在着，它是一個客觀事實，你同意它它也存在，你不同意它也是存在着，這是早晚要解決的問題。

他說：資本家魚躍龍門式地跳入社會主義，沒有想到這頂階級帽子還帶着，階級關係還那样強調着，兩面性還那样原封不動的嚴重實令人難解。

我記得 1956 年 1 月 15 日，我們偉大祖國的第一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城市——北京市人民，在天安門廣場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負責同志出席了這個大會，彭真市長莊嚴地宣布：我們的首都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那時人民日報上登載說“遠大的理想，已經開始變成了現實，在我們的國家裏，已經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城市。”以後于 1 月 18 日天津西安也宣布進入了社會主義，連着又來了個上海，我很奇怪，可是沒有不久，這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說法就改了。那時工商界非常興奮的說“看那，我們沒有什麼痛苦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了，真是階級消滅個人愉快。”沒有愉快幾天就變了。在這天的人民日報上寫着“過去，不少的工商界人士把社會主義想像成是很可怕的东西，覺得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沒有自己的前途。現在他們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同樣有了美好的前途。北京市工商界的許多人喜歡用‘魚躍龍門’來形容自己地位的變化。結果又是資本家魚躍龍門”沒有躍過去呢？還是龍門關上了

呢？那个报上还有記載“义合机器厂經理徐世清小兒子徐春林，过去常問他：“學校老師說工人叔叔最好，你是不是工人？”徐世清为了不願意使幼小的兒子自己是个剥削者，一直没有回答这个問題。可是当他听到批准公私合营的消息以后，很高兴的告訴他兒子“你爸爸快要变成工人了。”在报上还說“就是在这种情緒的支配下，在短短的几天內，全市新批准公私合营的一万七千多家工商戶的清产估价工作，从早晨到深夜緊張工作着，而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了。”这一行动，就是資本家們跨入社会主义后的第一个积极表現。天津上海和全国工商城市誰也不能否認这个热火朝天的高潮，資本家們以矯健的鯉魚跳龙门式跳入社会主义，沒有想到这頂阶级帽子还帶着，阶级关系还这样強調着，兩面性还那样原封不动地严重实令人难解。当初我們代表全国在政协大会上向毛主席报喜。我的意見是应当正視新形势下的民族資產阶级应当有其恰如其分的看法，那就是說工人阶级在今天应当怎样来看民族資產阶级，由于民族資產阶级有了这样一个根本变化，生产資料交还了工人阶级，为了更好的改造民族資產阶级变成工人阶级思想，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战士就应当把老大哥的手伸出来拉回头是岸的小弟弟一把（当然工人阶级早已在做着），把过去的阶级仇恨勾消，或者減少到很小限度上去，在企業崗位上強調搞好共事关系，不要再強調什么阶级矛盾，什么阶级关系，这样就可彼此以平等的工作关系来协商办事。（当然是在工人阶级領導下）

总之凡是为社会主义有好处的我是服从这个利益的，所帶着民族資產阶级的帽子还能起一定作用，那就多帶几年。以便更好利于改造。

（原載人民日报 1957年5月30日）

怎样看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學習什么？

北京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長 長金萃

編者按 目前中国民族資產阶级的改造，已經到了一个新阶段。原資本主义工商企业的資方人員变成公私合营企業的工作人员后，由于經濟地位的变化，思想方面也有了变化。在各地工商業者學習討論中，在兩個問題上出現了不同的認識。這兩個問題是：

一、資產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問題，也就是資產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看法問題；

二、資產阶级对本身的估計問題，也就是有兩面性还是只有一面性問題。

这是帶有現實意義的理論性問題。正确地解决这两个問題，对于工商業者进一步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本报决定开展一次公开的討論，希望工商業者和各界讀者踊躍投稿，參加討論。

發表这篇文章，就作为这个討論开端。

为了爭取更好的进行自我改造，我們工商界通过了政治理論學習，曾不斷的提出要向工人阶级學習，从而破資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这在理論上、在方向上，原是無可非議的，大家意見一致。但具体到怎样学？学什么？向誰去学？也就是真要把学到的理論去联系实际的时候，就感到不很理想，甚至有困难，因之又对理論产生了怀疑，并且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意見很不一致。

我們驟然一听到这些意見的时候，觉得提这些意見的人未免太执拗，學習了好多怎么說这样的話？白學習了，太落后了……但是，如果我們冷靜的分析一下，這些意見和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虽说的不够全面，但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远远优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清楚，并且也都在积极参加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而社会主义工商業是全民所有制的，是没有剥削的，从大家放棄生产資料来看，工商界拥护社会主义贊成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事实，在这样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里，只有工人阶级沒有资产阶级，因此作为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必須向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學習。在这个实际問題面前，大家意見自然一致，不必多贅。

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就培养了集体性、組織性、紀律性……工人阶级不剥削人，不压迫人，也沒有想翻身去剥削人去压迫人，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劳动，發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所以是大公無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些高貴品質，和资产阶级的貪圖利潤，因而不惜損人利己，为了利润而剥削人、压迫人的惡劣品質比較起来，也就是在兩個阶级本質对比面前，资产阶级要向工人阶级學習也是毫無疑問的，大家意見仍然一致。

但“學習馬列主义理論的根本方法是理論联系实际方法”，這是我們每一个學習政治理論的人都深深体会的道理，并且同學們也都在互相督促和勉励着这样作。問題就發生在这里。

工人阶级的品質並不那样高貴

工人阶级的品質是高貴的，我們要去学。工人阶级是个阶级，这个阶级存在于全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里，存在于我們国家里，当然也存在于我們自己所存在的工厂、商店里。阶级是由人集成的，我們就找到了这个阶级里的人——工人和店員，要向他們學習，然而發現他們（也可以說原来就知道他們）並不那样理想，他們的品質並不那样高貴，他的言行当中有很多我們看来不能学。

比如工厂里的工人有的常常是不爱惜公共财物，浪费材料，损毁工具，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有的请病假去逛公园踢商场，有的打人骂人，甚至偷东西……不一而足，在商店里有的店员服务态度很不好，有的工作不积极……具体表现出来不是理想的工人阶级品质，相反恰恰是所谓的无资产阶级品质。这些品质在我们身上体现得犹恐不及，万万不能去学。

有人在教育我们的时候，或我们自己在无法自解的时候，就把这些现象说成是“个别”的现象，把这些工人和店员说成是“个别”的分子，个人以为这种说法是脱离实际的，也是无法服人的，因为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最和工人店员接近，耳鬓厮磨朝夕共处，在他们当中犯有这样毛病那样毛病的实在已不在很少数，最多也只能说犯了严重，大错误的是极少数。关于具体数字虽没有统计过，但若以“个别”二字来掩盖住这个现实问题，而不加以重视是不易使我们心悦诚服的接受这个意见的。

少数先进人物不能说明问题

又有人从工人当中举出来一些先进人物，如全国闻名的王崇伦、张明山、郝建秀等已经创造性的作出成绩的事实，用来证明工人阶级品质，但个人认为这不能说明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因为究竟这在工人阶级当中也不过只占极少数，同时在资产阶级当中，数年来，尤其是近一年来，先进人物也大有人在，所以说列举先进人物的办法不能说明问题。

有人主张把工人阶级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工人店员分开来，把工人阶级看成是个抽象的名词，把工人阶级高贵品质看成是个崇高的理想，把资产阶级和我们工商业者也分开来看，把资产阶级也看成是个抽象的名词，把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看成是个描写出来的坏东西，是个打扮出来的丑角。这些说法看法也就是那种“所有好的都属于工人阶级，所有不好的都属于资产阶级是有意为之”的说法看法，抱有这样见解的人认为实际上工人阶级本身并不如理想的那样好而资产阶级并不像描写的那样坏。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合乎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因为社会思想意识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人因为所处阶级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并不是虚拟出来几种思想意识再去划分阶级，进一步说就是人在阶级社会里，在生产关系上由于所处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地位不同才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意识，这不同的思想意识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道理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为什么又产生了上面的说法呢？我认为产生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

題談一談，再把目前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来研究一下：

如果说要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向苏联的工人阶级去学习（假定美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断然而牢固的把理论和实际替他们联系起来，因为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垄断资本家确实具有完全的个人主义、唯利是图、剥削统治、投机取巧、尔虞我诈、欺骗虚伪……的资产阶级本质思想，同时要他们去学习苏联工人也确实具有团结互助、大公无私、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为人民服务、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崇高的工人阶级的本质思想。那么要美国大资产阶级去和苏联工人阶级去学，在学的时候某一个（或某些个）美国资本家当然找到了某一个（或某些个）苏联工人去学，有什么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起来呢？没有。

民族资产阶级已根本背叛了资产阶级多数 工人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从这里可以看出比较进步的美国资本家也要和比较落后的苏联工人去学，因为从整个阶级思想意识的水平来看前者还很落后很腐朽，后者已经很先进。所以这种学习是全部的、全面的、绝对性的学习。（两个阶级里面极个别的都不算）而目前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什么呢？从历史根源上来看，中国既没有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原就是具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面性。资产阶级，解放后又经党和政府不断的教育，以及职工群众的带动和感染，加以自觉自愿的学习，在思想上已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全行业公私合营，生产关系已根本改变，基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思想意识的道理，思想上又有根本的改变，虽仍具有两面性已是先进和落后的两面，并且从一年来工商界在生产经营上的成绩来看，在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当中获得先进光荣称号和得奖人数来看，都能说明先进的因素已经居于主要的地位，而落后的因素只占次要的地位，而且先进的一面在不断的增长，而落后的一面在不断的减退。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根本背叛了资产阶级，并且已经具有比重相当大的工人阶级思想。党把这个阶级看作财富，不看作是包袱的道理也正在于此。（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之具有文化、技术、经验等应当不是主要的，因为这些是否对建设起作用受思想意识的决定）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呢？从历史上看，同样由于中国没有构成资本主义很发展的社会，所以就还有很多规模宏大的工厂，因而从全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培养成的集体性、组织性、纪律性…就较弱，同时因为我国工业落后、文化落后，所以就缺少传统的工人，工人中绝大多数是从农民来的。而农民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

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有很大区别。若从去年一年来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的情况来分析，职工增加的主要来源仍是农民，其次是解放前长时间没有从事工作的或从来没有做过工作社会无业人员和家庭妇女。（参看1月19日北京日报）那么由于历史的和目前的这些原因，中国工人店员当中，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等等。在工人阶级内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之间也不断的进行斗争，逐步扩大与巩固工人阶级应有的进步思想，积极克服与消灭那些残存的或从外部带来的落后思想。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具体到每个工商业者都可不加分析的向每个工人去学，也可以说明学的时候不能把每个工人的各个方面都笼统的，一概的去学。而是要向先进的工人去学，或说向工人思想里面先进的方面去学。

我们要知道虽然过着一个阶级的生活的人，并不一定完全具有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但终究因为人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而其思想意识具有它的阶级性，即在本质上与其他阶级不同。所以我们说不论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来源如何，一年前在私营企业里的工人，解放前在全国范围里的工人还是受剥削、被压迫的。因此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说他们的思想主流还是工人阶级思想，是革命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这几年的历史变化当中可以体会得出来，在解放前夕工人当中绝大多数不怕共产党，怕也是一些工资较大的人怕工资被减少，而资本家当中绝大多数怕共产党，怕没收生产、生活资料，怕杀头；“五反”运动时工人经党号召就勇敢的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资本家在那时候治病怕痛，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情绪甚至反动思想；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工人没有顾虑，有顾虑也只是少数人怕制度要严，高工资要降，而资本家则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十五个吊桶打水，怕没地位，怕收入不够花，其中还有为数相当少的人“心痛”多年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归为公有……；工人几年来为了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得失，经常检举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资本家合营后还患得患失不敢作主意、不敢负责任、不敢提意见，那么谁是革命的思想，大公无私的思想，谁是阻碍革命的思想，个人主义的思想，从阶级上划分自可一目了然。

工人不可能都进步资本家并不都落后

说工人阶级思想好，说好的思想都是工人阶级思想，是实际的，是根据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思想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而说的，恰好说明我们放棄生产资料放棄剥削以后就将越来越多的具有和增加这种进步的思想，与我们没有一点坏处。说资产阶级思想不好，说不好的思想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也是

实际的，也是根据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思想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而说的，恰好说明我们放棄生产资料放棄剥削以后就逐渐减少终至消灭这种腐朽落后的思想。与我们更没有一点坏处。

工人和工人阶级思想是密切结合的，但今天的工人不可能都那样进步，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思想是密切结合的，但今天的资本家并不都那样落后。我们不要把说工人阶级思想好看成就是每个在我们面前的工人都很进步，我们也不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不好，看成就是我们自己很落后。

不能盲目籠統的向工人學習

总起来说，个人的看法，目前中国工商業者已經向工人阶级学到的願意革命，願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設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还要繼續的是工人阶级对劳动的热爱，大公無私，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不要学的工人阶级还具有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向工人阶级学习如果具体到向工人店員去学，应当是有目的、有分寸、有选择的去学，而不是盲目的、籠统的去学。应当是紧紧地抓住人家的优点主动的去学，而不是嘴住了缺点拒绝学习。另外某些有关問題也想借此談一下个人的看法：（1）我們不要把向工人阶级学习这个思想改造的根本問題和技术、文化等混淆起来，由于过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今天的工商業者比起工人来技术、文化要高一些（全面比較），高一些要进一步要求提高，要帮助别人，要充分运用，誰說高的要和低的去学？我們有本領，用来和工人或公方代表去比，比贏了又起什么作用？比贏了，思想不好还是要学，相反如果思想好了，技术差一些，工作能力差一些，再学也不是和工人阶级学不学問題了。（2）工人阶级领导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無产阶级專政的人民民主政权，通过宪法和政策法令来领导全国各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我們今天作的如果是领导工作，正好是党和人民授权給我們执行這項对企业的工作，而并不是由一厂一店的一些工人店員就可对行政工作领导起来的。（3）工人把工資、福利、假日等問題看的重一些，算不算落后？工人在計件工資制度下干的比在計时工資制度下要更积极一些，算不算思想落后？个人認為这不算落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縮短工时、放長假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終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滿足整个社会經常增長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那么工人对提高生活福利的要求並不損害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質，这种要求与实际可能之間的矛盾並沒有什么对抗性，如果要求的高了，超过了生产发展的許多条件，可以通过解釋說服来解决，同样我們整个人民生活在1956年里提高的快了一些，生产跟不上去，造成物資緊張，不是可以經過解釋說明來解决么？能說是人民要求提高生活的意願是落后的么？尤其对計件工

資制的歡迎態度是要求按勞付酬的具體表現，在計件時更積極是想通過自己的勞動取得更多的物質待遇，並不是旁人勞動自己享受的剝削行為，是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行為，不是損人利己的行為，有什么不好？從這個問題上引起個人作了如下的分析，把個人利益、集體利益的結合情況分為下列三類：

1. 先公後私：這種思想最好，但因缺乏物質基礎，所以只能體現在一些突出的人物身上，表現出來他們超越的、最崇高的品質。如劉胡蘭、羅盛教、董存瑞等一些革命先烈，好是好的，却只占極少數，不能這樣去要求一般工人，我們民族工商業者更不易學習。

2. 亦公亦私：這種思想是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思想，有可靠的物質基礎，絕大多數工人都具備這種思想，也可以從他們的活動上體現出來，我們民族工商業者要學習這一點，可以學習好，並且事實上有不少的人也做到這一點。只要能很好的掌握使個人利益盡量服從集體利益就行。

3. 先私後公：這種思想是個人主義思想，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損人利己思想，在全行業公私合營後連資本家的這種思想也已失去了它的物質基礎，雖然在思想上殘存較多、程度較深，但可以努力克服逐漸消滅，工人隊伍里為數不少的人也有這種思想，可以更快的被克服掉。但不論對任何階級都不能要求很快的消失得一干二淨。

（原載大公報 1957年5月7日）

加強黨與非黨知識分子的團結

羅隆基的發言

去年冬天我到四川去視察的時候，曾經接觸到高級知識分子方面的問題，最近我負責主持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小組的座談會，又聽到了許多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反映，現在我根據這些材料來談談個人在這方面的体会。

一年來的成績和缺點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從周恩來總理去年1月先後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後，由於黨和政府的努力，在貫徹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上，在全國範圍內有了很大的成績。知識分子的工資普遍地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解決了。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如時間、助手、圖書資料、儀器設備等問題，到今天儘管不能處處盡滿人意，但在可能範圍內，都得到了改善。高級知識分子的安排和使用，有了廣泛的和適當的調整。最重要的一點是，一般高級知識分子都感覺

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高級知識分子就增强了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般高級知識分子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沉，現在兴奋起来了；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極，現在積極起来了。今天旧的高級知識分子，有了新的气象。这个事实，我們應該肯定，並且必須肯定。

另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地在發展，情况是不断地在变化。旧問題是不断地在解决；新問題是不断的在产生。各位委員从视察中和座談会中当然都知道，当前知識分子的問題仍然还是不少。在这里，我認為有兩点值得大家注意。第一，有人說：“代表委員們年年觀察，次次反映，反映尽管反映，問題还是問題”，我認為这种說法是不妥当的，是与事實不符合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就印發了一些有关單位答复解决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的材料，这就充分地証明上面这种悲觀論調是錯誤的。第二，国家正在一个發展很快的过度时期中，对任何方面的問題，一勞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不会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我們的責任只能是：帮助党和政府，天天發現問題，研究問題，並且解决問題。

当前，在知識分子方面，还存在些什么問題呢？在安排和使用方面，还有某些需要进一步調整的情况。学哲学的人在圖書館編書目，学法律的人在机关里做會計，学染料化学的人在中教学語文，学机械工程的人在中学教历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学政法、財經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学校掛名領薪，而沒有开課的人还是不少，甚至散居在社会上的高級知識分子中，还有英國留学生拉板車，美国留学生摆烟攤的情形。这当然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單位的事例。这次知識分子問題小組座談会建議党和政府通令全国，普遍檢查貫徹对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的情况，我个人同意这种建議的。这种情况是應該加以糾正的。国家現有的高級知識分子都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这是知識分子的利益，这也正是国家的利益。

旧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对知識分子問題政策的时候，重点放在高級知識分子方面，对一般普通知識分子問題，准备逐步地来解决。現在中、下層知識分子又起来呼吁了，認為高級知識分子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照顧，而对小知識分子，特別对小学教师的照顧不够。其实旧工資調整，对小学教师的工資提高了很多，他們普遍表示兴奋。但是小学教师教書的工作量已經很重，而有些地区的干部还要驅使他們充当杂役，替机关抄寫，替書店推銷，替农村打井筑堤，替粮庫晒谷守倉。小学教师疲于奔命，不听命令，就要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們听到这样的呼吁：“救救六千三百万小学兒童的老师吧”。某些干部过分地歧視和輕視小学教师，的确是一种偏見。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是應該加以糾正的。

领导干部要主动努力改进工作

今天的關鍵問題，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

知識分子，精誠團結，融洽合作，這樣才能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為祖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服務。一部分知識分子與黨員之間有隔膜，周恩來總理在一年前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了。今天的情況比一年前有了某些好的變化，經過肅反運動，高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更純潔了。各級黨和政府努力貫徹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加強了高級知識分子對黨的信任和擁護。今天一般高級知識分子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之下，進到社會主義社會，他們不只願意接受黨的領導，而且要求黨進一步地加強具體幫助和領導。諸位委員，今天的問題是黨員幹部怎樣來改進領導方法，適應今天的新形勢，徹底消除隔膜，以達到融洽合作的目的。

周恩來總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由雙方面來的”，同時又指示黨員幹部“必須主動努力消除這種隔膜”。我認為這種見解是絕對正確的。在黨員幹部的“主動努力”方面，我願意提供幾點參考意見。舉些反映中的具體的事例來說，改善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採用評級制，少數教授埋怨評級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學術，黨員等級高，黨外人等級低。擴大知識分子進修培養的機會，少數教授埋怨選拔不公平，選青年不選老年，黨團員機會多，黨外人機會少。這種反映當然是少數的，並且是片面的。儘管如此，這就值得領導幹部主動努力，進行檢查，看在行政工作上是否有協商不足，民主不夠的缺點，看是否是在無意中犯了宗派主義的毛病。事實果真是如此，事實就會給埋怨者以具體有效的說服教育。去年在人民代表大會的發言中我曾說過：“毛澤東主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是掃除黨與非黨間隔膜，加強團結的對症良方”當時我以為在一個六億人口的國家，我們的思想意識，只能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先求團結，其“存異”的方面，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就所見，暢所欲言，這不仅可以減少郁積，消除隔膜，並且是非愈辯愈明，真理愈爭愈顯，百川異流，將來總是同歸于海。然而事實怎樣？一年來在學術思想方面，“百家齊放”，放者不多，“百家爭鳴”，鳴者太少。兩個號召提出來的時間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根據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還在一般高級知識分子顧慮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鳴。這種現象的發生，在我看來，主要是某些黨員幹部和黨外少數進步人士，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號召，缺乏正確的認識和体会。他們認為兩個號召提出以後，今天社會已經是淫辭放恣，異端猖獗，他們就熱心于尊統衛道的工作，以今之韓愈自任，過急過早地倡導“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議論，對思想學術的“放”者“鳴”者，不惜口誅筆伐，“包抄”“圍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說，傳道統。這就使一般舊知識分子更加思想混亂，無所適從，更加退縮不前，逡巡不進，更加瞻前顧後，栗栗危惧，而對領導幹部和一些進步人士就更加“畏而遠之”了！這種現象對國家思想學術的發展是大有妨礙的。這種現象是值得領導幹部和黨外進步人士，認真檢查，“主動努力”來切實糾正自己的教條主義的。

加深了解，消除彼此間的隔膜

隔膜是从双面来的，消除隔膜必須双方面共同努力，倘此方認彼方是思想落后，而彼方認此方为学术外行，只看見了自己的長处，却忽視了对方的長处；只看見了对方的短处，却忽視了自己的短处。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互相帮助，那末“落后”与“外行”之間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

消除隔膜，是彼此双方徹底認識和了解的問題。在我个人来看，我們旧知識分子在學習馬列主义理論外，还要好好地學習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样，我們才能明白革命老干部經過了怎样困苦的革命斗争，受过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鍛煉。革命老干部語言比比坦率，行为比較憨直，批評比較严厉，斗争比較猛烈。这是長期革命生活中养成的習慣。这是革命干部的特性。这正是革命干部的优点。这是党外知識分子必須了解認識的。领导干部从軍事革命工作轉到文教領導工作的崗位上来，固然應該研究新的業務，以便加强具体领导，但在團結、教育和改造旧知識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馬列主义以外，也还應該讀讀“資治通鑑”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傳統，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長起来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性。名利觀念，个人打算，以及所謂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这一大套構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特点，也正是旧知識分子不幸而有的弱点。它們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产，而一百余年的半殖民地教育，也使它們变本加厉了。徹底扫除这类思想上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求领导干部的同情帮助和耐心教育。

知識分子的知識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齡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謂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責”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問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們發揮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傳統觀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合則“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則“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謂“礼賢下士”、“三顧茅廬”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願做脫穎而出的毛遂者少，願作龍中待訪的諸葛亮者多。若得三顧茅廬，必肯鞠躬尽瘁。我不是說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須用“礼賢下士”、“三顧茅廬”的旧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識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間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在目前來說，党員领导干部同旧知識分子相处共事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應該把个人和党的界綫分別清楚。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發生偏差的，个人是

可能犯錯誤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錯誤看成党的錯誤。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我們今后必須深切地体会毛主席关于“怎样解决人民內部的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鳴”这一切指示来处理問題。这样，党与非党的感情就自然逐步趋于融洽了。

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

最后，关于知識分子問題，我願就个人的見解談一点我們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就拿我們中国民主同盟來說，几年來我們民盟全体盟員在自我教育和改造以及团结教育中上層知識分子方面，是做了些工作的。我們的工作有成績，也有缺点。自从领导党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以后，我們各民主党派的責任加重了。怎样进一步来做好我們的工作，完成我們的使命，這是我們当前一个严重的課題。在这次视察中，我們听到这样的反映：民主党派中有些人工作是“錦上添花，火上加油”，只是觀風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这些反映是值得我們深切反省的。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下，我們今后应真正成为领导党的助手，我們應該誠地接受党的领导，坦率地对党提出批评。我們要認真地貫徹“互相監督”，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今天一般旧的高級知識分子，思想上都有了进步和提高。極大部分的老年高級知識分子是業有專精，學有專長的。我們應該殷勤地接近他們，了解他們，虛心向他們學習，並且竭誠幫助他們我們要代表他們的利益，反映他們的問題。协助他們克克难困，鼓励他們貢献意見，团结他們互相學習，共同改造，這是我們民主党派每个成員的任务，我願同我們各民主党派的同志們共同勉励！

（原載人民日報 1957 年 3 月 23 日）

三个問題

徐中玉

（后改为“积疑三問”。文中()內的字是他在原稿上塗去或塗改过的字，这些字有的看不出来了，以 (×) 表示）

我爱共产党。沒有共产党。不可能有今天的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明天的更美好的新中国。但几年以来，我对共产党的某些工作也产生了一些問題（原为疑问）。很想提出来，可是往往話到嘴边，仍旧吞下去了，原因也簡單，其一是唯恐片面，

自己考慮也許用不着大惊小怪。其二是不知所之的“棍子”和圍剿都已挨过既如此，之不易，犯不上重蹈复轍。不过自党中央宣布展开整風，各方面开始鳴放以来，非但胆子壯了不少，具体情况也較前知道得多了一些。我想，自己既有疑慮，就应当提出来詢問一下，即使連一得之愚都沒有，大概总还可供参考，以作討論或批判的材料，所以决定（以上这段原稿取程塗去）現在就把下列三个問題先提出來，謹供党作为整風的参考，

一 某些偏差从那里开始产生？

常常听说，党的一切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工作中如有偏差，那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責任。我也認為，解放以来党所决定的大政（原稿为总路綫总方針）無疑（原稿为的决定的确）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对資改造、肃反运动、工業建設等之，都是如此。但党的关于执行方法的一切决定，却就未必都是完全正确（的）。何以見得？例如思想改造中的利用学生和助教像貧农斗争地主那样的斗争者教师，例如肃反运动中的往往以近似乎“莫須有”的（罪名）事情对有些无辜者大斗特斗，这两种很（原稿为極）大的偏差，难道也都可以說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責任么？很明显，这不是一校一地的偏差，而是全国性的偏差。这两种做法，却是大伤了知識分子的感情（我想無疑各地各校負責执行的党员同志当时也有不少人已能看得出来），真是一件多大的事情，在严格遵守組織紀律的党员负责同志和基层党组织是（怎么）决不敢擅作主張的。现在看来这两种做法（都）必是奉行上級党（原稿为中央）有关方面的指示，（下来）所以各地各校才如此步調一致（的），偏差一段。又如在工作上和在各种待遇上党内外往往不够（是一律）平等，把“德”字看得过是狹窄，几乎成了党员的專（利品）有物，这（無疑）也是全国性的偏差，这种偏差难道就和上級党（原稿为中央）有关方面的（总的）想法与安排沒有直接关系么？

偏差有兩種，一种确实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偏差，另一种則确实是全国性的偏差。因此負責者也有兩种（人）：一种确实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另一种則应当是上級党（中央）的有关方面。我感覺直到今天为止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把分明是全国性的偏差說成只是局部的个别的偏差，分明主要应（当）由上級党（原稿为中央）有关方面負（主要塗去）的責任（的）却不大公道地（原稿为含糊籠說的）一律要各个基层的党员负责同志去承認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这样做人們就看不出来？难道这就是维护党有关×面威信的好办法（塗去）？

（事实上，人們早已看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员负责同志，或党

組織（大概）是（因为）“有苦說不出”（只好代人受过），而由于不过是（不过×）“代人受过”決不会真有（×头）苦头吃，乃是一种“心照不宣”式的認錯，所以他們尽（×）管在运动过后會把偏差的責任一攬子包下来，（好）人們的感覺（印象）都始終是（好）“你（都）倒輕松得很”，因为認（錯者）本来（胸）心里有数，（並無切膚之痛）大不了換个工作單位称數（塗去）沉痛不起来。人們（×）时常看到：运动过后这些干部中有的从甲校（的）調到乙校，或丙校的又調到了甲校；（这些干部）他們都（××地）当众認过錯，說是一切責任都归他負，（他們×好像都要或准备吃些苦头，不料）可是事實則是（×）在調來調去之中他們大都陞迁几級了。（×××××）請問這樣的認錯怎么能服人？（解决问题？）这（那里）似乎不能算是老老实实的态度。

已經有人正确地提出过，不能強調（）黨員（×）是“特殊材料”作成的了。“特殊材料應該是（×）結果（絕）而不是（×說）原因。同这的道理，上級党（中央）某些执行的方法的決定也很可能是不完全正确（或完全不必正确）的。党的智慧当然比任何个个人都强，但智者千慮（或）有一失的道理对党來說恐怕也还是适用（×党）的。党的威信决不会受指于千慮中的一失或几失，只要其他九百九十九慮或（絕大多數×慮；九百九十都完滿成功就非常了不起了，（籠統地說要人們承認）党的一切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稍加（有）怀疑便（給）扣（上）人（反党反人民的）大帽子，这不能說服人，並且也全無此种必要，因为这样做只有害处，沒有益处。

上級党（中央）的某些方面如果真已在某些工作中（是否）造成了全國性的偏差，我以为，这些方面的組織也好，負責人也好，就应主动（承認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要負責者加以說明，再也不要借着組織紀律之类，而且（真要）上級党（中央）也要使人們（真正）看到（办錯了事的）所謂負責乃是真負責）为人要再讓有些人（只是嘴上說的漂亮甚至办錯了事还能陞級。

党的傳統精神是老老实实。千千万万人民的眼睛时都看着党，党的每一疏忽都会对社会風氣發生巨大的影响，說会使热爱党的人們产生一些（不）原可避免的疑虑。說真的，难道执行方法上的有些偏差不是經上級党（中央）就已开始产生了么？

二 为什么官职要越設越多？

解放以来，特別是近兩年来，有种非常突出的現象，即任何机关学校团体里的各种官职却越設越多了。在不少基層單位里，已出現了“官多于民”的現象，譬如說，科長多于科員。我曾經推想过官职为什么会越設越多的原因。攤子大，事情多，需要較多人來分工負責，这大概是最主要的原因吧，可是也不尽然。不是

現在已有許多名义上的“首長”在訴有職無權的苦。既然实际上仍只有一兩個人在官大攤子，而且並非一定管不了，那（么）又何必上上下下硬（要）安上一大串的“首長”（呢？硬安上一大串首長，不但是浪費人力，又造成了勞逸不均，有職無權，或公文旅行等等的矛盾，真是何苦來。

然則这样是否为了統戰？大概也是的。在目前，非党人士想做官，做到了官便認為已被尊重的人，的确还不少。为統戰而多設官职，对于这些人虽然能够有些團結之效（的），可是这个办法究竟好不好？是否这样能收到全面團結，真正團結之效？該團結的人很多，就是再多設些官职也还是不够的。純用官职来統戰，官职越多就越不稀罕，原有官职之欲望不断提高，难道官阶也可以漫無限制（繼續不斷）的增加，提高么？何况，統戰本来不能也不必要利用官职。对于絕大多數非党知識分子來說，我相信他的所要求的乃是足够的信任和必要的工作条件，使他們能够充分發（展）揮所長，为祖国效力，並（×）不（是）在于官职，至少主要並不在官职。以为“給你官职”就已尽了統戰的能事，由于到底不能有那么的官职好給，也由于不适当当地看待（低）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願望，結果反而会达不到統戰的目的。

这样做有时的确还是为了便于酬劳。对革命有功的人当然不少，年資既深，有才能的因（×）要提拔，成績一般的似乎也非照顧一下不可，甚至对革命有功者的眷屬，似乎也非照顧一下不可。这就得有更多的官职才能配給裕如。这样做反对那些沒有功，却有苦勞的人自然是一种安慰，但也有不少副作用。显著的一点便是才职未必相称。居下位的往往比領導者更能做了。于是一方面滋長了可以靠革命吃飯做官的思想，（極×）另一方面便产生了“用人唯亲”的牢騷，以致影响到工作的積極性。結果是安慰了一些（××）人，也（却）疏远了許多人。

看来，由于事繁責重，官职需要多設一些是肯定的，但却决不需要象目前这样重重叠叠一大堆。“首長”越多，官僚主义就会正比例的增加，內部矛盾也会层出不穷。我以为，也再不能用官职来作为統戰的唯一法宝和酬劳的礼品了。当看到某些會議增加了若干（代表×××）代表或委員（×數）而被說成是民主生活不断扩大的明証”时，我时常想不透這句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算是說了什么問題。值得注意的倒是歷經批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向上爬”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头脑里（緩）重新滋長。这不能否認和官职越設越多的（措施）做法有密切关系。說真的，难道这种做法不能証明党中央在貫徹执行統戰政策和干部教育方面还是相当形式，办法很少么？

三 入党的首要标准是什么？

解放七年多来，共产党發展很快，听说党员人数比前已增加了一千万人。共

产党的力量是越强大，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就越有保証。但在迅速發展當中，人們有时会感到究竟什么是（人們）爭取入党的首要标准还不明确。

这里談的在实际上不够明确。文件上当然是很明确的。也只是談知識分子圈內的見聞，別方面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人們感覺，党在知識分子中間似乎寧願（×）要这样一种人：唯唯諾諾（唯命是听，千依百順）的人。（历史單純的人，業務不錯的人、而在这中間），唯唯諾諾似乎已成了入党的（×）首要标准，真正的革命覺悟和必要業務能力則似乎已成为（×）次要标准。当然，絕不能說凡知識分子入党的都是唯唯諾諾的人，此中确有些（不少）是（××）值得別人欽佩的，但这种人似乎还不够多。唯唯諾諾不等于組織性紀律性，乃是一种察言觀色，奉迎唯恐不周的表現，他們对組織或在党領導面前是（以）低声下气，唯唯諾諾，回到羣众中去却可以搖身一变一成凜不可犯，神氣活現的老爺。这些人的所謂革命覺悟实际只是一（大堆）嘴好听的名詞和教条，業務能力往往很差。

人們看到，那里都有忠心耿耿，埋头苦干，業務能力很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敢于大胆的对党的工作提意見，对某些党员领导提意見，因此就絕少能够入党的。也許他們已申請入党几年，可是不但沒有批准，甚至几年中連理也不理。也許他們心願入党，因为看来党並不欢迎这样的人，（申請）为免徒討沒趣，所以也不申請。这样的人有时可以被統戰为什么代表什么委員，好像很尊重，給人的感覺却是“敬而远之”“高高掛起”。

难得也有提了些意見仍被接納入党的人，可是往往在入党之后他們就开始默默寡言了。使人感到朝野之別竟如此刺然。

說真的，这几年来党虽开始接納了若干高級知識分子入党，可是由于上述情況的存在，在羣众中的影响其实並不如理想。（也許，恐怕）固然（只是）多了一些人，可是有时却也相应地多出了一些牆（而已）。入党的要求一般似乎远不如前几年那样迫切了，“这样子不入也罢”，这就是不久前我听到一位曾經迫切要求入党而当未成功的同志的話。我知道这位同志（×忠）無論在那方面來說都要比某些已入党的（高明）强得多，（决不能說）他的这种想法决不能說是他的資產阶级思想又在抬头的結果。他的唯一“毛病”就只在于向党员领导的缺点提意見。

为什么唯唯諾諾的人很容易入党，为什么忠心耿耿（的人），竟竟業業的人只因敢提意見就不能入党呢？难道实际上的入党（的首要）标准不應該和文件（上）所載的完全一致么？

（××疑）三問已了，可能是非常片面，不正确的。問的意思却在于热望党的工作做得更好，党的力量更加壯（强）大。（我深刻地体会到帮助党的整風），

党的整風無疑將給我們國家各方面的工作帶來種種改進，共產黨在我們生活中的核心領導作用只應加強而絕不可以削弱。而我們每個人的嚴肅的責任在目前便是实事求是地大膽地幫助黨的整風。 六月四日

對經過幾陣“暴風雨”的看法

陳新桂

陳新桂對“三反”、“思想改造”和“肅反”等幾次運動提出了批評和建議。他說，過去的這幾陣暴風雨是產生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因之一。今天，有人不敢“鳴”、“放”，是怕再有一陣暴風雨來臨。過去幾次運動，雖然取得了成績，但成績的取得，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所以，僅以“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別的難免的”這個公式來作結論，未必一定正確。過去幾次運動產生的副作用太大，最嚴重的是助長了唯心主義。譬如，不從調查研究出發，事先擬定打擊的對象的數字，對運動採取寧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膽懷疑的辦法，等等，都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不相符合，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歷次運動還是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如人為地製造了“牆”和“溝”；把人分為“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運動中涌現出的“積極分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報別人的問題而獲得這個稱號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說，他們是“靠運動吃飯”。另外，在運動中也使有的人養成看行情辦事。有人這樣說過，在運動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這些人簡直是敗壞社會道德。最後，他建議：（1）黨在整風中應以過去的幾次運動的成績和缺點為檢查重點；（2）對過去的幾次運動進行總結工作，總結在報紙上發表，讓人民公開討論。（3）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應按毛主席指示，對肅反問題認真進行調查，成立委員會處理，處理結果應公布；（4）在運動中公開被鬥爭者，平反工作亦應公開舉行；（5）並非畏罪自杀，而是畏斗、畏逼自杀者，應清查，予以恢復名譽，照顧其家屬；（6）平反後仍有思想包袱者，應對他們作細致的思想工作，恢復其積極性；（7）運動涌現出的“積極分子”，特別是因此而被吸收入黨者，應加強教育；（8）鑒定表中的歷史問題，缺點等項，應經本人同意心服之後寫上；（9）作人事工作的干部應以年齡較大，社會經驗豐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者擔任。

（原載光明日報 1957年6月3日）

白毛女伸冤

刘奇弟

我有冤来我有仇

我的冤仇說不完

(1) 二年前(55年)

禍从天降下，

無緣無故

被精場

張三揪着耳朵嚷！

李四指着鼻子罵！

“反党——反人民——反革命”

啊，天知道

白毛女

“反党，反人民，反革命”

要問白毛女是誰，

——北大二百多被斗者。

(極少數的反革命除外)。

白毛女今天要問

我怎麼是

“反党，反人民，反革命”？

(2) ——誰都知道

24齋是宿舍

却很少人知

它却代替過牢獄。

個個房間

由積極分子看管，

走道兩頭

有校衛隊把守

夜里捆着睡

白天一步也不准走

白毛女

在那里
天哪

“反省”
“反省”

白毛女是誰
——几十个被禁的北大人，(除个别的反革命分子) 的化身。
今天，

白毛女要問
逮捕証在那里?
为什么
私設公堂
私人審訊
为什么
伤害人身心?
宪法做什么用?

这是誰想出的主意
是誰?
是誰?
多久?
是羣众?
这个
就算我相信
但是
你們
都效忠于
無政府主义? ?

.....
同學們
你們公評，公評
这是不是冤?
要不要申?

胡風絕不是反革命

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劉奇弟

反胡風運動已過三年了，胡風及其“集團”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今天旧案重翻，我要為胡風說話，更精確的說，我要為真理說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的。我的行動有憲法支持。

胡風是怎麼一個人？

凡是正視事實的人都會清楚，在解放前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辛勤的追隨著魯迅；在那萬惡的社會里，他向人們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為青年所愛戴，尊敬。正因為這樣，正憑著這點，在解放後他才被選為人民代表。解放後他更不懈怠，帶著高齡跑這跑那去鄉下參加土地改革；在朝鮮抗美援朝，勤勤懸懸體驗生活，從事創作。他們（胡風份子）寫的作有血有肉，最為讀者所喜愛。這類人不是為人民服務，是為什麼？世上還會找到這樣一種邏輯，把他們說成反革命。

看！這種控告和判決到底有沒有理？

關於對於控告胡風的內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風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們再來看一看，它到底有沒有理由？回答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反把閒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和推論搬進了法庭。像這樣的辦法，只要他說過話寫過東西，都可以按這種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辦法，用說相聲的邏輯和推演成反革命的。

請問，這不能當作控告嗎？

因此，自勉為要作個正義的維護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大聲疾呼！

胡風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同學們，你們認為怎樣？讓我們徹底搞清楚吧，假如你們也認為胡風被冤枉，那末讓我們一道來要求釋放胡風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勝造七層浮屠，而是更是為了支持正義，維護真理。

肅反問題

化三、張錫鋐

(一)对于肅反問題的估計我們只就效果來看，由下四點就說明肅反的成績在北大來說不是主要的。

① 由運動中鬥爭的人數來看，約80%以上是斗錯了。而且採用的鬥爭方式是錯誤的。

② 運動中批判的人數很多，每班有5%，想由此達到划清界限的目的。采用的方法，用了相聲性的邏輯將日常生活瑣事都拿來，極力將各種材料很快的說成是反動的，稍有一點可疑就把他們推向反革命的邊緣。由以上二點說明肅反運動的成績就沒有理由說是主要的。

③ 至於談到一般同學的收穫來說，使同學沉然寡言，說話小心謹慎，以及每個人却學會了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甚至以殘忍的态度來對待同志。

④ 肅反運動使思想覺悟也有所提高，當然這次運動也有些加快，但並不大，對自己來說入團時介紹人說思想轉變關鍵應是肅反自己就不同意，對我說什麼幫助。

(二) 肅反中所犯了嚴重的錯誤與干部們的地位與思想方法有很大的關係。人沒有從母親生下來就教育人的權利和義務，不能把自己加于羣眾之上。這些人思想懶惰產生教條主義。以前對人的懷疑太多了。不說你反革命，就說你對反革命有利。平時對別人說話進行批判就要看從誰的嘴裡說出來，干部說出來就往好处推，“落後”同學說出來就儘量找材料希望把他說成反革命。

他們(干部)借打擊別人打下十八層地獄往上爬。我們這一等級的人是認識到以前一套是錯誤它給年青人帶來很大的損害，而他們处在優越地位，休會不到這滋味。

(三) 認為肅反不發言是很好的。

問：你老實說肅反批判過誰沒有？在小組會上有沒有發言？

答 我沒有。

說 你很好。

肅反運動綱（與黨委前書記史夢蘭商榷）

聲明：這是筆者向中央提出的意見式的提綱因大字報篇幅所限尤其考試在即故不能將全部論據提出來。

中文系 江 文

北京大学1955年暑假的肅反運動斗争錯了那麼多人，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讓我來談談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區別“肅反工作”和1955年夏開始的以胡風集團為典型，以廣泛開展斗争為形式的“肅反運動”這兩個概念。毋用置疑，肅反工作對過去，現在，將來都是需要的，本文專談後者。主要論點如下：當時局勢五三年朝鮮停戰後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55年的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註一）國內階級關係並不是“日益尖銳化、深刻化、複雜化（註二）”。資產階級在改造中力量日薄，工人階級的領導日益加強，階級矛盾不可能日益尖銳化。有人認為，直至1956年底工商業全行業公司合營那時起，階級關係才趨向緩和這是割斷歷史的看法。在此之前，已是徹底改造的準備階段，矛盾當然不會尖銳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合作是有歷史傳統的。

二、肅反的指導理論，張仲純同志的肅反動員報告說：“過渡時期階級爭鬥尖銳化、深刻化、複雜化、從理論上蘇共党的歷史上來講是如此，目前中國情況也是如此（？江文）

因此就有必要開展肅反運動，當時公安部長羅瑞卿的“提高警惕反對麻痹”一文的基本思想亦是如此（註三）這種斯大林的階級斗争絕對尖銳化的理論早已破產，不須再駁。

三、肅反方針“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個好人”以及後來提出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和“不殺少捕”的政策，是正確的使錯殺和大量錯捕可以避免，沒有造成斯大林式的悲劇。

四、肅反的敵情估計，開始階段提出“百分之几”（註四）“百分之五”（註五）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北大約斗了二百多人。

以百分之五推算（如財政部電力部（註六））雖然簡便但為有頭腦的人所不為，大家知道“中國的情況極為複雜（註七）根據主觀臆測的數字開展斗争實屬可笑。有人認為上級也無硬性規定為百分之五，我想應該看這個對敵情的錯誤估計，在當時實際工作中所起的作用造成肅反擴大化。

五、檢查肅反運動的主要標準，我們和史夢蘭同志不同，他總結成績說“發動

了羣众，开展了二百××次的斗争（具体数字党委会有案可查）”。我們認為應以客觀效果來檢查，不能以斗争次数來估定成績，事實上這數字在估計錯誤時引用他到反適宜，我們以為斗錯了多少人，就是錯誤，斗對了多少人就是成績（全面估價不擬在此詳述）總之，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之下，在錯誤的領導思想和敵情的估計之下，絕大多數的斗争是錯了到底有幾個對的，因數字保密，我不得而知，這樣還能說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嗎？（註八）還能背“成績是基本的，缺点是難免的”公式嗎？（註八）固然我們亦不應忘記肅反後一階段轉入以審查干部追查校對材料為主要方式運動基本是健康的獲得了巨大的成績。肅反運動錯誤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於脫離羣眾以宪法人權為兒戲的官僚主義以搬運公式為滿足的教條主義，以及不准阿 Q 革命的宗派主義（註九）

附註：

- ① 見周總理在二屆政協二次全國委員會上的政治報告。
- ② 見本文第二點張仲純的報告。
- ③ 見 55 年 6.30 人民日報社論文思想基本上是錯誤的這種思想當時佔主要地位，見 55 年 6 月 7 日人民日報。
- ④ 55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報。
- ⑤ 史夢蘭肅反報告“大約有 5% 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不過我們在班上不要掌握這個比例。
- ⑥ 今年 5 月 19 日 15 日人民日報。
- ⑦ 毛主席七屆三中全會報告。
- ⑧ 史夢蘭肅反總結。
- ⑨ 毛主席十大關係報告中提到阿 Q 正傳的報告。

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否認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

馬哲民的反社会主义言論

(長江日報 6.21)

对党和群众关系的看法：馬哲民說，要老党员“对广大人民热爱，这对他們很不習慣。当然，过去他們也是团结人民的，团结、热爱人民本来是党的目的，但是那时候主要是打击、消灭敌人，因此团结人民发动人民群众只是为了打击敌人，目的变成了手段，本末倒置了。現在要他热爱人民反而不習慣了。”他又說党内思想有二种情况，老同志多是經驗主义，不能提高到理論上来新党员則是教条主义，根本不懂馬列主义，兩者結合起来就是主觀主义。因此，党内馬列主义水平很差，对革命形势的分析，政策实质的掌握很不够，上級不指示就不能工作。“他又說”：在人事安排上，党偏重德，而且把党外的都看成無德。他还說：“現在大专学校中，青年学生，工友和党的矛盾看已經超过了高級知識分子和党的矛盾，成了学校里党羣关系最主要的最尖銳的矛盾。这个矛盾很难解决”。(在市委召开的民主党派負責人座談会上的發言) (見 6月5日長江日報)

馬哲民还对光明日报记者說：武汉高級知識分子还鳴得不够的原因，领导方面的顧慮是主要的，他說：“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們儼然是‘天生的怪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說：“我代表上帝”了，他們就变成“教徒”了”。(見 5月8日光明日报)

据王紹欣在民盟省委扩大会議上揭露，馬哲民在談話中流露：除了毛主席以外什么人都瞧不起，总認為党员水平低，不能领导。(見 6月20日長江日報)

艾瑋生曾說“党和民主党派是帮助指导地位，民主党派是被帮助被指导的，所以長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間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應該改变”。因此，他說“在做法上应成立知識分子党，將民盟、民进、农工，九三等几个民主党派合併”。而馬哲民在 6月3日中共武汉市召开的座談会上說：“合併是很好的”。艾瑋生說，他在作上述發言之前，馬哲民曾三次鼓励他。

据周杰在民盟省委扩大常委会會議上揭露，馬哲民有一次說：党员就是政治，

黨員就是德，好像老話說的，黨員之德是封建社會的無才便是德。（見長江日報6月16日）

在民盟中南財經學院支部大会上，許多人揭露馬哲民對共產黨的看法。馬哲民有次對王祥麟談起黨員的作風時說：“他們是法西斯作風”。他對謝伯齡說：“共產黨員是木人，沒有頭腦”。鄭心一說，馬哲民聽到個別工人、農民對黨有意見，就說連工人、農民對黨都不滿，共產黨的地位很危險。馬哲民還說，今天共產黨員很驕傲，要我入黨，我也得考慮。馬哲民還會對王祥麟和謝伯齡說，過去有的共產黨員退黨，責任不在黨員，同時也不是偶然的，與黨的一團糟有關。民盟盟員鄒家連揭露馬哲民在解放初期曾對他說“蔣介石不好好搞，不爭氣”。（見6月20日長江日報）

對統戰線工作的看法：賀良騏在民盟武漢市委常委座談會上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後，馬哲民說過去統戰工作做死了，現在才“起死回生”。（見6月20日長江日報）

對高等學校中党委制的看法：馬哲民說：“大專學校的領導要發揮集體的作用，現在學校里有五條線，即黨、政、工、團、民主黨派，實際上只有一條線，即黨的領導，其他四條線沒發揮作用”。（見6月6日長江日報）

他對光明日報記者說：高等學校，“因為有了党委制，才產生了許多問題”。（見6月2日光明日報）

在盟中南財經學院支部大会上，王祥麟說，馬哲民一次在該校學委會上說，在學校、工廠要取消党委制。馬哲民有一次對方續說，學校党委制馬上要取消了，老幹部要退出學校。（見6月20日長江日報）

據章導在民盟省委擴大常委會議上揭露，馬哲民在幾次座談會上都說高等學校的人事處是“鬼門關”、“閻王殿”。（見6月16日長江日報）

對肅反運動的看法：馬哲民說，“在武漢地區的高級知識分子”“感到身心世界確確實實有苦水；有牢騷，這是事實。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特別是在肅反運動的時候，使用極端粗暴的辦法對待他們，把鬥爭，禁閉等辦法施諸於他們身上，對於他們的人權都不重視。在這些運動中，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對於思想，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不加區別，打击和鬥爭面太廣，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真把他們搞得太苦了，太傷心了。”他又說“他們（指高級知識分子）覺得，他們做人的起碼的自尊心都被毀滅了。應該懂得，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自尊心，是和他們的血肉以至生命聯繫著的，毀滅了他們的自尊心，是他們再傷心不過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無怪乎有的高級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生存意義都發生了懷疑”。（對光明日報記者談話，見5月8日光明日報）他又說：“肅反政策貫徹的偏差也很大，黨組織認為肅反是肅清反革命，受點冤枉不要緊，是個鍛

鍊，但羣眾就不這麼想，他認為黨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什麼要整人民，認為是不尊重人權這樣看法不統一，就產生了矛盾”。（見6月5日長江日報）

對整風運動的看法和態度：馬哲民說：“現在這裡（指武漢地區）的高級知識分子仍然顧慮重重，要想真正鳴起來首先要領導方面大膽‘放’，要讓大家‘吐苦水’，‘發牢騷’，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縛。”（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見5月8日光明日報）馬哲民認為最近人民日報發表的幾篇社論“發表得不適時，還有教條主義殘余”。（在市委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的發言，見6月12日長江日報）

在民盟武漢市委常委座談會上，賀良馯說，在党中央發布整風指示後，馬哲民不顧黨委的指示和安排，強調普遍開展整風。一些不在第一批開展整風的單位，盟組織也按照他指示的精神去召開盟羣座談會，造成混亂。如漢陽一個中學，本不在第一批開展整風，盟組織却避开了黨委召開盟羣座談會，發動羣眾整風。（見6月20日長江日報）

對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反黨言論的看法：馬哲民認為章乃器是落後了一些，但反對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是進步的（見6月12日長江日報）

在民盟省委擴大常委會議上，馬哲民表示了他對章伯鈞、儲安平、陳新桂等人反社會主義言論的看法，他說：“我還不能就說他們這是立場問題，我還不能就下這個結論。我看他們在觀點上是錯誤的”。他估計這些人“充其量不過是想搞資產階級民主”。他又說我們是同盟，不同思想是可以存在的。

（見6月16日長江日報）

黨已經到了面臨危機的時候了

王德周

北京日報1957.6.6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王德周在會上呼籲“黨已經到了面臨危機的時候了”！他說，人民大學是黨員第一，團員第二，民主黨派第三，羣眾最差。打扫廁所的都是旧人員，沒有黨團員。這是歧視羣眾，把羣眾划在圈外。他說：“現在羣眾把黨劃在圈外了”。他認為現在黨員有兩多兩少，多了特權思想和優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以上這兩多兩少結合在一起，老百姓受得了嗎？他說，“老百姓與黨的距離是遠的。這次整風收不到效果是很危險的”。

王德周又說，一般羣眾都是黨中央的政策是對的，就是下面錯了？但從豬肉來說，有一個胡同十二個豬肉鋪變成了兩個，豬肉買不到，說生活提高不能服

人。他說蔬菜比去年漲百分之六百。他又說：“老百姓開始對中央不信賴了，有些事比國民黨時候更壞”。

王德周接着說：“這次整風要有百分之九十的成效，否則要垮台了！共產黨勝利了為什麼今天垮的這樣？與其說黨脫離羣眾，不如說羣眾脫離黨，現在黨快吃垮了”。他还說，現在黨內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黨員閭宗派，甚至無惡不作。他認為什麼時候都是武力战胜武力，他說：“鬧事要架機槍，這是可以的，麻煩的是怕機關槍倒過來打”。

王德周還建議由民盟把所有羣眾組織起來，幫助黨整風，監視黨整風，以取消特權達到整風的最高的效果。

胡稼胎在西語系英法教研 室座談会上的發言

胡稼胎說：再不整風中國將非常危險，農民許多是吃不飽的，如果逼得他們起來，黨員們的性命都有危險，應該猛省，不要苟安。黨委會在學校弊多利少，應退出學校。

他說；“最近几年來，我深居簡出，盡量減少和別人的接觸，開會從不發言，盡量減少和別人的接觸，開會從不發言，但在解放前我並不是這個樣子。在武漢大學時，我擔任教授代表，在教授會上向貪污公款的工學院院開炮，仗義直言。今天毛主席提出整風是非常英明的。再不整風中國將非常危險。農民有許多是吃不飽的，如果逼得他們起來，問題就非常嚴重，黨員們的性命都有危險，應該猛省。不要苟安。黨委會應退出學校。走社會主義的路是大家肯定了的，已載在宪法上，黨委會學校防碍羣眾的積極性，弊多利少，黨員向黨報告教員的情況，在這種情形下教員怎麼積極起來呢。不懂業務或業務不高的人領導業務，要在十二年內趕上國際水平，無異緣木求魚，空中裁。過去把樹人分為進步，中間、落後三種。我大概是被認為既落後又頑固的人。這種標準是人為的，應該撤銷。黨員被認為是進步的，但現在看來，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又那麼多，這都是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因素又怎麼能說得上進步呢，而那些拍黨員馬屁的所謂積極分子則是牆和溝的建築者。

（原載北大校刊125期）

胡稼胎在西語系教師兩次大会上的發言

一、他对农民看法的“根据”：

甲、在七月一日的会上，他說：农民，是根据我的經驗和报上看来的，我的堂兄弟來信向我要錢，我兒子的同事出差到洛陽，看到农民很苦，又听到經濟系陈振汉先生的發言，我講的是根据少數听來的話。农民有五亿多人，我講的是一小部分，諸位講的也是一小部分。我講這話，以后不久報紙上就發表广西的事件。

（齐香先生接着說：我們不要求你們解釋，希望你端正立場。）

乙、他說“我自然是个地主”，但是，“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問題”。在七月二日的大会上，他說：关于农民問題，我在14岁以前一直在乡下，我也放过牛，从前乡下农民苦，我知道的比你們多，所謂鐮刀一上壁，家里沒有吃。我自然是个地主，有四、五十亩田，僱工种田的。我依靠田上了学，我进了香港大学，除了家里寄錢以外，有官費，有县里的津貼，我的兄弟也依靠田地进了大学。我因为看到农民苦，所以田租比人家收得少，我是看到农民苦，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說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也是因为我有农民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問題。我从听到农民生活苦的个别事实推論到农民苦，是邏輯錯了，但另一方面也是我有农民情感。

他对党委会可以退出学校的根据

在七月一日会上，他說：我也表示这样的态度，党外的人是客人，党請客提意見，可以只提缺点，並不是請我們來恭維党的。当然象章伯鈞，儲安平那样大罵主人失去了客人的身分。党的成績我也講过，最大的成績是改变了中国百年来受屈辱的地位，我不相信罗隆基，章伯鈞等夺到政权后会搞得好，因为人总有錯誤，世界局势可能有变化，所以一定要首先做到内部团结，北京大学靠近中央，又有党员副校長，可以够了，党要依靠羣众，党委可以退出学校，是因为它有三害，如果能改掉，当然多些人做事也好，学术方面的領導有党员很好，沒有也可以，只要有人掌舵即可，因此只需两个党员副校長，这样也就可以在政治思想上领导了我覺得我說的話和周总理的話意思差不多。

“我的話也許有錯，因为人說話不見得合乎邏輯”

在七月一日会上，他說：許多話我在小組中已談过，有的話傳得不正确，說

80%农民沒得吃，我沒有愚蠢到如此。

大家誠懇的動機，我很感激，我從儒家觀點接受馬列主義。儒家是講仁的。所以接受社會主義，我覺得剝削是不合理的。年紀大的人有許多思想不能改掉，而且這些思想與馬列主義並不抵觸，我接受馬列主義是移花接木式的。

我對政治不感興趣，沒有加入過任何黨團，因為我沒有政治才能。如果有政治才能的人當然參加政治團體。我認為黨整風是好的，應本着和風細雨的精神，我對黨是善意的，因為本着儒家博愛的精神，我的話也許有錯，因為人說話不見得都很合邏輯。

他說黨員是便衣警察，他認為是邏輯問題

在七月二日會上，他說：黨員是便衣警察，我認為是個邏輯問題，我把自己經歷過的少數事件，推論到黨員是便衣警察，這種推論方法是不對的。我班上的同學向領導彙報我的情況，我認為學校是黨委領導的，所以就想到報告的是黨員，就得出，黨員是便衣警察的結論。

他的“動機”“效果”和“產生效果”的“原因”

我的動機是本着儒家精神，但許多說法與儒家精神違背，這個意見我接受。關於“三害”問題，我說過共產黨有成就，也發生了“三害”，但如果讓儲安平等上台執政也不可能免去三害。人看問題是有許多毛病的，我說話主觀方面是沒有仇視黨，敵視黨的，但效果却如此，原因是因為我只說了黨的缺點，沒有說黨的成績。突出地提出了黨的“三害”。

他認為他的錯誤在於“用字上欠斟酌”

在七月二日會上，他說：有許多人提到立場問題，這可能是个問題，我是從儒家立場出發接受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有仁愛精神與儒家相同。我是從團結願望出發對黨提意見的，但因用字上欠斟酌，結果與原意相反。我的話在聽到的人看起來好象與右派野心家的言論互通聲氣。

最後，蔡鴻賓同志說，聽了胡先生的辯解，我準備的發言顯然是“落後”了，胡先生口口聲聲相信黨，愛社會主義，但從胡先生的言論看却完全與資產階級右派息息相通，這不是資產階級右派，又是什么呢？董桂枝同志說：我不同意會這樣開下去。我建議擴大這個會，邀請同學和系外的教師參加。希望他（胡）好好想一下，在會上表示態度。此外楊周翰、杜秉正、杜美、曾藩本、龔景浩、陳占元、趙璉和羅經國同志等接着發了言。對胡稼胎先生的不老實狡猾一致表示氣憤。有些同志要求胡先生深思和猛省，否則就要鬥爭到底，最後主席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研究召開擴大會議問題，對胡先生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徹底的批判。

五、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對黨的領導

關於成立“政治設計院”的發言

章伯鈞

章伯鈞說：

現在工業方面有設計院可是政治上沒有設計院

“共產黨的民主精神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說，今天他談個人的意見：第一點，近二十多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很正常。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效果。這在中國政治史上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國家很重視。帝國主義國家想找我們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兩周來提出的學校中的黨委治校的問題，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就我接觸到的朋友來說，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認為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黨是可以從政治上領導科學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都感到這種制度有缺點，發生了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缺點。因此，大家認為應該更多地聽取教授和學生的意見。這證明，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

現在應該提出進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參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談會，感到仍有人沒有把話說完。在一次高級技術人員座談會上，有人發言後問我到底怎樣，下邊可能顧慮更多。因此，今后應該徹底地廣開言路。現在光是中上層人物的意見，固然能夠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見，但是，還應該普及到下層才好。下層干部在幾年來對國家貢獻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錯誤。因此希望這次整風能聽一聽基層人民的意見。

“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干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的。”

其次，談幾個問題，幾年來，特別是從去年政協會議以後，國家領導方面很重視各方面的意見，民主生活日漸豐富。今后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的重大問題，可以多聽一聽各方面的意見。如這次整風，結合檢查改進工作，當然是好的。過去，作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工作進行之初，就多聽聽人大常委会、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

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貫制、推广双輪双驂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国务院的部長們，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討論，或經過民主党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的討論，就会減少損失。如果党内一決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問題，去年只交地方党委書記和少数党外高級干部进行討論。主要是党内討論。應該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員会、民主党派去討論，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認識和經驗。再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問題，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問題，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討論。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沒有意見，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党内外展开討論，應該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討論。

陈夢家在文匯报上的意見，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應該是政治上的設計院。”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个設計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應該是政治上的四个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現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滿，應該展开广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經常的討論。

近來，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還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讓大家經常討論国家的重大問題。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會議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說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報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問題，拿出材料認真討論，有丰富的內容，能够發揮各个人的見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問題，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討論，文字改革問題也可以由大家討論。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慮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許多领导同志，有知識，有精力，可否在統一安排的原則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經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換意見，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們怎么講，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討論問題，各部應該有常務部長出席代表各部說明政策。这不是資本主义国家議会政治。

近一兩年來，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識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較小的社会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們的問題。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一再討論，党和政府應該下决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統一戰線政策，在革命中發生了極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經驗还得总结一下。从馬克思、列寧那里找理論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現在的統一戰線工作，作一个結总，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門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請有关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就可以少發生一点主觀主义的毛病。

（原載人民日報 1957年5月22日）

党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号施令

黃紹竑

黃紹竑首先就党政关系問題也就是領導的方法問題發言，他說：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堅強的領導，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問題，那就与宪法的規定違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黃紹竑說：我所以提党政关系問題，絕不涉及党的领导权問題，而是领导方法問題。我覺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肅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發布决定而沒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們或某些党员認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問題，他希望在整風中对党政的关系檢查一下，並且明确地把它規定下来。

“整風好比洗澡、法制好比洗臉” “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否專職專業？”

第二个問題，黃紹竑談整風与法律制度問題，他說我把整風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臉，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須每天

洗一次或者兩次。整風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風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無法永久保持整風的效果。

黃紹竑還談到：在制度上要注意那些問題，他首先談了兼職問題，他說：兼職本身就是官僚主義（除法律規定者外），希望把这个問題檢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協常委是否可以成為專業專職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為如果成為專業專職，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說：黨派的領導人不能不兼，如果這樣說法的話，毛主席要兼多少職務呢？我以為在兩個常委內，各黨都有一定的員額就得了，何必限於那幾個領導人呢？其次，他說：重視已有制度，就我經常參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會來說，到會人數往往僅達到法定人數的邊緣，其中，我估計了一下，共產黨員缺額的比較多，儘管是因為兼職多、工作忙，但是，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來看，是會令人引起不重視的感覺的，是不是有人覺得問題已經在黨內決定了，常委会不過是形式的通過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制定那些法律呢？黃紹竑認為：我們的立法是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經濟方面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有人說：蘇聯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遲，我們何必着急？我以為蘇聯好多先進經驗，我們一定要學，但是，這樣也算做先進經驗嗎？也值得學嗎？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這樣說法無非是為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做辯護。黃紹竑認為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問題，如果這些法規完善了，不但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問題可以解決，黨政的關係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應該注意那些過去因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而致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重大損失的負責人，如果不及时處理，並向人民作交代，就無異給整風運動來一個極大的諷刺。

“‘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成公式，
我認為這會意味着強調成績掩蓋錯誤”。

關於以往成績的宣傳問題，黃紹竑認為：“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經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任何工作報告都套上這個公式，我認為這樣會意味着強調成績掩蓋錯誤，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個別錯誤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績來掩護它，忽視它，就司法方面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在全國範圍內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就國家經濟建設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不知要造成多少億元國家的財政損失，而人民間接的損失也是可觀的，我覺得宣揚成績，夸耀成績、掩護錯誤、

忽視錯誤都是官僚主義的作風，也是鋪張浪費的來源，成績說得保守一些，錯誤、偏差放在成績的前面，並不等於掩沒了成績，而是成績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績，人民對於政府的成績是心中有數的，不強調的說，他們也會知道，說得有一點漏洞，一點不確實，他們也會知道的，強調的說，並不增加他們的信仰，稍微有一、兩點不確實，就會減少他們好几分的信仰。

最後，黃紹竑談了兩個具體問題。他認為①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是機關干部，知識分子，他們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經勞動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拖下去。②解放時期，有些國民黨人傾向革命為奔走和平或參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平反，歷史上有罪的也應酌情處理。

(原載人民日報 1957年5月17日)

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他說：“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

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的發言中說：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羣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巩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派，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着黨走，但跟着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羣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

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党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羣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党的存在，就有黨和非党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羣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后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茅茅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原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不要共產黨領導，人民不會賣國

葛佩琦

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工業經濟系物理化學教研室講師葛佩琦說：我認為今天黨羣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學校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

黨員和干部。說良心話，物資供應之所以緊張，這是由於執行黨的政策的人犯了錯誤，例如，豬肉哪裏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為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發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老百姓几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利益時，人民就要反對他們。例如，1945年抗戰勝利時，受了日本人壓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用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所以看黨員的成績就是看彙報多少，彙報的多，就是好黨員，黨員起了監視羣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因這是組織給的任務。

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聯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的，可以；不好，羣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会賣國。

（原載人民日報1957年5月31日）

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

民盟“科學規劃問題”臨時研究組

一、關於“保護科學家”的問題。

我國目前科學家還很少，科學基礎還相當薄弱，要開展科學研究，爭取十二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必須“保護科學家”，就是採取具體措施保護科學家，特別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扭轉目前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首先要協助他們妥善地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使他們真正能夠坐下來，好好安心工作。

（一）時間問題

科学工作者的时间問題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去年知识分子會議后，已經有不少科学家能够保証以六分之五时间从事業務工作，但其中有一部分今年又保証不了，至于那些負有行政責任、兼职过多和社会活動过多的少数人一直沒有時間进行过科学研究，而这些人又大多是在科学研究上能起领导骨干作用的。

我們建議：(1) 除少数例外，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傳授后代，更应如此。(2) 保証每个科学家每年有一定的时间連續从事研究工作。請政府考慮規定教授和研究員的休假进修制度。(3) 除少数例外，科学家担任人民代表、政委委員等职务的，一般只限担任一职，地方的不兼中央，中央的不兼地方。(4) 由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動和行政工作得長期請假。(5) 招待外宾，非必要时，不应作为科学家的任务。

(二)助手問題

有些科学家还缺乏必要的研究助手或行政助手。影响工作效率。

我們建議：那些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如科学院的学部委員）应配备一定的适当的助手，科学家的助手应由科学家自己选择。

(三)設備問題

目前有关科学的研究的房屋、圖書、仪器、设备、試剂药品、試驗材料、标本等問題仍未很好解决，向科学进军的“后勤部”始終沒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在全国高等学校中，一般设备都很簡陋，科学院的个别研究机构（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是这样。

我們建議：应按需要与可能从速予以充实。

(四)資料問題

保密制度过严过死，已成为科学研究重要障碍之一，既浪费人力和時間，又造成学术壟斷，成果私有，不能互相交流，以致研究重复，设备浪费我們建議除軍事、外交以及新發明外，对于科学家、教授所有資料不必保密。

(五)經費問題

关于科学的研究經費問題，目前还有些地方存在着有人沒有錢和有錢沒有人的現象，今后应当是合理分配，用經費去保証科学工作，使有领导研究科学力量的地方有必要的經費。高等学校目前科学的研究难于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經費。在科学的研究工作上，当然要貫徹增产节约、勤儉办科学的精神，但是必要的經費还是不能节省。我們建議在高等学校里設置研究專款，以保証研究計劃不致因經費缺乏而不能完成，並設置科学基金，作为机动之用。科学經費，一般应允許跨年度使用。

(六)“归队”問題

凡沒有就業的或已就業而用非所學的科學家，應為他們安排“歸隊”。有的科學家雖在作本行的，但因調動工作，使他脫離了原來的研究環境，而在新環境中短期內無展開研究的可能時，我們認為應重新考慮，適當安排。

二、關於科學院、高等學校、業務部門研究機構之間的分工協作問題

(一)目前科學院、高等學校和業務部門之間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本位主義、大家都想保存本單位的幹部，不願外調，甚至怕談合作，怕這樣會被拉走了人，影響了自己。有些單位對於少量的必要的人員調動，也張大其詞，互相埋怨。因此，在單位與單位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堵牆。

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協調彼此關係，我們建議：(1)科學研究工作除少數必需集中外，應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裡，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裡。不一定要擺攤子，主要是要把工作真正搞起來。同時也應從全局觀點以協商方式來考慮各部門間彼此的需要，予以適當安排，這樣才能取長補短，互助互利。並且要用互通有無、互相兼任、互相信聘為學術委員等辦法（只兼任業務職，不兼任行政職）。來解決一部分人少事多的矛盾。(2)分工上，業務部門的研究工作應當以當前業務上極需解決的問題為主，科學院的研究工作應以科學上的基本問題和全國性、綜合性的為主，高等學校的研究工作可以是多樣性的，而也可以廣泛些，包括科學上的基本問題、有關教材上的問題、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等，應視各學校具體情況來決定。

(二)為了滿足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的需要，新設研究機構有時是必要的，但是我們過去有些機構的設立並沒有經過審慎的考慮，以致性質上有重複，發展太快，兵多將少，缺乏各層应有的技術領導。研究指導力量甚為薄弱。因此我們建議今后建立研究機構應特別慎重。對現有的機構有無收縮或合併的必要。請有關領導部門予以考慮。

三、關於社會科學的問題

(一)解放以來，由於國家工業化的需要，把自然科學提到最重要的地位，這是完全應該的，正確的。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社會科學可以比自然科學放輕一些。但是社會科學並不是不重要。也應該有相應的發展。

(二)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里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社會科學要從頭創造。沒有可繼承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來，過去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科學的人。在情緒上受到了一定影響。某些學科解放後意被廢除。或不成為獨立學科。過去研究社會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的人

很多轉業了。過去許多課程因為蘇聯沒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課程比如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情況、政治制度、國際關係，國際法等本來都是政治學系的主要課程，但至今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應當恢復的應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應當重視的就應重視起來。

(三)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例如，有些財經上的重要政策問題。如果政府部門的負責人作過報告，學者們也就只能作些宣傳解釋工作。這樣是不妥當的。開國以來，在政法、財經等方面所採取的方針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也不能說每一措施、每一階段或每一環節都是毫無缺点的。我們認為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地將有關資料盡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並幫助他們創造研究工作的條件。只有這樣，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才能與實際相聯繫。才能克服目前理論落後於實際需要的狀態。

四、關於科學研究的領導問題

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有領導地進行，國務院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這對加強科學研究的領導有積極的作用。我們希望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並建議有条件的省、市也設立相應的機構。以加強領導。同時，為了加強科學家之間的聯繫和交流。應該發揮科聯和各個專門學會的作用。國家對於專門學會應給予必要的支持。至於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實際工作中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

五、關於培養新生力量的問題

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我們認為今后應當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我們擁護並支持國務院關於考選留學生的決定。建議及早規定辦法並保證實施。

我們認為科學家都應當積極擔負起培養新生力量的責任，視為自己的義務；同時，應尊重科學家選擇培養對象的權力。

(原載光明日報1957年6月9日)

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

叶 篤 义

叶 篤 义 在 会 上 論 了 兩 点 意 見，一 点 是 他 認 為 清 华 大 学 是 党 羣 关 系 較 好 的 一 所 学 校，尚 且 問 題 很 多，共 产 党 对 知 识 分 子 的 問 題，應 该 更 加 重 視 起 来。他 認 為 应 把 五 百 万 知 识 分 子 的 問 題，摆 在 一 个 重 要 地 位，並 建 議 政 协 全 国 委 員 會 成 立 一 个 專 門 机 构 負 責 处 理 知 识 分 子 問 題。另 一 点 是，他 認 為 在 学 校 中，不 需 要 有 党 派 的 组 织 活 动。他 十 分 贊 成 改 变 高 等 学 校 的 党 委 负 責 制。他 說，过 去 党 委 会 管 得 太 多，如 果 說 党 与 非 党 之 間 有 一 塊 牆，牆 的 来 源，主 观 上 有 些 关 系 未 处 好 是 一 个 原 因，但 是 不 是 因 为 有 了 党 的 组 织，無 形 中 就 形 成 了 一 塊 牆 呢？他 認 為 一 个 人 多 一 种 关 系、多 一 种 身 份 就 多 一 个 矛 盾，如 校 長 就 是 校 長，教 授 就 是 教 授，兩 人 之 間 关 系 就 簡 單 些，如 加 上 一 种 党 派 关 系，关 系 就 复 杂 些 了。我 們 如 果 不 以 党 派 成 員 身 份 出 現，关 系 就 簡 單 些，矛 盾 就 少 了。叶 篤 义 的 这 一 意 見，是 包 括 主 張 共 产 党 員 在 学 校 中 也 不 以 党 員 身 份 进 行 活 动。他 說，党 派 要 常 开 会，起 碼 对 六 分 之 五 的 时 間 的 保 証 就 有 影 响。問 題 是 在 高 等 学 校 中 搞 这 些 组 织，是 起 了 推 动 教 学 的 作 用 呢，还 是 抵 消 了 教 学 的 作 用？七 八 年 来，民 主 党 派 组 织 生 活 都 过 得 不 好，这 一 問 題 長 期 不 得 解 决。除 了 主 观 原 因 之 外，客 观 上，每 半 月 或 一 个 月 开 个 会 过 组 织 生 活，对 知 识 分 子 有 無 必 要？他 对 于 民 主 党 派 学 共 产 党 的 组 织 生 活 那 一 套，是 不 是 正 确 的 方 向，表 示 怀 疑。他 对 于 民 盟 组 织 在 大 学 中 的 活 动，究 竟 对 学 校 有 帮 助 呢，还 是 添 了 麻 煩？也 表 示 怀 疑。

(原載光明日報1957年5月8日)

如 果 学 校 無 党 派 关 系 矛 盾 也 就 少 了

叶 篤 义 說：我 在 清 华 大 学 講 的 話 引 起 了 誤 会，需 要 說 明 一 下。

我 講 的 不 是 各 党 派 退 出 学 校，以 后 不 再 發 展 了，而 是 怀 疑 到 党 和 民 主 党 派 在 学 校 內 如 何 发 揮 组 织 作 用 的 問 題，也 就 是 党 如 何 进 行 領 导 的 問 題。比 如 一 只 火 輪 由 此 岸 要 开 到 彼 岸，只 要 掌 舵 的 方 向 掌 对 了，不 管 如 何 开，也 会 不 开 错，党 的 領 导 应 該 起 舵 手 的 作 用，主 要 是 进 行 方 針 政 策 的 領 导，确 定 方 針 政 策，交 其 他 單 位 去 执 行 就 够 了，如 要 学 校 培 养 符 合 規 格 的 人 才，党 和 民 主 党 派 誰 去 执 行 都 可 以，因 此 党 領 导 国 家，在 中 央 主 要 把 人 大 常 委 會、国 务 院 搞 好，在 省 市 主 要 把 省 市 代 表 大 会 和 省 市 人 民 委 員 會 搞 好。在 机 关 和 学 校，党 派 不 要 成 立 基 層 组 织，但 可 以 發 展 成 員。現 在 大 家 提 出 要 拆 牆 填 溝，由 于 在 学 校 多 一 层 关 系，多 增 加 一 层 矛 盾，

如果学校無党派关系，只有教师之間的关系，关系簡單些，矛盾也就少了。

(原載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

关于科学体制問題坐談会的發言

費 孝 通

1. 关于設立地方的科学研究機構問題。

从科学性質來考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以集中为宜的，比如需要特殊設備，在目前甚至相當時期內不可能各地方都設置的；第二是可集中可分散的；第三是以分散为宜的。

凡是研究对象具有地方特点的就应以分散为宜。比如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最好是各民族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比較小的民族或是社会历史上密切联系的民族，可以一定地区为范围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又比如动植物矿物等，也是有地方性的，各地区有各自的特点；应当在草原地区配合畜牧业，在海滨地区配合水产業，在高山地区配合林業等成立研究中心。这些地方性的研究中心的建立对推动这些学科經常性和長期性的研究是有利的；而且可以更密切的配合各地方的建設事業。

当然，設立地方性的研究機構並不等于說不要中央級的研究機構。相反的，由于地方性的機構的成立，更需要中央機構来加以指导和联系。比如各民族成立了社会历史研究機構，就更需要有一个联系各地方的機構，並且进行有关各民族社会历史比較研究的中央機構了。反过來說，如果只成立中央機構，具体的研究工作还是需要分散到各地方各民族中去进行，如果各地各民族中沒有研究中心，就只能採取工作队的方式，工作上自然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是說明，像这类学科地方性的研究機構是必要的。

从已有人力的利用來考慮，也是有些宜于集中，有些宜于分散。如果一种学科專家人數很少，而又以密切合作为宜的，当然以集中为有利。如果專家人數少，虽則在工作上不需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但是过早分散到地方上去了，就会缺乏机动力量調度不灵。比如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从学科性質說宜于分散，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專家太少，如果現在就要遍地开花，事实上做不到。現在这方面一些稍有基础的学者还談不到專門研究那个或那一些民族。因之，已有的人力需要集中調動，按需要重点使用，这是地方研究機構做不到的。目前还只有採取工作队的方法来进行工作。但是这种办法不应当看成是正常的而且应当赶紧培养力量，使地方性的機構能早日建立起来。

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各地方的高等学校里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如果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那就会影响各学校的工作，也就是影响新生力量的培养，那是不相宜的。要充分發揮这些力量，地方性的研究機構就可以起作用。比如云南的动植物是科学研究的好园地，在昆明建立一个这方面的研究机构，就可以充分利用云南地方上各高等学校里这方面的人才。再从提高各高等学校的教师質量来看，分散一部分科学的研究的專家到各地方上去，协助各高等学校和研究工作是有好处的。这些分出去的科学力量，加上各学校的教师，可以培养成地方性的科学中心。这样說，属于第二类可集中也可分散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在有一定条件时，适当分散是好的。

总的說来，除了若干不宜分散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外，我認為应当創造条件，适当分散，在分散的基础上加强联系，提高集中。

2. 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各業務部門等研究机构的关系問題。

我是認為这三方面的科学的研究应当从对象、要求等方面有所分工的。業務部門的研究应当以当前業務上極需解决的問題为主，高等学校以有关教学上的問題为主，科学院以科学上的基本問題，全国性的問題等为主。

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分工不容易弄得很明确。事实是如此，因为科学上許多关键性的問題的知识都是和教学有关的。教学应当經常赶上科学的發展。教师們不自己参加这些研究也不容易把自己的教学內容提高到当前的科学水平。这个說法我是同意的。但是以目前高等学校里大多数教师來說，他們的水平还不是很高的。事实上还需要通过一般的研究工作来提高他們的学术水平，使得他們能更好地掌握材料。为这多数教师着想，研究工作的要求还不宜太高，甚至可以把編写講义，做讀書筆記都列入科学的研究工作范围里去，对于这些教师，科学的研究直接为所授功課服务，愈密切愈好。关于这一点我想爭論是不多的。

另一方面是高等学校里也有不少在科学上有地位的專家。怎样使用这些專家是一个問題。所謂研究重点摆在那里的問題，归根結底就是这些人怎样加以利用，才对国家最有利的問題。

先从高等学校来着想，这些人是教学的台柱，是开展科学的研究的火车头；如果把这他們拉出学校，影响确是很严重的。小則一个教研室，大則一系会發生瘫痪。現在一般高等学校里这种人是不多的，从一个教研室或一个系來說大多不过一个两个这样的教师。这种人一走，不就要垮台么？学生首先要闹，学校也不好办。这是实情。不承認这一点来考虑問題是不切实际的。

在学校里，这类人是不是安心呢？並不都安心，而且很多不大安心。所謂“人心向院”主要是指这些人。为什么不安心？我估計是第一、教学任务太重，抵用的人不多；能用的就拼命用。加上缺乏助手，或是助手不太抵用，这些人的工作是

很繁重，而且很瑣細，很多是令人头痛的事。第二、感觉到自己空虚，凡是知道一些科学行情的人，一个时期不赶路，就会明白自己落了后。心里会很急。一年多以前，高等学校里不奖励科学研究，甚至有些地方反对科学研究，这些人心中有苦闷，也无可奈何，現在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急于要补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第三各学校科学的研究的条件，过去一段时期里虽则有了改进，但是究竟赶不上專門的科学的研究机关，而且有些学校对于科学的研究重視还不够，不能滿足教师們的要求。

有人認為“人心向院”是科学的研究机关向高等学校拉人拉出来的。我觉得平心而論，主要还不是这个原因。高等学校能重視科学的研究，能改善科学的研究条件，人心是会安定在学校里的。

我的看法：有研究能力的專家，除了必須集中才能进行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之外，以留在高等学校里为宜。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一方面也使研究工作者經常和青年学生，和教师接触，不仅可以培养新生力量，而且对于研究工作者自己也可以經常受到新生力量的推动和鼓舞。这种刺激是很有用的。把一些老头子和年輕人隔离了，兩方面都不好。当然，如果新老关系搞不好，那又当別論了。以目前情況來說，搞好新老关系也是安定一部分老教师在学校里工作的必要前提。

既然要留住大部分科学的研究力量在高等学校里，同时又要顧到当前国家建設上許多問題需要研究，所以高等学校也应当接受一部分和教学工作关系不很密切的研究計劃，並且創造必要的条件使这些教师能有一定時間和精力用在这一类的研究上。

3. 关于社会科学的問題

我想現在似乎还談不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比重問題。要發展社会科学还有許多基本的認識問題要澄清一下。問題是不少的。我只想提出一个問題是怎样發揮許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問題。我考虑这个問題觉得关键还是在我們怎样对待旧的社会科学。这个态度問題不解决，那些过去搞过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还是發揮不出来的。

问题是出在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会里沒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創造，沒有什麼遗产可以繼承。对于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这些全是敌人，是毒素。如果采取这种看法，新旧社会科学是对抗的，接不上头，也沒有接上头的必要了。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資產階級社会科学是有錯誤，有缺点的，因为它受到阶级性的限制和歪曲，但是資產階級要用它来解决它社会里的問題，虽則它不能解决这种社会里的基本矛盾，但也不是什么問題也解决不

了。在他所能解决的問題的範圍來說，他所掌握的也不可能全部是虛假的，都是些和客觀事物完全不相符合的錯覺。如果它也反映一部分事實，這一部分的知識還是應當有用的。不但如此，資產階級社會里的階級鬥爭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複雜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是不是只代表統治者的一方面而完全沒有代表反統治者的一方面呢？我想也不可能是如此的，那麼我們凭什么全部否定資產階級社會里的社會科學呢？有什么根據可以說沒有任何遺產可以接受呢？

其次是对待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态度問題。如果認為舊的社會科學只有毒素，那麼這些人首先是消毒的問題。消完了毒，从头再来，自然不及沒有受过毒的人學起來更快些了。他們是像背了包袱賽跑，愈跑愈慢。如果認為舊社會科學是可以批判接受的，那麼舊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是个改造的問題。他們經過改造。還是大有可用的；而且經過改造，他們對社會認識得更深刻，比了沒有經過這番鬥爭的人經驗多，閱歷深，見識廣。現在，我覺得第一種看法還是較占上風。因此，很多舊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脫離了科學队伍，或是在队伍里發揮不了作用。這種情況我認為是不正常的，對於發揮潛力是不利的。

社會科學的队伍里，新舊不接，少數先鋒隊背後拖着一大批發揮不了作用的“舊人物”，這個队伍的力量自然是不會太壯大的了。力量發揮不出來，成績也就不會顯著，擺着許多需要研究的問題動不了手，社會科學的地位也談不到提高了。如果社會科學被人輕視，我想主要是社會科學的队伍里自己沒有團結，沒有發揮力量的結果，怪不得別人。

我認為發展社會科學還得先解決這個對舊的社會科學的态度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談得到真正對舊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進行團結切磋工作。這是發展社會科學的第一步，是起碼的第一步。

(原載爭鳴 57年5期)

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者的 一些意見（第一稿原稿）

陳振漢召集徐毓樹、羅志如、巫寶三、

寧嘉風、谷春帆商談後寫成

（一）經濟科學工作和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科學（包括政治經濟學及其歷史，經濟史統計科學和部

門經濟學等）的任務是指導階級鬥爭的實踐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這兩方面任務雖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但在我國目前，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階級矛盾的基本消失，指導經濟建設的實踐的任務已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為着擔負起來這樣光榮和偉大的任務，伴隨着我國國民經濟建設事業的穩步進展，經濟科學工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趨於灭亡的規律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勝利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特別是因為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沒有為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定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案，因為從全國解放以來的八年中間，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基本上是在摸索著前進的，我們的經濟科學工作尤其需要加速開展起來，（以便在完成民主革命恢復國民經濟和基本上社會主義改造和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社會主義建設上所獲得的一系列的光輝成就，主要是由於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相緊密結合的原則所制定的路線方針及政策的正確領導的結果，我們各項具體工作，無可諱言多半是从摸索著前進的，我們的財經政策和設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蘇聯成例，（即是試驗錯誤）碰碰試試，主觀主義盲目行事，並未遵循什麼客觀經濟規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規律可資遵循的由此我們的工作並非沒有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也並非不出偏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也因為如此，雖然总的說起來，我們這些年來國家經濟建設突飛猛進，獲得了燦爛的成就，雖然錯了就改，偏了就糾，但已經造成的損失還是影響不小。

這也說明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經濟實踐顯然和經濟科學理論是脫節的，目前的經濟科學並沒有起到領導實踐的作用，事實上，我們目前的經濟科學還是停滯在相當幼稚的階段，除掉教條的搬運蘇聯教科書的一些東西以外，就是一些行政制度的描述，因而也還不能起指導實踐的作用，由於這種情況，許多經濟學家們也或多或少的感到自卑，情緒消沉，認為自己搞的這一行科學低人一等，有人甚至還唱起“經濟學無用論”的調子，這不能不說在當前經濟科學方面是存在着相當嚴重的問題的，我們認為為了更好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迫切需要使經濟科學變成一個能真正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科學是當前的一個迫切的任務，（也是為了促成這個要求）早日有效的實現（這個要求）我們提出我們不成熟的看法借向大家請教。

（二）當前我國經濟科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1）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我們認為首先應數經濟工作者對於經濟科學的輕視態度，現在我們的國家經濟科學工作如果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必要，主要是為了從這樣的工作的成果來指導經濟建設的實踐，因此我們國家的經濟工作人員應當是最能看重經濟科學工作的人，一個經濟科學工作者的最大驕傲就是他的工作成果能夠成為正確經濟政策的依據，能夠有利于國家經濟建設的步伐，只有他們才能

深切感到經濟科學的帮助和作用，也只有他們才能判断一件工作的价值，由此經濟科學工作的昌盛与蕭条决定于国家經濟工作人員的看法，因为如果經濟科學工作不是来自国民經濟建設的实际，結果必然劳而無功，而如果我們的業務部門不主动提出問題，科學工作者就只有做某書文的箋註或其他概念或文字遊戲了。对于他們所不了解或甚至輕視鄙棄的工作，業務部門自然也不会主动自願的来提供必要的資料，而至多是敷衍搪塞，应付了事，关于資料問題，当然还有保密关系在內，下文再当提及，由此可見我們的經濟工作者对于經濟研究工作的态度如何是經濟科学工作盛衰隆替的主要关键。

事實上的情況怎樣呢？在解放之初，北市的高等學校經濟學教師還有機會听到我們政府首長關於財經設施和政策的報告（以外），人民政府成立后，除了最近个别業務機構或企業單位曾經邀請一、二高等學校教師或科學研究機構人員談談，少數具体的技术性的問題以外，我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能有机会接触到國家經濟中的其他問題，這可能是因为我們有了政治協商會議在前和人民代表大會在後，財經政策法令經過這些民意機構的審議討論，因此已經符合立法手續，可以不必再行征求其他人意見了。也可能是業務部門並不認為這些所謂專家者能對本身的業務能有什么幫助，並不相信他們能夠提出什么中肯意見，因为在業務部門看去，這些所謂專家教授还不就是那麼回事，既不懂馬列主義，所仅有的一點業務知識还是从業務部門打聽去的，最多不过知道一些資產階級理論或者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設施，能對業務有什么幫助呢？因此怎过去这些年来，業務部門對於經濟科學工作始終只看作是（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里）包袱和和負擔，而自己以是施長予者和甚至主宰者自居，這種態度除受一定程度的宗派情緒所影响而外，實質上是經驗主義，否定科学的思想的一种反映，當然从去年起我們的各處業務部門几乎都成立了經濟研究機構，几乎都有無所不成部的景象，还能說不重視經濟科学的研究嗎？我們相信業務部門所以設立經濟研究機構不完全是为了裝飾門面摆空攤子，但是認為可以肯定這些機構所研究的問題主要是本部門的業務上的專門性問題，不会从事有关全国性綜合性和理論性問題的研究的，我們所謂經濟科學就指導實踐的科学，意思並不是說这里不談原理原則，而正是要通过客觀經濟規律对國家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提供依据（而这样的科学工作我們的国家領導人員是沒有見得重視的，由于他們不重視这样科学工作的作用），他們也瞧不起業務部門以外的經濟科学工作者。

經濟科学工作者所能起的作用也正是通过他們的工作成果，我們認為業務部門应当本着尊重經濟科学的精神来改进和經濟科学工作者的关系，而不能認為他們对于本身業務沒有直接帮助就冷淡得至于存心鄙棄。

（2）由於我們的国家經濟機構对于經濟科学工作的漠視，（使得經濟科學工

作)也由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科學在我国原来的基础薄弱，使得这些年来我們的經濟科学工作基本上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虜。对于教条主义在經濟学界泛濫的严重情况，于光远同志早在1954年就曾經敲起了警鐘，他說：我們現在的文章里面百分之五十是帶有引号的引文，百分之四十是不帶引号的引文，剩下百分之十是作者自己的話，虽然难免不是錯誤，照物以稀為貴的原則，还是弥足珍貴的，自从百家爭鳴的方針以来，情况已有了好轉，可是在我們感覺里，至少还存着下列的几个方面的問題：

(一)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接受問題：雖然現在有人提出来开放唯心主义的說法，事实上一般的了解是为了更有效的批判，在經濟学界我們也已开始做了一点介紹資產階級重要經濟學說象凱恩斯經濟學說的工作，也正是为了了解和批判，而沒有人提出来从这些东西里面是否也能吸取一些有用的概念或分析方法呢？例如凱恩斯的“乘數論”只是一种数字概念，是否也可以用来分析我們的投資效果的呢？又如資產階級經濟學中所常用的“边际觀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否也有它的用处呢？特別是象統計學這一門方法科学，对于社會現象的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但現在我們)資產階級統計學里面的許多方法概念，象選樣理論、常态曲綫、時間數列，和相关系数等等，我們感覺可以同样应用來分析我們社會經濟現象的，但被一概摒諸統計領域之外，而我們所學所教的統計成的除了加減乘除与簡單平均數以外，毫無其他內容，因之極端枯燥簡單和貧乏的东西，是否是我們过分夸大了有些學問的階級性甚至对有些东西(不懂)並不了解，也沒有接觸，但要是資產階級的便有草木皆兵之感，而对一切學問在未加接觸之前就有“草木皆兵”之感而一笔抹煞呢？

(二) 如何对待經典著作問題現在的風氣是經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証訓詁，逐字逐句轉述背誦，或者註釋訓詁，甚至連手民排校的錯誤或翻譯上的錯誤(都)拮据贅牙的譯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精神實質”，我們对于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一切經典著作毫無疑問是應該严肃認真地學習，但其目的在于懂得經典作家們的思想，觀點和方法，而不是字句，掌握這些著作中的本質的东西，而不是他們的枝叶，可是許多經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正能預見其大，不能洞燭凡微，正能預見趨勢，不能先卜年月地，十月革命爆發于工業落后的俄罗斯不就是显例嗎？可是我們从未有人怀疑馬克思和列寧都是著作等身，而且馬克思的許多著作都是出版于身后，又怎能保其每字每句都是珠玉呢？然而在我們这里多少年来又有誰敢公开提出关于“絕于貧困化”的怀疑呢？

不仅思想內容和概念方法方面如此，即是在闡述說明問題的体例形式，我們也不能加以絲毫变动，例如現在政治經經濟学教學中关于資本主义部分的講授大

綱，完全是抄襲資本論的体例，而且一般還認為这一部分是整個全部政治經濟學里面体例最完整的部分，但是我們經常感覺这样一种从完全抽象商品二重性的概念开始的体例是和我們从具体到抽象的認識過程相反顛倒的，事实上对于教師和学生这开宗明义第一章無異是当头悶棍，有的人甚至就此終身被这一关擋住在政治經濟科學的門外，然而直到今天又有誰會想到变动一下我們教科書中資本主义部分的体例呢？

（三）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間的界限問題：由於我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看成了僵化的文字，我們也慣于对任何不同于經典著作文字的說法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但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也都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並非停止在及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身而止，而是在繼續發展和丰富中的，因此究竟怎样才算發展，怎样又是修正主义的泥淖，在概念上容易划分界限，到了具体問題往往易于混淆，結果为了省事，为了安全，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这样可怕的名声；誰也不願多惹是非，这就堵住了經濟科学上的任何創造性發展的可能，而助長教條主义的气焰。

（3）資料供應問題也是影响經濟科学进展的重要因素。过去为科学研究或教學需要想找些实际資料真是难于登天。其所以如此，業務部門对于經濟科学的研究工作不重視是一个原因，过分強調保密也是一个原因，往往不重視科学工作的人，借口保密把資料封鎖起来，同时保密的界限不明确，动輒什麼都是國家機密，洩密者为國家叛徒，掌握資料的人如果不能够肯定的判断什麼是國家的机密什麼不是，則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資料蓋上“密件”兩字，或“絕密”，免得自身受到牽累，这样保密的范围就無限的扩大，甚至关于國家財政經濟方面的有些数字从首長們的公开報告中都可以推算出来的，却誰也不敢公开，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了，我們却在鼓中。

現在資料公开的大門似乎开放了一些，但也还是只聞樓梯响，不見人下來，我們認為要使資料充分的供應，必須要把保密的界限縮到最小的范围，並且明确规定其范围，例如銀行方面鈔票暗記，电报密碼，外匯头寸，黃金庫存應該保密，至于存款、放款、甚至銀行發行数字保了密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果有赤字發生，即令不知發行数字，也会从物价的变动，物資的緊張情況反應出來，保了密又掩盖不了公开研究讓大家來了解情况，对政府进行監督，提供建議，是不是更有利于工作的改进？明确縮小保密范围，解除对于保密的顧慮，大力宣傳資料的重要性是解决資料供應問題的前提条件。

註：（……）內为最初起稿时的語句。

我們对于当前經濟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

(第二稿)

[按：原稿經陳振漢等六人傳閱，作了許多修改，現將一些重要的修改部分，加以註解。]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物質資料的生产和分配規律的科学，是指导革命斗争和經濟建設的科学。解放以来，我国在恢复国民經濟，完成民主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戰線上，已經获得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輝煌胜利，但是我国的經濟科学却沒有获得相应的發展^{*1}。作为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一部分，政治經濟學在广大干部的理論教育上，曾經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到了目前已經顯然落后于形勢的需要，亟待改进內容和提高質量。比較严重的問題是，政治經濟學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我国不仅沒有怎样开展，而且还没有充分具备开展的必要条件^{*2}。因此就很难起到指导革命和建設實踐的作用，甚至在宣傳教育方面也往往脱离实际^{*3}。目前^{*4}我国經濟學界的空氣是沉悶的，許多經濟科学工作者的心情也是沉重的。当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近二年之后，当各方面的科学文化工作者都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舞下，热烈地期待着經濟建設高潮以后的文化建設高潮到来的时候，經濟學界仍然显得比較消沉^{*5}。原因在哪里呢？經濟科学工作怎样才能展开呢？我們願意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借与大家商榷。

我們認為首先应当肯定經濟科学是有它的廣闊前途的^{*6}。社会不斷發展，支配物質資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規律也在不斷發展。單就我們國家來說，最近几年來的革命和建設，已經提供了許多生动丰富的經驗和問題，如果科学地进行研究、分析和总结，使之成为系統的理論知識，就必然能够創造性地發展這一科学。这种科学的研究的成果，首先可以为我国今后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提供一些客觀依据，同时，在国际間也可能推動社会主义革命走向新的胜利。

我們中国的經濟學界应有信心有勇气担负起来这样的任务。这是中国經濟学家的光荣任务，他們也具有有利的基本条件。中国經濟学家有馬克思列寧主义作为指針，不象資產阶级經濟学者为其阶级立場所限，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質。中国经济学家有“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可以希望有最好的条件来展开科学的研究和爭論。目前我国經濟科学工作沒有怎样开展，整个經濟學界比較消沉。主要是因为多数經濟科学工作者脱离了实际，沒有掌握足够的研究資料，思想上長期受教条主义的束縛，同时若干經濟科学工作者的力量沒有很好地發揮起来，为了把我

們的經濟科學工作向前推動一步，似應從下列三方面着手^{**}。

(一) 密切經濟科學工作和業務部門的關係。公開必要的資料。

經濟科學工作者聯繫實際是應當從多方面進行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條途徑是業務部門。我們認為過去政府業務部門對於經濟科學工作的作用沒有足夠的重視，對於本部門以外的經濟科學工作者的聯繫不夠密切。

業務部門過去在國家經濟建設戰線上具有重大的功績，但也不可否認，過去有許多工作是在摸索著前進的^{*8}，在摸索中間發生過大小不同的缺點或程度不一的偏差。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也有不少是可以根據已知的經濟規律或科學知識事先防止的。聽說一些領導財政的同志^{*9}，根據幾年來的經驗，總結出來這樣一條規律，即是國家的財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勢將導致物價的上漲和物資供應的緊張狀態^{*10}。其實這是經過千錘百鍊的經濟規律，連這樣的規律也要親身經驗裡面去總結，我們的財經政策就未免過於忽視既有的經濟知識了^{*11}。又聽說^{*12}有的財經領導同志認為根據需要發行貨幣如通過發放農貸及收購農產品來發行貨幣，就不会造成通貨膨脹，這種說法若懂得經濟規律，就不會模糊的。這種例子或許是極其個別的，也可以說明經濟科學的作用^{*13}。

當然，我們不應該夸大經濟科學的重要性^{*14}，即使在今後有了廣泛和長足的發展，經濟科學工作對於具體業務的幫助或指導作用也只能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原理原則的而很少是具體實際的。經濟科學工作永遠不會也不可能代替具體業務工作。經濟科學的規律對於經濟政策的作用也並不是決定性的，任何具體財政經濟政策的制定要考慮全面的因素。經濟科學上的規律以及從經濟方面的因素來的考慮對於經濟政策的制定也只是一種參考。

我們所希望於業務部門的是能夠正確認識經濟科學對於革命和建設所能起或應起的作用，既不無視或者忽視，也不過分高估這一種科學對於具體業務的作用。在這樣認識的基礎上，加強和科學工作者間的團結。為科學工作的開展提供必要的具體條件。

首先，讓經濟科學工作者多有接觸實際的機會，經濟科學是一門極需要從實際出發的科學。過去我國經濟研究工作所以未能順利開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脫離實際。一方面沒有足夠的公開的研究資料，另一方面和實際工作沒有密切聯繫。科學工作難以結合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從實際當中去發現問題，結果就只好搬弄一些教條或者在名詞概念上進行爭論。多數經濟科學工作者對這樣的工作是抱有深惡痛絕的無可奈何的心情的^{*15}。整個科學當然就得不到發展。假使業務部門能夠主動的從本身工作中提出一些有關方針政策的理論原則問題，交給經濟科學工作者去研究^{*16}，或者在方針政策的決定和實施之前征求他們的意見，讓他們參與討論，也就是在方針政策上的廣開言路，多走羣眾路線，相信能够把經濟科學

工作和实际結合，从而發揮科学工作者的積極性，促使这一科学的健康發展和繁榮昌盛。对于業務部門本身的工作來說，縱使不能希望从科学工作者方面获得急功近效，例如在一次座談會上就能解决全部問題，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不也会毫無帮助的，何况是为了促进經濟科学工作的开展，从長遠的利益着想呢？^{*17}

其次，希望業務部門能够主动地对經濟科学工作提供必要的資料和便利，截止現在，科学工作者或教師即是仅仅为了找一点零星材料作論証根据已是十分困难，更不必說系統的科学研究材料。关于資料問題，現在各方面的呼呼已經不少，我們不必再多說。只是我們也知道業務部門对于資料所以斷而不放，除了对于科学工作的意义和資料在科学上的必要性并不象科学工作者那样痛痒相关以外，也確實还有保密責任在內。所以关于資料保密問題，我們不妨再貢獻一点淺薄意見。

过去由于強調保密，許多人就多了一种搪塞应付的借口^{*18}。掌管資料的人為了減輕責任起見，尽量把資料蓋上“机密”或“絕密”的圖章，甚至空表格也是絕密。这样一来，保密範圍就可以扩充到無窮大。例如有的財政經濟数字，从政府首長報告中本来很容易推算出来，可是誰也不敢公开，有的材料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已經众所皆知，在我們却还是国家机密。工業數字保密，農業數字也同样保密。保密是必要的，但範圍很可以縮小，應权衡某項資料公開后的利弊，重新考慮是否需要保密，然后加以明確規定。例如銀行方面，鈔票暗記，电報密碼，外匯头寸以及黃金庫存等材料之应当保密，可謂毫可疑义；但是存款，放款乃至發行数字，是否全需保密？我們認為，重要的調查報告固然应当發表，大量的和繼續性的經濟資料，如生产統計、物价指數、生活費指數以及對外貿易統計等等，也应定期公开发表。我們所要求的还不仅止于多获得一些“內部資料”，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公开性，这也是扩大民主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公开发表資料，不仅使科学工作者运用資料更感湊手，更重要的是借此能公开討論問題，在爭辯中对运用資料沒有什么顧忌，这显然是能够大大地推動科学研究工作，并促进广大群众对經濟問題的了解。就是相关的業務部門也可以更多地了解彼此的情况，在决定各自的方針政策和具体措施时具有更多的参考資料。考慮問題可以更全面些^{*19}。

（二）加強經濟學界內部的團結，特別是黨內外經濟科學工作者之間的團結。

我們以為，相对于所負擔的任務來說，我国經濟學界現有的队伍还是小的，力量还是薄弱的。發展經濟科学事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加强黨內和黨外經濟科学工作者間的團結，調動羣眾中的積極因素來為這一事業服務。現在我國經濟學界虽然并沒有十分显著的不團結現象，但也不是精誠無間，不是大家都緊密地團結在党的周圍，致力于新中国經濟科学的發展，其所以这样，个别經濟科学工作者

的文人相輕習氣固然有些关系，比較更重要的因素是黨內和黨外經濟科學工作者之間還沒有很好地團結^{*20}，我們希望黨內經濟科學工作者能够关怀和帮助广大的外的經濟科学工作者，主动地和他們联系。現在对于不小一部分人，甚至完全不知道他們，更不必說各人不同的長短，因此^{*21}，也說不上对于他們的潛力有足够的和恰当的估計。

由于多數的党外經濟科学工作者过去所学的是資产阶级經濟学，需要勢力自我改造，因此解放以來，許多方面的任务如理論教育和干部培养，科学研究和經濟行政，都不得不落在人數不多的黨內經濟科学工作者身上^{*22}。由于黨內同志的繁忙^{*23}，对于党外同志就自然不能多所联系、关怀和帮助，但到了去年党重申它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时候，由于党外學經濟的人阶级觉悟和理論水平一般已經有了提高；由于青年經濟学者的培养和成長需要一个过程，当前經濟学界的力量还是十分薄弱；以及由于經濟科学是一門实际的科学，業務部門需要許多經濟科学工作者，經濟科学需要一个更壯大的队伍^{*24}，我們認為已到了适当消除新和旧、或黨內和党外經濟学人之間的界限，加强黨內党外經濟学人的團結了。

可是一年多以来，有些人为的牆和溝还依然存在着，例如在不少高等学校和个别科学研究机构里面，政治經濟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还由黨內同志进行^{*25}。一般党外經濟学人無从插足或仍只能以經濟思想史、經濟史或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等的博古通今的工作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又如同在業務部門的經濟研究机构里的工作人員，黨內和党外的同志所能看到的資料的机会并不均等^{*26}；又如对科学学术見解上的簡單否定^{*27}，对于科学成就的不同估价，也还不能完全摒除。諸如此类的界限的存在，我們認為是不利于加强党内外經濟科学工作者的團結的，也不利于發揮党外經濟学人的積極性的。除了上述業務部門應該加強和經濟科学工作者之間的联系以外，我們認為黨內經濟科学工作者^{*28}，不論是在業務部門，在高等学校和在科学研究机构的，應該加強和党外同行的联系，增进对于他們的認識和了解，欢迎他們参加适合他們参加的工作，和他們分享自己所能享受的工作便利。

（三）經濟科学得以健全發展的另一个条件，是擺脫教条主义的束縛。擺脫教条主义的办法無过于投身到實踐中去，這一点已在上面說过了。

由于經濟科学工作不被業務部門重視，由于經濟科学工作者不能接触实际，經濟科学工作者在这些年来基本上不能不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虜，对于教条主义在經濟学界泛濫的严重情况，中宣部的一位同志早在 1954 年就敲过警鐘。他說我們現在的每一篇經濟論文里面，百分之五十是帶有引号的引文，百分之四十是不帶引号的引文，只有百分之十是作者自己的語言。自从党提出百家爭鳴的方針以来，情況已有好轉^{*29}，可是我們感覺到在研究工作中常常还会得逢到下面这两个問

題：

(1) 如何对待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問題。一般認為，開放唯心主義只是为了更有效的批判。經濟學界已開始做了一點介紹資產階級重要經濟學說象凱恩斯學說的工作，其目的似乎也只是为了了解和批判，還沒有人提出批判地吸收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大特色，便是批判地吸收和利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国主義論是這方面的最好的典范。馬克思和列寧以後，隨着帝国主义形勢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有了很大發展，其中是否还有某些地方反映了（那怕是歪曲地反映了）現代資本主义的實際情況，可供我們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呢？資產階級經濟學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經濟學或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服務呢^{*30}？

(2) 如何对待經典著作的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毫無疑問應該严肃認真地學習，但學習的目的是在於領會經典作家們的思想觀點和方法，而不在于死扣字句；是在於掌握這些著作中的本質的东西，而不在于堅持它們的細枝末節。可是現在的風氣是奉經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為金科玉律，只能照本轉述背誦，或者箋註訓詁。我們認為這樣的風氣是不利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从而作为其構成部分的政治經濟學）最本質的东西是实事求是，隨着社會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31}，適用於一定歷史時期的理論解釋或理論總結，不一定適用於另一段歷史時期。例如貨幣的購買力（價值）是否必須以黃金的價值來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是否不斷下降，產業預備軍的百分比是否必然擴大，這些問題都可以根據現實情形重新研究。

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過去大家迴避它，不談它，實際並未解決。我們覺得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和黨在科學方面的領導下好好開展研究與爭辯才能解決這些問題，也使認識錯誤的人得到实事求是的教育。我們有毛主席的六條標準，緊緊掌握這六條標準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不会得陷入修正主義的泥淖里。

我們堅決反對修正主義，我們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我們同時也主張：對於現實經濟問題要作現實的探討，不能固步自封^{*32}。

〔註解〕

* 1 此句：原為：“但是我們國家的經濟科學似乎沒有起它所應起的作用”。（由別人刪改）

* 2 此句：原為：“而且還沒有具備開展的必要條件，也沒有找到開展的正確方向。”（由別人刪改）

* 3 此句：原為：“宣傳教育講壇上的說教也就無法不和實際生活脫離。”

- * 4 “目前”后，在原稿上别人曾插入一段，“我国經濟科學的情况，不能說比毛主席在1942年批評經濟學家不能解釋‘邊幣’的情形前进了多少。”这段又被另一人刪去，并有一批語：“这一段似可不要，一則兩個時期很难比較，同时会引起一些人不滿意。不要这段也不至于影响文章內容”。
- * 5 “作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部分，……經濟學界仍然显得比較消沉，”一段，原稿用紅筆括起，谷春帆在其意見書中說：“这一段建議取消，換上几句較生动的叙述，例如：“在大學里政治經濟學是認為比較淺易的學科，优秀学生不願讀，畢業的学生也难于找到适当工作，为什么这样一門重要的課程会得出这样不受重視呢？”
- * 6 “前途的”后，原有一句：“端正社會尤其是實際經濟工作者对于經濟科學的認識。”（由陳振漢刪去）
- * 7 “我們中国的經濟學界应当有信心有勇气……似应从下列三方面着手。”一段，原为：“我們中国的經濟學界应当有信心和勇气担负起来这样的任务。这不仅是我們当仁不讓的义务，我們也有能够完成任务的条件。我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为指針，不比資本階級經濟學者容易为階級立場所限，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質。我們有百家爭鳴的方針，沒有或者少有可能受到个人崇拜的思想束縛。但是为什么我国的經濟科學工作到現在还没有怎样开展，整个經濟學界也还是比較消沉呢？我們認為有下列的三个方面的原因或者障碍，使得經濟科學工作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發展方向，还没有具备必要的物質条件，現有的科学力量沒有充分發揮。”（主要是別人刪改，陳振漢刪改了个別詞句。）
- * 8 此句原为：“过去許多工作是在暗中摸索前进的。”（由陳振漢刪改）
- * 9 “同志”后，原有“曾經公开宣称”一句。（由別人刪去）
- * 10 此句原为：“其实这是經濟常識”（由別人刪改）
- * 11 此句，原为：“我們的財經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們的財經工作也未免太兒戏了。”（前一句別人刪改，后一句由陳振漢刪去）
- * 12 “聽說一些領導財政的同志……又聽說”一段，原稿用紅筆括起，谷春帆在其意見書中說：“这一段拟改为：例如国家的財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勢將导致物价的上涨和物資供应的緊張状态。这是历史上早就肯定的經濟規律，这是不需要再有摸索的。”此段旁边，有一邊註“書香再看一看，与原来所說的是否無實質上的出入。”
- * 13 “有的財經領導同志認為……說明經濟科學的作用。”一段，原为：“有的財經領導同志在公開會議上認為發行貨幣如果是适应需要，如發放农貸及收購农产品，虽不能說是通貨膨脹，也是違背經濟常識的說法。說明我們的業務部門領導同志好凭一己經驗領導工作的作風是严重的，这样就看不起經濟科學的

作用，也就不会重視科學研究。”（由別人刪改）

*14 此句，原為：“我們並不是以此責難業務部門，在過去既然經濟科學工作根本沒有展开，我們沒有理由指望別人尊重。”（由別人刪改）

*15 “心情的”後，原有一句：“在客觀效果上給這一科學籠罩上一層暗淡”（由陳振漢刪去）

*16 “研究”二字，原為“解決”（陳振漢刪改）

*17 “經濟科學是一門極需從實際出發的科學……從長遠的利益着想呢？”一段，原稿用紅筆括起，谷春帆在其意見書中說，“這一段擬改為：‘如何使理論與實踐得到結合這問題可以具體討論，或者由業務部門提出問題委託經濟科學方面去研究，或者由經濟研究方面提出問題由業務部門幫助搜集資料和供給實踐便利。但首先要正確認識經濟科學的作用，善于利用這一科學方面的力量，並培養它的發展前途。’”

*18 “借口”後，原有一段：“但保密制度對於資料問題的主要影響還在於界限不易明確，因為什麼是國家機密或什麼不是，在沒有比較明確的規定之前是可以言人人殊的。”（由別人刪去）

*19 „但是存款、放款、乃至發行數字……考慮問題可以更全面些”一段，原為：“但是存款，乃至發行數字就沒有保密的必要。因為這類數字，公開了，不會出什麼毛病，不公開不能真正保守住秘密。有人假如一定要知道，他是不難從別的已經公開的數字中推算出來的。例如關於貨幣發行數字，我們保密的目的可能是要掩蓋萬一出現的財政赤字。然而發行數字能夠保密，難道物價變動和物資供應情況也能一概掩蔽羣眾的耳目嗎？所以保密的尺度如果不是盡量縮小，必然得盡量擴大，以至於無所不密為止，我們能夠設想這樣的情況嗎？公開出來，讓大家了解情況，對政府進行監督，提供建議，不是更有利於工作嗎？”（由別人刪改）另一人將“過去由於強調保密……考慮問題可以更全面些”一段，全刪去，改為：“我們的意見很簡單，我們認為經濟學者應當接觸實際，擺脫教條。過去我們是被放在一種不能接觸實際的地位上，被放在一種不能不教條的地位上，而這就堵住了經濟科學發展的道路，使經濟科學遠遠落後於經濟建設的實踐，使經濟科學對國家經濟建設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我們認為應當改變這種情況，而第一步就要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使實際經濟工作和經濟科學的研究工作能够結合起來。”

*20 “現在我國經濟學界雖然沒有十分顯著的不團結現象，……還沒有很好地團結，”一段，谷春帆在其意見中說：“這段似刪”。

*21 “因此”後，原有“也對他們不能有衷心的尊重”。（由陳振漢刪去）

*22 “由於多數的黨外經濟科學工作過去所學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都不得不

落在人數不多的黨內經濟科學工作者身上。”一段，原為：“由於多數的黨外經濟學人過去所學的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其中有的並且直接間接為反動階級長期服務，因此，解放以來這些歲月中間，需要努力自我改造，其中的極多數也自覺地進行了學習和改造，並且具有顯著的成績。因為如此，黨內經濟學和黨外人士在過去既無從相知，解放以來又因為形勢需要不得不擔負起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宣傳任務，培養青年科學工作者的任務，以及科學研究的任務，許多方面的任務，如理論教育和干部培养，科學研究和經濟行政，都不得不落在黨內經濟學人身上。”（由別人刪改）

- *23 “由於黨內同志的繁忙”原為：“在這樣一人而數任的情況下”（由別人刪改）
- *24 “由於黨內同志的繁忙……更壯大的隊伍”一段，原稿用紅筆括起，谷春帆在其意見書中說：這段擬改為“現在經過八年，情況有了改變，舊經濟學者經過初步的思想改造一般有了提高。還有許多問題非在百家爭鳴之下，實事求是的展開討論不能解決。因此，”
- *25 “主要由黨內同志進行”一句，原為“還視為黨內或少數黨外積極分子的禁臟”（由別人刪改）
- *26 這句話旁有邊註：“黨內各級人員也不一樣”。
- *27 “簡單否定”原為“政治歧視”（由別人刪改）
- *28 “我們認為黨內經濟科學工作者”一句，原為“我們認為經濟科學工作中的的黨”（由陳振漢刪改）
- *29 “情況已有好轉”一句，原為“情況略有好轉”這句話旁有邊註：“要從大量實踐材料中提出理論性的材料還需要長時間的鑽研”
- *30 “馬克思和列寧以後，……是否也可以用來替社會主義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呢？”一段，原為：“馬克思和列寧對於資本主義總危機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做的工作，是否也可適用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呢？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是否是全篇胡說八道，一無可取，或是還有某些部分反映了（那怕是歪曲地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實際，從而具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可供我們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呢？資產階級經濟學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來替社會主義經濟學或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呢？對於這些問題，在對資產階級經濟學作透徹地研究之前，最好作為懸而未決的問題看待。我們主張：對待資產階級經濟學應當本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精神，先透徹研究，後考慮是否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利用的問題；而不要預先存着一無可取的想法，對之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由別人刪改）

*31 “不斷發展”后，原有一句：“泥古不化本身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由別人刪去）

*32 “固步自封”后，原有一句：“是敝屣就要摒棄”（由別人刪去）

附註：①原稿最後一頁，有這樣一段批語：“整個第三段叫人有这样一个印象，擺脫教條主義原来是为了要調和資本主義，修改馬克思主義，会不会有此誤解？是否不要提到對待資產經濟學和經典著作這樣的總題目來說，是否再強調一下依靠馬克思主義和黨在科學方面的領導來進行研究，請大家斟酌的一下。”
②原稿第三部分，由徐毓枏執筆，其餘部分皆由陳振漢執筆。

陳振漢在經濟科學座談会上的發言

（按：這是陳振漢在他所召集，拟定反动經濟科學綱領的
兩次座談会上的發言，是根據記錄整理的。）

1957年5月26日（第一次）

過去學經濟學還有點勁，不是這樣自卑，比政治學有勁；與自然科學相比，雖然不是純粹科學（Pure science），經濟還實際一些，院系調整後感覺沒有什麼勁，經濟學作為一門學問（一）與學問不相稱，（二）即令作為一門純粹學問也不象有什么科學價值的東西，教的不是我們以前了解的科學，科學總是說明因果關係的，而現在只是些 Dictums（語錄、金言），有些東西沒有接觸，不懂。例如什么是規則、規律，規律應為兩者之間的關係，現在規律只是 Stalin dictum（斯大林的金口玉言，斯大林的語錄），斯大林的話是主要內容，只是替大人物做些註解說明，作為一門學問似乎不象，至于教學，以綜合大學為例，教為了什么？且不談作為其他系科的政治理論的政治經濟學，只談本系的政治經濟學，此專業人數很少，30—40人一班，在校學生150人左右，其他綜合大學經濟系也大概相似，與理科或其他文科比人少，培养目標為大學教員，科學研究理論工作干部，目前的科學研究徐（毓枏）說是概念遊戲，似乎為文字遊戲（Play of words）目前有此觀覺。

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有許多組，政治經濟學組，搞各種社會規律，還有其他組，也提不出一個方向來，據目前說對這一行，究竟這些工作究竟有多大意義。羅（志如）教國民經濟計劃，感觸可能很多，究竟有多少實踐意義，在現在制度情況下，經濟學可有可無，可以說沒有。政策的制訂者國家計劃委員會，除了他們的工作外是否還有經濟學？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對他們有什么關係？陳云，李富春要一些材料也就是他們那些機關的材料，經濟學家和經濟科學是否還有这些东西？實際也不坏，解放後的財政經濟搞得也不坏，很平穩，也沒有用什么高

等学校的经济学家，也許解放后，有这些旧为，有人因这种科学，因此要搞下去。但究竟要不要搞？

另外，我們的經濟制度与资本主义經濟制度不同，我們集中領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生产关系也簡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自由竞争，誰也不曉得对方，有些东西复杂，如对外貿易和銀行，因此有分析，为資本主义服务，为其国計民生服务。我們有計劃有平衡不复杂，搞坏了沒有多大关系，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物价生产变动影响那样大；我們不同，有些变动关系不大，物資少，頂多多排队。

过去旧大学的人，有些确有抱負想作些有用工作，这些人的积极牲，不能發揮，这一行处处低人一等，这些人关系或許也不大，从党看，人数既不多，积极牲未發揮影响也不多，財經方面的人未作适当安排，未开課的有2000多人，恐怕即令都使出来也不过如此，現在虽未使出来，也还做些翻譯工作，可以研究，如果作用不大，是否可以取消經濟專業，讓这些人搞些翻譯，整理国故是否更实事求是一些，我与費孝通不同，費孝通想恢复旧社会学。这些人搞些翻譯，整理国故，不找这些人，專業也不必要。現在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是施的情况，我們不否認，究竟重要不重要应有一个說法。

每年增加二、三百人，只就数量說，如此，就質量說，每况愈下，能学理工农医的就不来学經濟，剩下的才学經濟，这样下去更沒有勁头，和徐毓枏、罗志如談过，对問題看法分析不同，但总的看法还相似，我們的看法还片面，業務部門或許有二种情况：（一）重要的，（二）直接接触業務的领导同志就表示出来，其中存在很大問題，因此請宁嘉鳳、谷春帆來談談，是否他們也有类似想法或完全不同的想法，想請計劃委員会的人，但沒有朋友，說得乱，请补充。

× × ×

苏联四十年来，理論应用成績不大，在历史經濟史方面，除了列寧、斯大林全集外，还提出什么来供后世后代？很少，人數相当多，書、文章也不少，也不全是沒有搞，这方面劳动还是不少，替这些人想好象是很悲惨的局面，四十年来到底政治經濟学作为科学对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有什么作用，只培养一些教学宣教人員，一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四十年的回忆不是欢欣鼓舞的。

× × ×

罗森貝为一旧人，勒雅申柯也是一个旧人，功夫下得不少，至少还淵博 (Sckoeanokin) 这些是旧社会遺留下來的人物，四十年来划时代 (monumentae) 的东西少。

× × ×

按教科書一套搞不下去。

× × ×

計劃委員會研究目標明確，但科學院與學校搞什麼不清楚，可以取消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其他組，只留經濟史及思想史。

×

×

×

經濟科學的障礙物排队：（1）材料，（2）教條主義，其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一套東西，實踐走在前面，掌握實際政策的人心目中是否有經濟科學，有沒有經濟學家？如果問題要用科學原則、原理來解決，便可以相互發展，相互為因，相互為果。掌握實際政策的人如果認識有这样的必要，對他們工作有幫助，則資料便不成問題，也不会感到向他們要材料的人是負擔。

1957年6月2日（第二次）

整理上次發言，發現談法不一，谷春帆偏重于政治經濟學、歷史或社會發展規律，其他則多為財經、計劃等。問題是用什么名詞把所談內容概括起來，用政治經濟學一詞容易被了解為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內容，用財經字样則又易被誤解為財經那一套。最後決定用經濟科學一詞。但經濟科學不起作用究研指什么？是否指馬克思，抑也指毛主席、李富春，而他們又沒有這些困難，黨的政策方針和毛主席的農業合作化指示是否經濟範疇，如果是，這些又沒有什麼困難，因此又不包括這些，剩下的只是在學校或科學院工作的象我們這些人。

上次偏于低調，情緒多，正面的少，因此究竟我們心目中的東西能够起什麼作用，概括不起来，只能從指導實踐的經濟科學方面做文章，因此，上次所談許多東西未能概括在內，最後成為個人偏見多，大家所談不多，從文章思路中連系，割愛的很多，估計其中問題很多，很應重新搞。原擬再談一次，但谷春帆要離京，怕愈拖愈沒有勁；而普遍又有這些情緒。

文中教條主義名詞，談時未提，小標題是我加的，自己也舉了一些例子，假定思路保持，則例子更需變動，或可以完全不管這個初稿而重搞，或用其他方式。

×

×

×

于光遠說過經濟學是最重要亦是最落后的科學。

×

×

×

教條主義使人滿足于簡單解釋。

前面的幾句話，在說明經濟學是不景氣之前，應說明經濟科學能起什麼作用。谷說主要為科學指導實際，不談具體業務，不以政策為對象，但亦不避免政策，是否通過具體的例子如財政赤字，外匯等有力的說明科學之有用，然後再講何以科學不景氣。

文中三方面何者為第一？

×

×

×

經濟學家的競爭者好自封的一些人，如經委。對此工作消極和積極考慮……

帮助……类似效果應該有，类似感觉的人不少，有些沾沾自喜的人还好，但教政治經濟學的人並非無人感到苦悶。

×

×

×

此工作应否做呢？

×

×

×

(如果) 从科学談則暗淡情况如何說？

“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

南京大学中文系講師劉地生的文章摘要

如果共产党这次整風，能够徹底鏟除为害人民的三大主义，共产党就不啻第二次解放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

消灭三大主义的根本办法，在于消灭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那么，讓我們看看什么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

首先，仅允許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产生三大主义的主要条件。（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的反映）。因此要消灭三大主义。必須首先消灭少数人享有持权，而多数人仅供听命和驅使的現象。真正把宪法規定的人权交还給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这才能逐漸根絕三大主义。

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說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說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說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應該超过六亿人民的利益。当然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确有矛盾。某些人硬抹煞这种事实，說这两种利益沒有一点矛盾，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一点，我覺得應該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針應首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發，不應該首先从党的利益出發。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沒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員發布命令或指示。

为了將来科学建設的前途着想，必須讓青年学生純潔的头脑自由成長。青年时代的头脑一經定型，以后要客觀的研究真理，就比較困难。因此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員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別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組織。大学里的政治課自由选讀，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

力。

(摘自南京大学校刊“南大生活”)

群众要推翻共产党

葛佩琦

葛佩琦說，至今羣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羣眾對共产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羣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总有那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

他說，羣眾為什麼不敢信任共產黨呢？因為羣眾在八年中体会到共產黨善變，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顧高級知識分子，校部派公務員送飯送水，今年實行精簡節約，又取消了公務員。黨組織對人，認為有用時，把殺過朋友、殺過同志、殺過黨內人的人都當作寶貝；不用時，把對流過血和汗的人關在大門之外，冷若冰霜。有些黨員六親不認，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兒子入党給媽媽來信稱同志。這些事例說明，羣眾不信任共產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說，1949年羣眾對共產黨不會有這麼多意見。三害不鏟除，狂瀾既倒，挽狂瀾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個可能被狂瀾沖走，葬身魚腹。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蕭乾

一

前天我去一家洗衣店取衣服，櫃台外邊有個顧客正跟店員吵嘴，大概店里把那人的衣服給燙糊了一塊。客人氣勢洶洶，忘記了洗衣店早已公私合營，就滿口飛起“資產階級思想”、“唯利是圖”一类五反時期的帽子；可是帽子越大，櫃台里頭的那个人越不服氣。他說，燙糊了，我們向你檢討不就完了么！（“檢討”兩個字是橫眉立目地嚷出來的，說的神氣跟那個字眼兒很不相稱。）那個衣服給燙糊的人顯然沒從這個“檢討”得到任何補償（無論是精神上或者物質上），所以也還是不肯罷休。這時候，店員就綻起臉來，儼然占了上風似的，理直氣壯地說：你這個人真是學習得太差啦！我既然向你檢討認錯了，你怎么還不依不饒？

我在旁听了，頗有感触。在我們的社会里，有濃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氣，可是把政治庸俗化的程度也很可觀。“檢討”居然成了以退为进的反攻战术，“學習差”成了罵語。

那個店員怎么会想出“搶先檢討”这个“高明”战术来的呢？这里，近年来我有一种自己沒有把握的觀察——沒把握，是說，我這個觀察可能完全不对头，而且我也希望它是不对头——那就是：由于种种因素（包括历次运动的搞法），我們這個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間存在着一种戒备状态。譬如說，挨了批評明明心里不服，不过嘴，反而搶先檢討之类。这种“革命世故”的表現还有：对人不即不离，發言不痛不快，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沒有个自己的看法。

这种現象的形成，每個人都有責任（譬如說，作家們勇气不足），但是教条主义者的責任也很不小，他們大半都居于领导地位，而敢于用胳膊抗拒車論的螳螂畢竟占少数。我国有兩句非常形象化的成語：“杀雞嚇猴”“兔死狐悲”；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絕不是一个人，而是許多人。

解放初期，我見过西南出的一本小冊子，批判一部有原則性錯誤的長篇小說（“再生記”），其中，有些篇是这么开头的：“我看了×××对这部小說的批評，深为憤慨”。然后，就根据对那部小說的批評，写起批評来。

“十五貫”在古典劇的整理工作上，的确是个巨大成功。中央推荐它，是叫大家學習这种从积极方面搞戏的精神。可是有一天早晨，我拿到“人民日报”嚇了一跳，七版底下登的是全市各个剧院、各个剧种，清一色的“十五貫”。当时我想：这可說是我們文化界“响应”党的任何本身無可非議的号召最典型的表現了。

我問过一个朋友：咱們這個革命的社会就是要不断地出現更新、更好的見解，为什么反而会这么人云亦云、人演亦演，这么缺乏独創性呢？他說，因为咱們这个社会反对个人突出。可怎么能把个人風格、个人看法，跟个人突出混同起来，一道消灭呢？可怕的是，不少人認為这就是“組織性紀律性”。

可以說，人之異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沒有独立思考，馬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費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辯証唯物主义。沒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魚生肉沒經過烹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养，一定反而还会鬧消化不良。在一个意义上，我覺得“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說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們的文化血脉才能舒暢，我們的創作才能繁荣。

我看“百花齐放”里要有兩個“放”字才成，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来，一是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要“放”得下心。

为什么过去文艺工作倾向于採取行政领导的方式呢？我看就是因为领导对被领导者不够放心。为什么目前有些刊物编辑对“鲜花毒草”問題还在嘀咕？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对今天讀者的判断力以及对绝大部分写稿人的政治水平还不够放心。甚至，为什么我們的論文写得那么囉嗦？我們的創作为什么那么缺乏余味？我看也是因为作家对讀者的理解力和想像力不够放心。而能不能真正改变文学刊物机关化的狀況，估計关键也就在这上头。

資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文化人是放心不下的，我們應該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正义在我們这边，人民在我們这边。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二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們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牺牲我的性命，來維护你說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蘊藏着他們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傳統和制度的自豪。現在，他們那宪法早已經被麦卡錫、杜勒斯壟斷資本的走狗成踩一团爛紙了。現在，提起这句话来，那些国家的人民感到的不再是自豪，而是憤慨，諷刺和哀伤。那句豪迈的話意味着：一个人說的話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說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許說不对的話是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驗。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詡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考驗面前早就破了产。他們資产阶级的革命先烈用鮮血換来的“大宪章”，早已經被那些金融大亨、軍火大王指揮下的反共大家撕成碎片了。

从“共同綱領”到宪法，我們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論、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規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政府从来也沒下命令查禁过一本書。可惜我們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說：每个中国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們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間，我們在民主精神的鍛鍊上，不能算很多。所謂“民主精神”，應該包括能容忍你与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話。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們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專政”的时候有些偏，輕易把“亂說”当作“亂動”来办，就会在維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實質上是違背宪法的事。

目前“爭鳴”主要还是靠中央来号召，靠一般“运动”的空气在支持，勁头很大，但是要持久下去，就还需要一种保証，树立一种社会風气，甚至像党中央对批評与自我批評那样制定出一条原則：不以橫暴态度对待別人的看法、想法和說

法是每个公民对宪法应尽的一份神圣义务。

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是那些把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責任，他們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來說，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三

談到“放心”和“容忍”，当然誰的思想里也不会包括反革命的言行。然而要保証長期在人民內部貫徹这种民主政策，就需要在不正确的見解与反革命的言論之間，严格地划一道紅綫，而今后的偏向和困难，可能就潛伏在这里。

在目前的初夏气候里，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們，在中央的撐腰下，得到一抒己見的机会，心情当然是豁然开朗了；而有些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心里我估計可能会有“知識分子本来就好搞，这下子就更加不好搞了”之感。其中，我还估計最感覺棘手的，是做人事及思想工作的，如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人事科科長們。可是我也听到不少人說：今后民主空氣保証得了保証不了，作为党组织处理“人”的問題的左右手的人事部門的做法，还的确是个关键。

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剛提出來的时候，我听到一位民主同盟的盟員私下里說：从政治鑒定評級評薪，到領結婚登記的證明書、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兒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里，还談什么互相監督。当然，这个說法偏，甚至歪，在感情上显然对人事部門有抵触。我們只要拥护人民民主專政，接受党的領導，就應該尊重人事部門，認識到它在机关內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人事部門是不是同时也应该考慮一下今后如何改进工作的方式呢？

我知道有些非党同志干脆把人事科看作駐在机关内部的派出所，不过今天的派出所也大大不同于以往了。解放前，派出所是神秘的、恐怖的，一般人走路宁可多繞几步，也离它远远的。今天的派出所呢，南屋里正給孩子們种牛痘，北屋發着粮票布票；西屋里一位同志也許正舌敝唇焦地給人調解家庭糾紛，从早到晚，市民是川流不息地來往。总之，派出所今天已經从神秘恐怖变为体现政府关怀人民的机构了。可是就我的見聞所及，有些机关团体的人事部門虽然沒有恐怖，但却多少帶有一些神秘味道。科里时常是一只放人事材料的保險櫃（我个人的印象是：这种材料非党的领导干部即使对工作有好处，也看不到），和一些跟大家不大往来的老干部。这种隔閡一小部分是工作上的必要（其实，我始終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必要），一大部分是由于經歷的不同。这些老干部的优点在

子單純，而他們工作上的缺点也常常發生在这上头：他們对中国旧社会不大了解。因而，对机关里的知識分子时常也就缺乏了解。輕則和一般干部互不往来，重則在文化和政治上，彼此各存着輕蔑心里。

另外，还有人这样感覺：給党总支（包括中央宣傳部）或是人事部門寫信，时常是石沉大海，不見回音。这个滋味比挨頓棍子要难受多了，政治上得到的帮助也少得多。这自然也更增加了不健康的神經感，它本身就形成一道完全沒有門窗的牆。

自然，在全国范围來說，人事部門的工作一定还是健康的。他們非常辛苦，也做出許多成績，一笔抹煞是不公平的；不过，在我个人有限的接触中，我感到有些人事部門的工作有缺点，而这种缺点对于解决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弊多利少的。

比方說，一个人民团体的民盟組織在討論吸收某一同志入盟的时候，与人事部門有联系的負責同志在介紹材料时提到：'在某一国际事件發生时，有人反映这位同志會說过一句什么不很正確的話。

那个人民团体从肃反运动中总结出一条教訓：沒有确鑿証据，不能轻易構成嫌疑，因而也不能轻易进行追查。可是一个公務員（一个党员同志的外甥）由于某干部对他的工作提意見，他立刻倒打一耙，硬說三年前曾經連續五次看見那个干部在宿舍里有猥亵行为。人事科不問青紅皂白，就派了兩個人进行調查；而且，調查了半年多，到現在仍然沒个下文。

这个团体有个附屬機構，过去一段時間那里沒有党员。支部書記和掌握人事科的副秘書長（同一位同志）主要信赖機構里一个“积极分子”的一些“反映”。結果鬧得內部疑神疑鬼，互不團結，並且使得羣众一度跟支部对立起来。直到那个機構有了党员，並且挨到肃反后期，才發現那位“积极分子”原来並不怎么积极，然而工作上早已造成了無可弥补的損失。听说機構里一位参加工作七、八年的同志已經堅決退出了革命队伍。这算不算是主观主义的作法呢？

連封建时代的法律还講究凶杀必有凶器才能成立，我認為为了明辨是非，防止把挾嫌誣陷与真正向組織彙報情况混同起来，應該給“反映”定出一个規格来；比方說，必須有某种証据或旁証才能算數，不能任何人一句話就能叫另外一个人背上黑鍋。第二，不必要的拖延只有加深羣众与組織之間的距离。既然調查了，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宜于不了了之。第三，对于一句不正确的話，即使証实了，也只能作为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想法，不宜遽然成为跟着这个人走的“人事材料”。第四，應該承認說出来的不正确的話比不說出来的要好，它得到的待遇不应该是被暗地里記下来，而應該相机地进行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矛盾得到解决。

我們的人民政权主要是倚靠人民的积极力量，广泛地联系羣众，而不是主要

倚靠少數人的“反映”。過去，有些人事部門的工作可能過分偏重於警惕的一面。對於“反映”雖不至完全聽信，可也要求不苛。歷次運動對顯然有意捏造和挾嫌誣告者，事後似乎都沒有什麼懲處。如果缺乏直接的接觸，只根據少數人的認識來判斷多數人的情況，就不容易避免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

大凡用這種方法工作的人事部門，必然平時對干部成見一大堆，真正遇到肅反那樣时机，反而心中無數。事實上，由於準確的“反映”而抓到特務的事有，由於不準確的“反映”而嚴重地影響同志之間的團結，甚而不必要地傷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的事也發生過。那時候，最陷於被動、最喪失威信的，常常正是人事部門本身。

現在大家都讓着“拆牆”，我完全同意應該從兩面拆，而且，我認為負責人事和思想工作的同志在這意義重大的工作上，可以起極大的作用。比方說，把每個干部的人事材料好好清理一下：要是還有些捕風捉影、已經証實不符事實的小條條，就撕掉；屬於思想作風上的缺點的，及時地通過各種方式向有關的干部進行教育；過去有些措施使干部感到困惑不解的，也尽量向他說個明白；同時，該質問干部的，除非是反革命性質，也最好當面問個清楚（這個工作的肅反審干的時候應該已經做了一些吧）。今后，讓人事部門更能成為大家有冤可以申，有苦可以訴；成為不僅僅做保衛工作，同時也能解決內部矛盾、加強內部團結的地方。

要在機關內部長期、健康地開展“鳴”和“放”的工作，我認為機關里做黨和人事工作的同志（常常是同樣一批人）也需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要廣開“反映”之門，使歹人無法得逞，又要避免在客觀效果上縱容不真實、並且帶個人動機、破壞團結的“反映”。這樣一來，積極分子的圈子必然就會越來越大，就會有更多的同志們亲近組織，而大家也就会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毫無忌憚地發出肺腑之言。

（原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1日）

馬克思主義“還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

雷海宗

資料不足，使許多人不能爭鳴。對百家爭鳴，雖然可能有顧慮，但從天津史學界來說，因有顧慮而不敢爭鳴的還不多，主要是資料太少無法鳴。我們搞世界史的比其他部門材料更少。

社會學（包括歷史學）有一個根本問題：社會科學是隨資本主義產生而產生的，是到資本主義社會才成為一種嚴格的真正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是在資產階級

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这就产生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綴性質，也没学透徹，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識里沒有这个东西。即或有少数人比較透徹的接触到資產阶级的社会科学，也是从国外留学时接触的，回国后就落后了，接不上。过去只是为了点綴，今天要求我們繼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發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从这一点来看，資料問題就更大了。有些人認為我們只是在解放后才和資本主义的社会科学隔絕，其实过去也並不透徹了解，而今天要求我們比解放前有更多更透徹的了解。

另外，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論上是一致的，承認馬列主义應該發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發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 1895 年的地方。1895 年以后，列寧斯大林在个别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当前革命問題。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經驗，建立新的社会科学來說，基本上停留在 1895 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經常修改他們的學說，他們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門的發展情况，掌握科学的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們就認為他們已解决了一切問題，社会科学不能再發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 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 1895 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課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人的問題，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陣營的問題，工作艰巨得很。解放以前对資本主义社会科学已經不是全面掌握，最近新訂了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刊物，好多問題就不了解，看不懂。資本主义国家有些社会科学家是反动的，如凱恩斯，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但今天也有許多資本主义社会科学家并不是有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有的只是一个認識問題，不直接牽涉到立場，只是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不同。当然，分析到最后，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是有立場的。另外历史問題，如希臘史，六十二年來發現了好多材料。1890 年在埃及發現的雅典宪法，可以說明好多問題。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中在有些問題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發展的：在理論上大家都这样說，在实践上却認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 1895 年的了。

我和郑天挺先生不大写文章主要是材料不够。过去学的好多东西，現在沒有用，今天有用的东西，过去沒有学，需要从头学起。过去我們买了不少資本主义国家的書，但是有用的書沒有买。尤其是研究世界史書太缺乏了。目前我們圖書館要买書，經費又受限制。

对年龄大一点的人來說，他們有他們几十年的習慣，在研究一个問題时，得掌握全面或比較全面的材料才能講話。今天有許多問題是值得談的，可是不掌握

材料就沒法談。因此不大量地把過去沒有買來的書买到，進行研究就很困難。我們要體會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們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結論，如果他們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會另作結論。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馬恩研究希臘史時的結論來解決中國古史問題，這當然解決不了問題，而只會把問題搞得越來越糊塗。

（原載人民日報 1957年4月23日）

才 与 德

施 肇 存

衡量人品的標準，大致不外乎“才”與“德”。才有通才，有專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與盛德，可說全面發展，專才與美德，僅是一節之長。具有通才與盛德，已極不易，才德兼備，更是難得。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較多；因為此時生存競爭並不尖銳，人民缺少磨練才能的機會。離亂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較多，因為此時生存競爭劇烈，非有才能不能生存，但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會站些瑕疵了。

方今國家任用領導干部，顯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傾向，而德的標準又很高，要求的是共產主義的品德，這已是超於我們傳統的盛德以上了。這一方策本來不壞，如果所有領導干部都具有這樣高的德行，才雖不足，亦決不致墮事。因為一般的說來，有才無德的人較多，有德無才的人較少。具有共產主義品德的干部，我相信他決不在中才之下。

可惜近來各方面暴露出來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舊社會里都是骇人聽聞的。父子之亲，而有協議棄業的文書；師道之尊，而有漁色女學生的風流校長。這些人距離共產主義品德，似乎甚遠，雖說是個別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眾心裏，總是為黨惋惜而不是為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來，任人以德，現在恐怕不很妥當，因為我們在最近廿年中，經過好幾次大變革，可以說是一個離亂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過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則酬以利祿，何必以位？

從歷史上來看，英俊有為之君，總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較保守的帝王，才任以德。然而也必須是繼世之君方可。若創業開國之君，則天下離亂方定，如果無才俊之士，相與共治天下，單靠幾個拘拘于小德的鄉願，那是打不開局面來的。

漢武帝劉徹，在元封五年，因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詔求人才。詔曰：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馬是不容易馴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被一般人所指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馬此人，因为他自認有能力駕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長，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不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甚用人才。甚至說：“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术”的人，都應該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廢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尚書說命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質。”亦就是說，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評薪評級也。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多，專業分工又細，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級領導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傳統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業務，也还恐怕不頂事。何况今天之所謂“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組織性，紀律性，革命性，積極性而已。“樊迟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見，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領導一个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認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現在改兩句龍定齋的詩，以結束这一点感想吧：

“我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用人才”。

(原載文匯報 1957年6月5日)

一株毒草

譚天榮

愛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應該死，城——應該交給尚未未成人的人去管理——赫拉克利特。

到現在为止，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离我們無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們國家沒有檢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編輯們对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無知，对辯証法的一窍不通和他們形而上学的腦袋中裝着的無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鎖真理的万里長城，比方說吧：

1895年以后，馬克思主義按照鐵的必然性轉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滲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絕對統治，而“再論”都把它归結为“人們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子久（詳細論証情況請見哲学教研室印“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

魏巍写的“春天漫笔”不仅空空洞洞的自相矛盾，而且簡直是神經錯亂，語無輪次，却採納為关于“徐进問題”討論的最后批判書。

充滿了極端盲从迷信詭辯，謬誤牽強附會彌縫手段（或者叫作新穎觀念）的物理学已經面临毁灭，無耻的李政道楊振宇剥夺了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光彩，可是物理学报还在搞什么薄板和圓柱，再不就是什么耗損。

这一切已經完全不堪忍受

我建議

(1) 請我們北大學生自己創辦一个綜合性学术刊物。
(2) 建立一个学生講座，讓我們向世界証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維的“三好學生”（或叫白痴，或者叫优秀生、或者叫“小螺絲釘”反正一样）以外，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才子佳人”，他們堅忍果斷才氣橫溢光芒四射，他們將使国际資產階級吃飯时丢落刀子。

你凝了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緊鎖双眉
你咬牙切齒
你点一点头。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發神經病，應該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習慣的話，就本能地反对那种条件或無条件反射，要不我說西郊公園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再見！

一个“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伙子”

譚天榮

57年5月20

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譚 天 榮

*一切現實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現實的

——黑格尔

*存在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

——歌 德

*辯証哲学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認為認識和社會關係的每一个發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來說，都是正当合理的，不过，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

面是相對的，而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恩格斯

我們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獲得了一至好評，在我看来，這仅仅是因为我們是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結的立場出發，我們的具体分析基本上也是正確，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是形而上學的，因此在觀點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義的，這說明到現在為止，我們黨沒有真正自覺地掌握唯物辯証法，在這裡，我想提出我的意見。

我們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人們問道，既然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是正確的，為什麼又發生斯大林的錯誤呢？回答是，“決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情況，斯大林後期被一連串的勝利和歌頌冲昏了頭腦，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嚴重地離開了辯証唯物主義而陷入了主觀主義”，這當然是對的，但是難道這算是什麼回答嗎？如果我們還沒有忘記馬克思的名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麼這就意味着？我們的判斷仅仅提出而沒有解決問題，仅仅描寫了而沒有說明現象，我們的全部論証在邏輯上不過是同語反復，斯大林之所以犯錯誤是因為斯大林犯了錯誤，個人崇拜的產生是因為個人崇拜的流行，如果稍微徹底一點想一想，就會伸延出無窮無盡的謬誤，這正是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特徵。

在我看來，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用斯大林的個人品質來說明，正如落體運動不能用物質結構來說明一樣，正如商品價格不能用商品的使用價值來說明一樣，也正如匈牙利事件不能用匈牙利的國內政治生活來說明一樣，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只能從決定著人們意識中兩種世界觀——辯証法的和形而上學的世界觀——的矛盾運動的階級鬥爭歷史條件中去尋找，我的初步結論是這樣的。

當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資本運動與工人運動向理論界提出問題時，需要了解全世界的經濟生活與社會面貌，要求對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進行透視，因為要求全面分析也就要求人們掌握全面分析問題的武器，這就是唯物辯証法，而這種思想方法本身也是一種科學需要人們去尋找去發現，當時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古典哲學，已經為唯物辯証法的發現，準備了條件，完成這一切任務的是馬克思，之所以由馬克思來發現，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如果沒有馬克思，那麼德國工人狄根慈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不管人們願意與否偉大人物是互相排斥的，比方說歷代集辯証法之大成的大思想家，亞里斯多德、斯賓諾莎、黑格爾和恩格斯只能有一個，百代而一怪，似乎是有道理的。

當人們去分別發動工人運動時，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國家，“只見個別的樹木，不見整個森林”因此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佔了優勢，因此產生了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考茨基就成了不可救藥的犧牲者，關於這一點，斯大林說得好，“考茨基反對他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戰鬥的工具，所以他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

已無力採取什么严重办法，这是完全对的”，而这正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为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可以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士兵，像我们的瞿秋白同志一样，但是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本身的第一次否定，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修正主义。

当资本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时无产阶级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并开始夺取政权时，又一次向理论提出了新问题，要求再一次分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重新配备阶级力量，总之，要求重新全面的分析问题，这就是说，要求人们重新掌握唯物辩证法，是谁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呢，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他们都是俄国人，这是“因为俄国当时是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为俄国当时孕育的革命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斯大林语），于是列宁主义诞生了，辩证法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战胜了形而上学，否定之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仅普列汉诺夫而且是列宁，也局部地能“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他那哲学笔记中承认黑格尔的许多哲学命题，他不懂，这就是说，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批判，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几乎包括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命题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在列宁的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许多命题，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题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形也是没有的（甚至在恩格斯早期作品“自然辩证法”中一切概念判断都已经被新的自然科学发现所证实，更不用说反杜林论，一切关于恩格斯提出的原理已经过时的论点，在我看来，这是胡说八道），这可以用列宁不得不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来说明，人们的才干是取决于社会的要求的。

到了我们的时代，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形而上学之否定辩证法是绝对必然的，在列宁同志“未发表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已经开始和第二国际时的和平环境相反，这时苏联是处在日益尖锐的阶段斗争中，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能采取修正主义而只能采取教条主义的形式，即使列宁现在还活着，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基本历史情况决不会因此改变，斯大林是一个坚强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战胜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决不是偶然的（虽然，在我看来，不能认为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为他有超人的才干，这种性格，对于“认识和社会关系的这一发展阶段和对于相应的时间，是正当合理的”，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加里宁比斯大林在理论水平上要高出百倍但是他也没有——因为不可能而没有——改变斯大林的路线，所以在我看来，把错误归于斯大林个人是不公的。

当社会主义超过一国的范围而变成一个世界体系时，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恩格斯曾说，无论在某多么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的程度要看研究的对象）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如何的合用甚至必要，可是迟早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一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思维方法，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这就是斯大林的悲剧，这就是匈牙利的悲剧，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在这里产生多少误会啊，我说我们应当更少地责难苏联，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应当更冷静地分析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局势，生活是残忍无情的，正因为如此，生活才是无限美好的，让我们来重新建立美好的新生活吧。

几句人情话

譚天榮

有部分同学听说我对某些问题有些别致的见解，很想看一看我的作品。我写的“教条主义生产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也有部分等等学校的同志向我索取。在这里，我想给校行政和党委会提两个要求：

①请给我一间房子，让我把自己的作品展览一下，也许至少在一些自然科学的探讨中，没有什么危险吧。

②借铅印机给我印一下，把“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印成小册子，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为了说明一些从小积累的问题，我曾痛苦地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著作，现在到底整理出一个眉目来。所以，我写的这些作品，虽然谈不上什么创造，毕竟是诚实劳动的结果，我真心地渴望实事求是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轻心的反对意见，我已经习惯了，所以也不介意。

我是从物理学本体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和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在我看來，現在有三种力量社會力量已經形成了一支可怕的百萬大軍。

- ①認識了歷史必然性的戰士們
- ②那些樹葉一樣被蹂躪的人們
- ③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們

這支大軍在為自己開辟道路，誰要是阻撓，就是毀滅，一絲一毫也不差的毀滅。

我們青年學生應該是第一種人我們有責任把這次運動引向破壊性最小的道路。要知道，工人和農民不見得會採取寫大字報的形式，讓我們行動起來吧。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社會主義民主萬歲！

馬克思主義萬歲！

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

自由主義者宣言

嚴仲強

一個怪影在北大遊蕩着。不少人講必須清除三害，又說什麼幫助黨整風，似乎在共產黨中國三害還是相當普遍的。总的看中共有教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很多。但從國家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則是先教條的襲用蘇聯經驗，犯了重大錯誤，然后再動思想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以達到“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共產黨中國三害產生的外部因素也。將內部的因素突出起來，考慮一下蘇聯三害根源是比較本質的。為了正確的從理論上分析問題“存在決定意識”這個論點的正確性就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意識本身也是存在。將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和思想意識作為二元的相互作用的體系來觀察問題是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所以不能簡單的由蘇聯生產資料公有制得出人民生活中所應當有的一系列美麗的結論，社會主義內部重大錯誤的可能性由此可以得出初步說明。

斯大林專政時代實際上是奴隸加中世紀教會統治在否定的否定意識下的復舊“人權的喪失，對思想上‘異端’‘鎮壓’……”所以一些嚴重的錯誤有他的必然性，但要實現這種必然性應有一定的條件，我想舉出下面幾點，

理論上的錯誤，（1）過低估計了人民羣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將社會主義建設成就過多的歸於党的领导，歸於個別領導人物的作用。在決定政策路線時實際上是少數人的專斷，因為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斯大林的錯誤長期

被掩飾是个最好的証明，因为实际上無法参与国家的領導。这样就是名譽上是全民的工厂，土改实际上操縱在少數人的鐵腕中。人民被看成羣氓，(2)階級論的錯誤；理論上最突出的是“階級斗争逐漸尖銳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論調，实际工作上則將階級論的統計規律盲目的用于个别人。以致产生了“唯成分論”的工作方法，助長了新等級的形成。(3)法权論上的錯誤；过分強調了法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故意使民法等不健全。中国胡風問題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法权明确的話，胡風是否是反革命分子早就应当审判清楚了。在我看来胡風是否是反革命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4)对目的和手段的錯誤理解，將民主純粹作为一种手段，其他如良心，人道，友誼——不免被归于手段了。

实际工作上的錯誤；最突出的是長期培养个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实际上是苏联建設社会主义的一塊拌脚石。但在过去長期有那样高的威信。难道苏联在过去沒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嗎？上帝对宗教須是具有最大号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代替上帝吧！即使×是一个木偶也好，但历史会使这种作法遺臭万年的！

苏联犯的錯誤可以找到他的縮影，我不能对中国情况作更多的分析了，因为現在被揭發出来的只是一些皮毛。那些大叫矛盾尖銳化，人民內部矛盾要轉化为敵我矛盾的先生們只不过是閉着眼睛沒有看見矛盾早就存在罢了。將中国現在情況和十月起又前匈牙利情況相比較，除了会諷刺一下中共的領導外，我看不会說明更多問題了吧！“鳴”，“放”正在被一些人引向庸俗的方向。即不談本質問題，將制度的缺陷和工作的錯誤归于个别人的工作方法和認識。以在不附总威信的条件下來緩和过去所积累下的矛盾，（苏联由于过去錯誤严重，現在不敢“鳴”“放”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展开自由爭論，全面的揭露矛盾，使人民从氓从的环境中苏醒过来。拥护一个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应当放在第一位至于它是否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則是另一个問題。共产党只应当有爭取领导权的权利，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全国范围内保守势力正在組織反攻。有人已在有意識的收縮这次民主运动了。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民团结起来。最后倒下的将是保守势力而不是人民！

註1. 我所以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因为这篇东西貼出来前未經過党的批准。这种脱离党的领导的行为难道不是自由主义嗎！

2. 我所提的中国全部指共产党中国，用这个詞是为了突出党的领导。

談“党的領導”

王存心

我不止一次听人說出“一定要承認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承認”？

1. 有兩種性質不同的領導，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領導，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傳鼓動，發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沒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來保証的。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沒有把第一种领导給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論多么先进也沒有这种领导的权利，有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否定行政工作时，应以国家法律和人民羣众的願望为依据，也不需要强迫每一个公民承認，共产党只能爭取人民羣众接受他們的领导，但不能要求人民羣众对它的领导一定要服服从，党领导得好，人民羣众自動会接受，领导得不好人民羣众要起来反对也难免的，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認党的領導的問題，誰正确誰得到人民羣众的支持、誰就是领导者。

(3) 共产党給人民作了許多好事，也有不少錯誤和缺点，事實証明党员作風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已經泛鑑得很厉害，造成了許多不良后果，为什么共产党会出这許多毛病呢？

問題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是非法的，由第二种领导(教育性的)跨进了第一种领导(行政性的)由于現有政权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建立起来了。共产党一貫的以领导者自居，不能充分發揚民主，以致共产党作了好多好事的同时也犯了好多不应有的錯誤，

論“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气三一群同学

所謂个人崇拜，就是把少数人的力量以过高的甚至于离奇的估計表現在思想上的个人崇拜是有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決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現象。

(一)个人崇拜在历史上产生的原因，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之际，由于某些人有傑出的劳动生产的才能，因而被大家所尊重这很自然，因人总是想生活得到改善。隨着剥削关系的形成，少數領袖們为了滿足自己無限的慾望，就在

原有群众信任的基础上，加上一种威力，因此就有“威信”之说了，人们有爱自由的天性，有爱平等的本能，奴隶受不了压迫，反抗的怒火燃烧在整个奴隶社会。领导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必然是十分残酷镇压反抗者，此外还要在思想上制服人民，那就是有领袖们有惊人的本领，彷彿有移山倒海，扭转乾坤之势，如何英明，简直未卜就什么都知道，奉若天神。此外，更有利用，歪取宗教主义，麻醉人民，打开中国历史，真是举不胜举的此类事实，直到蒋介石，他也懂这一套，不过他以后古之名，扼杀新的思想，实行愚民的政策等个人崇拜的法律保证，也就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来巩固个人地位的卑鄙目的，今天的教条主义者，能和上例諸位“媲美”他们不许有人对政策的怀疑，不许有人对现实问题的切实的讨论，同样以政权的力量保证他们在思想斗争中取得专横的独裁的“胜利”表面上说的一套是“科学，发展，真理”实际上做的是：“顽固，唯心，愚民政策”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下面就深入其产生的根基。

(二)从历史上看，中国革命之初就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不崇拜者要说话，许多说道理者的遭遇不会很好，就党内来说，几次重换中央机构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严重的互相争权倾轧的惨景，美其名曰：“党内斗争”，瞿秋白之死有一半是自己人杀的，把自己同志的错误看成不可饶恕，这也说的过去，然把人也看成敌人似的，这决不是工人阶级的品质。

这是为了争得个人超人“威力和信任”的一种初级形式的表现，因为在1930年前前后后几年里整个革命队伍很少，不能有很大的威力。

与此相伴的是乱杀自己人的罪行，远在“井冈山”时候，就有这情形，(有记录者：毛泽东：“农村调查”中一个知识分子干部的下落不明的被杀，毛主席也在后面加了(?!))，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被枉杀的自己人。

(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给个人崇拜的产生留出了肥沃矿野。因为像选举中，特别是县级以上的选举中，干部几乎不摸，这样领导者自身来講易功臣自居，趾高气扬，群众看来，党…………

(四)更重要的是深刻的经济基础，我们知道以往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个人崇拜的产生是自然又必然的，而今天说法很多，而且称为“卫道者”们害怕提出“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产生，他们认为这样说法实际上就否定了公有制的优越性，就反对社会主义……不得了！但是，我都不以为然，因为事实是事实，正反与否它还是客观存在，我的看法是：是由制度产生的，这是因为上层建筑的产生决不是凭空而来的，必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习惯势力是不怕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利用政权，习惯就可以改变，它已在一短暂的时期内起一点阻碍作用(如婚姻问题)，同时，我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无比优越，我们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来说此问题的。问题之所在，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实——就是体现在分配

上的合理化（一決非絕對平等）現在，經濟上以各種名目，照顧之類，較高級官員過多地，實際地佔有社會勞動產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實際上極不平等，這些現象決非一個國家，一地，半載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長期存在，這就是“談論”所說的“新階級”的形成，它的枝葉是在不完備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長起來的。決不能簡單地，唯心地“說成是”人們的思想問題”由於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懸殊，就必然地要產生個人崇拜，如（一）中所述。

（五）“個人崇拜”者的理論基礎：

首先他們強調了一個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並予歌頌，讚美，進而把它的作用誇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个党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絕羣眾的意見，而當把黨的地位異常特殊之後，再就進一步推崇個別高級領事人員，以至發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話，全部理論基礎是：歷史主要由個別政黨所創，而政黨由領導者所創，一切指示率若神明，否認了羣眾的主要作風。

（六）為什麼馬列主義理論中早已肯定了羣眾是歷史真正創造者而實踐中，實際上政、經、社會地位如此分呢？這就是經濟上的特殊等逐漸形成階級，利用政權，不許人民說，壓制批評。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制度”來保證羣眾可以對領導者進行監督，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有十分嚴重的缺點，它只能在書本上，講台上反對個人崇拜，絲毫沒有物質的力量來保證，在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個人崇拜是制度產生的這並不是說必須推翻這個制度，而是說必須徹底改變完善這個制度。

（七）消滅“個人崇拜”的辦法。

必須調整經濟懸殊，社會地位的實際不平等，吸收勞動人民參加政權，建議領導定期換人，各省政府主席等也應輪流擔任勞動人民中傑出的先進人物（勞模先進生產者）應做領導工作，領導者必須實質的參加體力勞動，而不是形式的去幾次，在這些條件下羣眾看到領導並不是“神仙”也許有人說此時無法工作了，回答：相反其正的領導，應已自己勞動等各方面才能忠誠取得羣眾信任。（後面還有幾行，下雨看不清了——抄者按）

宗派主義的鼻祖，官僚主義的根基

——駁“党的领导不容分割”

蔣 兴 仁

“党的领导不容分割”這不但早已用于實踐，而且是不容懷疑的真理。

但我產生了以下問題：

1. 党把自己的領導強加於人民，不管好壞，不問情況一定是黨獨佔領導，既不讓人民選擇更不許人民有另外的選擇對象，不會便利宗派主義產生嗎？
2. 以同樣形而上學的推論而認為黨過去是正確的，現在是正確的，將來也就永遠正確。正確的只有一個，所以沒有能和黨競爭的理由，肯定一個黨才能領導，不存在競爭問題，但正確從來不怕和錯誤鬥爭，是怕分割領導，就使人民懷疑黨的正確有問題？事實上各國共產黨過去犯過錯誤現在還存在分歧，將來也可能有犯錯誤的時候，不讓競爭，排斥異己，不能不使人懷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是不是真正大公無私。黨永遠有不可動搖的領導權，不管現存領導，認真不認真工作，犯不犯錯誤都穩坐泰山，這會不會成為終日飽食無所用心的官僚主義的培養基。我懷疑黨將來是否還會正確。是否會向李自成和拉科西看齊，不是嗎？現在三害就比1942年多些。

論 党 天 下

蔣 兴 仁

1. 思想根源——党天下思想來自早期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請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 P. 142

“……即我們的蘇維埃組織或其它的組織非有黨的領導便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問題或組織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無產階級的專政實質上是它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工人階級基本力量專政”

“註”……卡德爾△△△這個△△△歸于斯大林初期，而在完全社會主義革命後就當政變

2. 党天下思想在我國實踐中的表現

(1) 党領導一切，黨的領導不可分割，國家事務基本由黨決定

(2) 各機關以黨代政

(3) 党國不分，不問青紅皂白反黨就是反革命，所以黨專政專了反革命份子也專了部份人民的政。

3. 党天下的缺点：

(1) 党的領導成為法定地位：

a. 排斥外黨

b. 排斥人民選擇性加強了宗派主義，脫離人民阻礙人民積極性的發揮。

(2) 肯定只有党的领导加上党内和国家内的高度集中，使领导稳坐泰山，为官僚主义滋长创造条件。

(3) 党在和敌人战斗中和其它党派竞争中成长起来流水不腐保证了自己的正确，但现在执政，消灭了敌人，压制了朋友，流水静止有蜕化危险，有不纯份子看上党的势力而打入党内的危险。

(4) 党的变质有使人民前途丧失的危险。

4. 改正方法：

把党放在与各党派平等之地位，通过党员的活动对政府部门加以领导，“党的领导不可分割”只应用于党内以鼓励党员争取在各单位领导，但在各单位中党不直接干涉。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一样进行领导，也就是说党把领导权交给人民，通过党员与人民互相的影响针对国家社会各方面进行领导保证工人阶级专政实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发展。

人民天下，还是党天下

现在国家政策方针，计划实质上完全由党决定，而未充分讨论就算人民决定的政策方针，有人提出异议还会得到反革命的罪名。人民的江山实质上是党天下的代名，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说只尊反革命的政而且也尊了革命的政。

不，不成，你——党为自己还是为人民！重大事务——政策方针发展计划应由人民决定，在竞选中通过选举肯定。党的领导只能通过与人民平等的政权范围内进行，工人阶级领导只能在选代表的比例上的规定中体现，在国法面前没有一个特别的党，没有一个特别的人，对领导干部政策方针，谁也可以批评反对和赞成。

墓 誌 銘

中文系 張元勳
沈澤宜

我的詩

是一束悲哀的玫瑰

献在你悲哀的墓前

不表你誰乡何处

出身在豪門商戶

还是世代清寒

單表在上大学的車上

我第一次看到你
身边有歌声，眼中含笑意
你愉快亲切的言談
会使車中人多么欣喜

到校后，你入了团
这当然值得高兴
却不知为了什么
你竟少了一半笑意，輕了一半歌声

不久，听说，你又入了党
这当然值得三倍的高兴
从此却再也看不到你的笑意
听不到你的歌声。

见面时你冷冷的点一点头
你伸过来冷冷的手
你投来冷冷的目光
似乎在說：
“千万别中了这人的毒？”

从此你再不敢和我談
春天，球賽星星和愛情
再不敢和我溜一溜弯
在湖邊的石上渡过黃昏

我几乎快認不出你的面貌了，
你高高的站着直拂青云
你習慣于俯身看我
臉色又严肃、又威風

我几乎辨不清你的嗓子了
你的喉嚨里响着別人的聲音
这些我都彷彿在哪兒看到过

却忘了究竟出自哪一本“經文”

悲哀啊，朋友，我为你伤心地哭泣，
哀哭你死去得过早的青春
你得意洋洋地走进墳墓
躺在那里安安稳稳

裹在你身上的屍衣
是一件“三害”的傑作
蓋在你墳上的泥土
是紙之輝煌的功勳
長在你墓邊的花草
是片片誦媚的歌声

是时候了，朋友
願你从死睡中甦醒
願党的整風运动
像春雷辟开你的墓穴
願“鳴”“放”的薰風
吹回来你的生命
願我的詩像一支号角
伴着你去寻找
失掉了的青春！

人　　之　　歌

沈澤宣　張元勳

1957.5.29

应当学会尊重人

高　　尔　　基

(一)序曲：

我們唱的不是頌歌，
也許有些人听来，

調子不太柔和
但，我們又大胆的高唱了：
为什么还顧慮到会震破某些人的耳朵?
摆开污蔑的中伤，
我們又重新高唱，
今天又伸出自由的手
把詩行貼到自由的牆上!

(二)黨員的特权

——如果兄弟的心在哭泣，
你怎能逼他唱快乐的歌?
共产党员，
有这样的特权，
長夜悠悠，大地黑暗迷漫，
你最先举起光明的火炬；
身上因而中了無數的槍彈。
你是一个痛苦的縛夫，
你衣衫褴褛。
火燄的陽光照耀当头
脚下则是更燙的沙灘。
你把一船受苦的人民
投向新时代的岸边
脚踝痛破了
一个脚印，一灘血水——
你坐在潮湿的监狱里。

鐵窗外白云舒卷；
窗外有春日的陽光
树下的孩子一張瘦臉
你爱这土地爱得更深
我看見你痛苦的淚水清徹晶莹
你去到扼杀正义的断头台
你無畏地走上敌人的絞架。
在那多霧的幽暗的殘夜。
你在慷慨悲歌中倒下。

你出沒在烽火縱橫的前線，
你去到反叛者的紅旗下面
我看見你振臂高呼
背后的羣眾似如潮湧；
我看見你跳進城牆的缺口
你最先爬上碉堡的牆垣；
而當勝利的大旗
終於在城頭飄拂
你却緩緩地順著旗桿躺下。

你眼含微笑
抬头仰望祖國的天空
黎明已呈現在東天
火紅，火紅……

大地甦醒，陽光燦爛。
共產黨員
你有這樣的特权
你打扫城市的街道
你點起工廠的爐灶
從廢墟和坟場上
修建起公園和學校。

在早春的細雨里，
你犁開江南的田畠
走進烟燻的茅房，
喝一口家釀的酒漿；
摸一摸磨光了的鋤頭柄
把它親暱地放上肩膀。

你去到曠無人煙的大漠，
古銅色的臉沐浴風塵；
你率領勘探隊的勇士，

朔風中迴盪你的笑聲。

你去到怒江的河谷

你去到雪山的絕頂

你手執蒙霜的步槍，

巡邏在祖國的邊境。

你去到原始林區”

風中的古木，霧里的泉聲

你看慣了篝火與星月

忙碌的採伐，雨雪的黃昏。

你去到云雀高歌的北大荒

那兒曾是嚴寒統治的國度：

也許你被熱病折磨得躺下

但，這是怎樣的收成啊！

金色的田野！金色的歡樂！

你去到一切艰苦的地方，

沿着河道，沿着山崗；

哪兒有你的歌聲和腳跡！

哪兒就出現城市和農莊。

啊！共產黨員！

這是你真正的特權

有誰使用得比你更好，

有誰能把人民帶到今天？

但是，黨啊！在你神聖的肌體內

却有這樣的黨員。

他們是你皮膚上的斑毒瘍，

他們醉心於另一種特權，

對這樣的人，我要大吼一聲：

請聽聽一個公民的聲音，

請把眼光投向生活的深處

投向人民音乐的底層：

在和平安逸的年代，
別忘了血淚洗刷的昨天，
不要側着耳朵光聽讚歌，
在喝乎聲中，謗媚聲里倦倦欲眠
你那得意的，驕矜的笑，
只會使我雙倍的辛酸。

你一身“官氣”越爬越高，
離開羣眾路遠迢迢，
但是，要小心哪！
這是一架雪作的梯子；
經受不住太陽的照耀！

不要貪圖地位和金錢，
回憶一下悲慘的童年，
回憶一下故乡的房舍，
多少人家斷了炊煙；
不要光想嬌妻愛子，
多多想想烈士的寡妻
還是有不少寒貧的老者
還有不少失學的孩子。

不許凌辱純潔的少女
姿意濫用惡心的權勢，
不許伸出慾念的長舌，
對着鮮花垂涎欲滴，
不許對教授亂打官腔，
你還沒有他那樣高尚！
是誰朝朝嘔心吐血
是誰使青年才智發光？

不許在歧路一意孤行，

仔細查看你每一个脚印，
是否踩伤了同志的身体，
是否踐踏了少年的真心。

不許用对付敌人的皮鞭，
抽在你亲身兄弟身上；
如果兄弟的心在哭泣，
你怎能逼他欢乐地歌唱？

透过淚水和欢笑，
党啊，我向你声声呼唤，
今天，你廿四岁的兒子
把这支歌唱到你的膝前；
不論昨夜与今朝，
你生根在我的心田。
人民从不把自己的命运，
輕易交到别人手中；
还有什么更深的痛苦，
甚至受統治者的欺騙，播弄；
但是，党啊，只有对你，
含着感謝的淚花，
我們献上一顆顆赤心
献上我全部痛苦和欢乐
献上我希望与爱情，
只有对你，党啊！
我才手按年青的胸口，
唱出我心上的歌声。

如果有粗魯的音符，
也請原諒我稚气的激情；
如果有太多的憂郁，
是因为爱你着的太深。

(三)民主，自由——目的

即使奪去我腦中的知識
即使剝掉我身上的衣裳
即使砍傷我的肢體
把我扔在冰冷的地上。

× × ×

我還會感到快活，滿足，
還會暢快地呼吸歌唱
因為沒有那無形的鞭子
鞭鞭落在自由的心上！

× × ×

即使給我堂皇的宅弟
即使給我財富與榮光
即使永遠有鮮花美酒
使我生活在地上的天堂。

× × ×

我還會覺得貧窮，不幸
還會默默地独自憂傷。
因為老爺們“粗暴的双手”
緊緊地卡住我的頸項！
民主自由——目的，
母亲生下我給我的權利，
我決不願意牺牲分毫
除非為了祖國的利益？

(四)兄弟 听我說

昨天的夜裏我翻轉不眠
走廊下塗出這頁詩篇
如今我把它双手举起
獻給你受了委曲的兄弟
我靜候着你對我發言，

兩年了在我們的一生中
兩年的時間本不算長，
但，对于你，鐘擺的响声
皆如笨重緩慢的脚步走过身旁：

兩年来你如無母的孩子。
任人朝罵也飽嚙冷白的眼光
除了活着的权利之外，
其余的一切对于你似乎已經消亡，
你从此變得沉默
像尊無人过問的石像。

只因为你真正开朗
不爱把应說的話在底層埋藏
你不会在某些人的榮邊日夜輕唱頌歌，
你更不会欺倒是非，忘却了良心，
 硬說春天里沒有寒冷
 硬說黃蓮味道甜得似糖。
有人說眼鏡蛇的毒唾能立刻毒死
 一个健康的生命，
 鳩鳥的毒羽，氯化鉀的杀勁
都能使鮮紅流动的热血，
 立刻凝結在活动跳动的心臟，
但，这些可惡的毒物看起来还算善良
——偏見与惡意，嫉妒与誹謗，
怀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的欲望，
 把別人的身体当成向上爬的梯子
把無恥惡劣的巨足踐踏着別人的脊樑，步步直上……
就是这些更可怖的东西，
 会使一个善良的人的身体
以至他自己的名字与心灵一起
 被割碎而死亡；
而这些人也因此立下大功，吃得肥胖；

而你，我的不幸的正真的兄弟！
兩年前你就遭到了这样的中伤！
 于是有人把你当成仇敵，
还用粗大的手指点着你的鼻樑，

罵你是“混蛋”“反革命份子”还有什么“黑帮”
从此，便有一双恶劣的巨足踏在你的背上
从此，你便俯首无声地熬度着奴隶式的时光，
而从此，你更失掉了天赋的权利——

× × ×

你不敢为自己的遭遇哭泣！
你的眼淚只能在深夜里偷藏在脸上
兩年来，我每夜听见你在床上睡得不好，
你常在夢中驚呼，或夢中痛苦到天亮！
哭醒后，你多么恐慌，
像又犯了一次罪过
你不敢正視別人的眼光！

× × ×

我和你本来是兄弟一般的朋友，
知春亭下我們曾曲膝地暢談到
夜色蒼茫。
春天里你和我湖水上輕盪起双槳。
天冷，你給我送来棉布衣裳。
我病了高燒中念着江南的媽媽。
你坐在床边守着我直到天亮
秋天里你帶來了故乡的石塊
送給我还說人應像它一样坚硬。

美好的事如当地消亡
兩年前我盲从地投給你敵意的目光，
我太信那些老爺式的黨員了，
我与他們一起，罵你是“反革命分子”的“黑帮”
斗争会上，你帶着多么深沉的悲痛向我凝望！
从此，我們不再交談。
兩年来，像陌生人一样，
兩年来，你
去年的冬天你依旧借給我棉布的衣裳，
初秋的夜里，你輕輕地为我盖好，踢去的棉被，
.....

但我觉得你在对我讽刺
我曾公开地告诉过你，“我不喜欢这样”
今天，我懂了，
我深悟我给你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创伤，
我曾经无意地碰伤了弟弟的腿，
如今弟弟长大了他变成终身的残废，
我对着残废的弟弟
心里怀着说不出的不安，
我知道是我毁坏了他完美的肢体
给他一生中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缺憾。
我曾向长大的弟弟痛哭过，
就像我是弟弟他是哥哥
我哭着向他祈求最大的宽恕，
也同时要求他给我任何的毒罚与折磨！
对于残废了的弟弟
我的一生都自(×)犯了无法弥补的孽罪！
对于你我的兄弟今天我怀着同样的自愧
我正好碰伤了弟弟使他残废终生，
我也曾多么无情地刺伤了你的心灵，
近来的日子我夜夜不眠，
随时随地我都看着你微笑的脸，
我知道我错了，
我应向你祈求最严肃的责备。
我曾几次鼓足勇气但我的话几次都逗留在唇边。
是时候了，我的正直的受了委曲的兄弟！
把我的诗篇献到你的面前，
我等待着你的最严肃的谴责，
这样我才得到最大的慰安，
是时候了，我的正直的兄弟！
你不应再如两年来的沉默，
你应大胆地笑，大胆的哭，
向着我们的今天，
大胆地发言。

“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

龙英华

先講關於反社会主义言論和對《人民日报社論》的評論。我認為重複大家知道的東西，就是教條主義。

過去反社会主义言論藏在心里，現在說出來了，很好。說明社会主义民主擴大，說出來我們知道了，有利于思想改造，有利于給我們上課。我看反社会主义言論有這些：①我所要的是理想的社会，要不要社会主义無所謂；②“党天下”，共产党可要可不要，民主党派和党自由競爭；③自由主义宣言，不承認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④有人主張由下而上地搞，像波蘭、匈牙利的方式，這樣國家生產會受到損失（變動、罢工、罢課）。

整風是擴大民主，可以和教條主義鬥爭，鬥爭後可以出現新事物。

關於《人民日报社論》（指：“這是為什麼”等），用辯証法看，好的是主要一方面，缺点是次要一方面，全部否定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另外有教條主義（全部肯定）和修正主義（全部否定）的態度。社論批判反社会主义言論是正確的，因為需要提高警惕性，但從辯証法看，也有不好一面，對恐吓信的分析不深刻，對怎樣區別反社会主义言論分析不夠，給了教條主義者以把柄，如誣大敵，不分好壞，打击積極分子。

“自由主义宣言”出現是一件好事，證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在北大大發揚。大家知道了它存在。不要把他們推到帝国主义的一邊去，要客氣一些，說理吧！我們佔了半个地球，心胸要寬大一些。批判右派，右派可以轉化，轉化了就不叫右派了。



現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比馬、恩時已大大變了。但有繼承性，列寧、斯大林學說是發展。現在來論述下列問題：

一、世界向何處去：這是關鍵問題。有些我也只是“猜想”，恩格斯曾說：只要科學在發展中，總是需要“假設”的。我認為世界是人類大家庭。人類的共同敵人是自然界。自然界與人類有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人類不分階級在自然面前是一致的，在氫彈面前人類有一致的利益，一丟下不管那個階級都被炸死。所以大家感到戰爭打不得！（當然我們還要預備氫彈）戰爭有轉化為和平的可能。人類對抗性的矛盾在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的可能。這樣戰爭轉化為和平，變為人類進步。

美国有（一）亿多人，有六千多万工人，他們生活得很不錯。英、法、西德工人阶级也类似。你去發動武裝起義試試看！过去美共教条主义碰了釘子，脱离羣众，教条主义破了产。英共也破了产。在意大利馬克思主义胜利了。法共也像胜利。国际工人阶级共約兩亿（苏联 5000 万、美国 6000 万、中国算个 2000 万吧）算四口之家，工人阶级家庭人口共八亿。全世界人口大概 26 亿吧，除此八亿还剩 18 亿。农民算它个 16 亿吧（中国 5 亿，印度 3 亿等…）——工人运动总之有一天是要統一起来的，因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最低目的上有共同点，所以总應該團結改造社会党人，只要他們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战争。然而过去教条主义者把工人阶级讓給社会党修正主义了。教条主义使社会党都与帝国主义合作了。

用理論斗争来代替武裝斗争，全世界來一个百家爭鳴。欢迎社会党人来作報告（但仍要准备氢彈）。欢迎杜勒斯等等他們來我国爭鳴，但我們也要派人去宣傳，和他們交換，看誰是真理。在人道的基础上，在氢彈和死亡威胁的面前，團結起来。

無产阶级專政無論过去和未来都是能在个别国家里提出来，作为全世界口号是值得怀疑的，这个口号会脱离羣众，不管加多少解釋。資产阶级比我們高明得多，搞了專政，但不提資产阶级專政。無产阶级專政是列宁、斯大林的口号。中国毛主席加以否定之否定，提出“人民民主專政”，这是現阶段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共产党情报局用爭取人民民主的口号，来代替專政更前进了一步，可吸引更多的人，可團結資产阶级，比人民民主專政更高明的口号也可以提，再否定之否定，如共产党情报局提出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你到印度搞無产阶级專政試試看，誰跟你走？只要保証党的领导，因此它信阶级專政这一口号是确不当的。“一論”“再論”題目虽然是無产阶级專政历史經驗；但提出的五条經驗中就沒有提这口号。在我們國內由剝削阶级基本消灭后，專誰的政呢？——專政对付帝国主义，國內主要是人民民主。这一名詞关系很大，弄得不好混乱自己。英國提不妙，意大利議会过渡，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很好。我們要使民族主义向我們看齐，民族主义国家，歐美政府中的某些人士都护拥社会主义，可是我們的口号把别人吓跑了。所以無产阶级專政口号过时了。

我們要夺取全世界，首先要改造自己。过时了的制度（对敌斗争时的（口号），不适合于今日）、教条主义像喜马拉雅山，压在社会主义国家头上，出了波、匈、苏事件，人民不得不暴动，老是老一套解釋，实际上是反对百花齐放，妨碍言語自由。表面贊成發揚民主，实际上阻撓。这样我們人民有很大潛力沒有發揮出来。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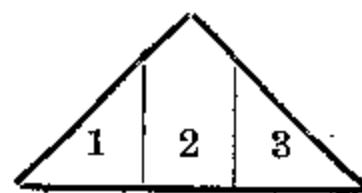
在工厂、学校中沒有澈底实行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时有利的制度，現在變

成了官僚制度。肅反前的工厂一長制，左得厉害。肅反后党委领导下的厂長負責制是以党代政。

管理制度是一个很大的問題——左傾管理制度的改变，才能發揮潛力。

1. 制定新选举法，直接选举。在工人委员会中，党可以爭取多數，保証領導。可以竞选，上邊批准，这样选出来的人，不能是高兴就走羣眾路線，而是非走羣眾路線不可了。

現在我們的领导集团，情况是中間大，兩头小。如圖解：①是英明的好领导；②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官僚主义，不好不坏，不适合今天需要；③是“三害”分子，或違法亂紀分子，讓他們下台！



2. 过去是“官派官”，特别是在評級之后，干部基本配备全了，下級沒有机会提拔，因此矛盾很大。仁人志士新生力量不能吸收到领导集团中去。現在大概有二十万官，这对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时有好处，現在过时了。我主張“凡長皆选”！不好就罢免，否則他們脫离羣眾后，官僚主义仍可能出現。

我們可以先整風，再选，希望②类的缺点能够克服。教条主义不願談这个問題。

建党也要結合选举。現在入党的加深了危險。因为这些新党员容易被①③类人所俘虜，虽然是各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斗争性差——在整風中可看出来——被不好不坏的干部，坏的干部團結在一起，教条分子喜欢教条分子。官僚主义喜欢吹牛拍馬者。毛主席說共产党不改造要变成国民党。我看共青团不改造要变成三青团。47年我在学校和三青团斗争过，很知道他們那一套，有些共青团員像三青团员，現在多少共青团員就是用三青团的手段来对付整風积极分子。有些党员不动，以为这是站稳了立場，这是消極分子，他們反而要打击积极分子。消極的留在党内，斗争积极的反而喊要开除出党，豈有此理！（音色俱厉）。

※ ※ ※

中国往何处去？我們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業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訂出五年計劃來）。“民主長一分，生产長一寸”！現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學習。苏联最近分全国为 105 个經濟区，这是大大發展社会主义民主。現在是走誰的路，是斯大林路線和南斯拉夫路線誰勝利的問題。鐵托、陶里亞蒂、毛澤东、赫魯曉夫是現阶段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資本主义国家中有人說苏联是法西斯主义，在本質上是錯了，但反映了官僚主义厉害。

我們的气量要大一点。可以和资产阶级妥协。把资产阶级帽子摘掉了，有何关系？我們如果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开展，可胜过十亿万大军，十亿个氢彈。我們

搞好了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馬列主义基础講社会主义只講經濟基础（工業化），文化革命（原子能化）还应有政治基础（民主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合理的管理制度和上層建筑。

在社会主义中，說有新階級，即是修正主義。但是有階層，揭出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人們經濟、政治、文化地位不同，意識也不同，因此分作階層，各階層一致的一面是主要的，鬥爭是次要的。但可以轉化。这是階層鬥爭，如匈牙利領導与被領導的矛盾轉化了，官僚主义是压、打、矛盾就轉化了。

※ ※ ※

北大（往）何处去？

北大在全国各地的人均有。应当在理論上好好討論這些問題。要求民主辦校，民主選舉！學校三害主要表現在教學制度上。

应当讓學生多讀、多想、多寫、少聽少背。現在我們教學只是拼命往學生腦子里裝！裝！裝！在上課時講 100 個問題，50 個——众所周知，40 個——一看就懂，還有 10 個信息量。教員是政治宣傳員而非科學家。我看毛主席叫把功課砍掉一半的意見是很好的。對文科都合適。

我主張搞理論鬥爭，理論弄通了，再從上而下的搞。我曾和譚天榮在一个晚上商量過，他主張走出書齋，讓全國學生動起來，工人動起來，農民也動起來，自下而上的搞。我是不同意的，我主張搞理論鬥爭。

我認為學校的主體是學生，學生是生產知識的勞動者，他們學習動腦筋就是生產知識。應當由學生來選舉學校領導……。我一個人想得還不夠，大家動腦筋想想吧！

大膽向党和黨員提意見

黃 錢 忠

北京大學校刊 1957. 5. 29

最近在報紙上和我們學校的座談會上揭露了不少人民內部的矛盾，我認為其中最基本、最尖銳的矛盾是黨羣關係，因此想在這方面發表點粗淺的意見。

解放初期黨群關係比現在好

党和黨員在人民羣眾中的威信是經過一些演變的。在解放初期，党和黨員在羣眾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威信。而今天呢，党的威信當然還是很高，但是由於下面

要談到的种种原因，黨羣關係惡化了，黨員和羣眾之間豎立起了一堵堵的高牆，羣眾見了黨員有一種疑惧和敬而遠之的心理，跟黨員不談真心話。傅鷹先生說，和朋友在家里談知心話，看見黨員進來就把話題扯開，談些無關痛痒的話，這是很說明問題的。日前我去看一位以前在我們西語系的老先生，他說黨羣搞得很不好，在這方面簡直是怨聲載道。我認為這話並不過分。下面我要談談黨羣關係惡化的原因。

黨員有了黨性，好象就不能兼有人性

首先，這幾年來，黨員（當然不是全體，但也不是個別，可以說是一般的，恕不仔細區分）對於羣眾漸漸由最真誠的人而變成虛假的人。他們戴着一副假面具，裝出改造人的道學面孔；在會上專等別人暴露思想問題，好給他批判一通，而自己却在對任何問題不發表個人的意見，從來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問題。實際上有沒有思想問題呢？當然有。今天黨員的政治覺悟有一部分是非常高的，但大多數是解放後入黨的，其中有的在思想上比羣眾只是先走一步，略勝一籌，有的恐怕还不如羣眾。不肯暴露，只是表現他們的虛假而已。羣眾覺得黨員跟他們不是一样的人，羣眾有的問題，他們沒有，因此對他們敬而遠之。另一方面，黨員同志壓抑着自己的人性，不讓它跟羣眾見面，他們和羣眾只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关系，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一點也沒有，更談不上友情。有的人入了黨便跟以前無所不談的朋友疏遠起來，見了面懂得無話可談；有的黨員原先和羣眾格格不入，羣眾關係惡劣，但因為某種原因取消了黨籍，反而變得很可親，也和大家交起朋友來了。這種情形我們系里就有，真是令人不解。這是一陰森可怕的風氣，它扼殺共產黨員的人性，好象黨員有了黨性，就不能兼有人性似的。這種情況在年輕人身上起的作用尤其令人寒心。我系的黨員大都是剛畢業兩三年的同志，年齡都很小，他們做學生的時候，活潑可愛，生氣勃勃。一畢業留在系里工作，當上了支部書記或委員，立刻就一副老氣橫秋的黨員面孔，青春的熱情與活力都給埋葬起來了，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氣息在他們身上一點也嗅不到。這種氣氛在同學黨員中也有，好些活潑而真摯的年輕學生，入黨之後便得少年老成，對同學和先生不隨便說一句話，不隨便笑一笑。我校黨委會中不少年紀很輕的男女同志，他們給我的印象是一羣小和尚和小尼姑，一個個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彷彿都已看破紅塵，和五情六慾都已絕了緣似的。把生氣勃勃的年輕人弄得這樣暮氣沉沉，這能說不是扼殺人性嗎？其次，今天有些黨員的特權思想頗為嚴重。毛主席明確說，國家是人民大眾的國家，國家大事幾個共產黨員包辦不下来的。而事實上，今天共產黨員大權獨攬、包辦國家大事的情況相當普遍，從最高政府機構到機關、學校、農村、工廠、軍隊，在在皆是。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在政府

中有職無權，報紙上天天可以看到。有的机关主管人是党外人士，副的是党员；有的正的是党员，副的是非党员。但無論正、副，权总是在党员手中。拿我們學校來說，就給人这种印象：真正的领导人是江副校长，而不是馬校长。教务处、总务处、也是如此。各系的总指挥也不是各該系的系主任，而是年輕的党员系秘書；昨天我系系主任馮至先生的發言中提到他以前在西語系是应声虫，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事，大家也都心中有数。連作为羣众組織的工会中也是这样，我在北大工会当过几屆委員知道的比較清楚。工会有好几位主席，但他們都是不大問事的，实际上决策的是党委会派来的秘書長。

有些党员对本門業務一窍不通却居高位拿高薪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風气，对党的威信大有損害。那就是今天有些党员借着共产党这塊招牌吃飯。他們对于本門業務一窍不通，不学無术，却居高位，拿高薪，而且当之无愧。有的人居然拍着胸脯，大言不慚地說，老子根本不靠業務吃飯，老子是靠革命吃飯。今天党内似有一种按革命資历封官的風气，比如說，一个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分配工作时就要看看他同时的党员是个什么長，如果一般都是司長，那他也得封个司長；一个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就必分配他个科長，諸如此类。这种風气对学生党员也有影响，有的學生党员業務不行，但毫不感到恐慌着急，彷彿畢業后做领导干部滿有把握似的。共产党党员享有的特权还不止于此，比如說出国留学就是他們的特权，非党员是没有份的。当然，共产党員如果板起面孔來算帳，說老子革命这么多年，享受这点权利还不應該嗎？如果今天的問題單是論功行賞，那你尽管享受特权，大家沒有話說。不过，共产党还要不要保持为一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呢？你还想不想维护党在人民大众中崇高的威信呢？这种特权思想如果發展下去的話，就会形成另一个脱离人民大众的統治阶级，这是非常危險的事。所以，毛主席今天提出整風的号召，真是最英明不过的措施。說到这里，我想向我校的党委会提一个问题：去年知識分子政策提出之后，我校一陣風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了一批党员，我听到的一些名字是严仁慶、侯仁之、馮至、陳定民、季羨林、曹端华等……。一分析，这些同志不是教務長，就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领导干部。这給我一种錯觉，好象是專門吸收领导干部入党似的。（对这些同志个人是否合党员标准，我不了解情况，無發言权。）这到底是一种偶合呢，还是有一种什么思想在作祟呢？提出来供党委会参考。

在学术上，讓專家們去領導不是更好嗎？

总之，这几年来党员居功自大，排斥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作風是相当普遍而

严重的。这几年来，党的改造、团结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完全正确，但通过党员干部执行的结果，却产生了很不好的副效果。共产党员的表现，叫知识分子有一种做仆从的感觉，似乎自己不是在直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而是受雇于党员似的；党员似乎不相信知识分子有主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愿望，仿佛他们非要共产党员拿着鞭子在后面监督着才肯好好工作似的。这种态度使知识分子心里很不痛快。历史系有位先生对系主任助理夏自强同志（党员）说：“我们之间，你是主人，我是奴仆。”这句话是值得全党的同志细细寻思的。要知道作为一个国民，每一个人和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密得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任何人也不喜欢这种关系给第三者隔开来；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效劳，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每人神圣的天职和权利，也是大家热切的愿望。因此，大家不愿意受做客的待遇，大家热烈要求以主人公的身份主动、直接地为国家尽一分力量。大家要求真正的主人地位。

这里我想顺便谈一谈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到如今，我还不懂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整个国家，确立社会主义方向，制定政策，这是没有一个人民不拥护的事。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的科学及高教机构每一个单位行政、学术上（除了党委）都必须是共产党员直接领导呢？我看不可能也不必要。这些地方让各该行的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难道这就不是党领导了么？难道今天知识分子不是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吗？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些，但是我确实不了解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

年轻党员不宜做领导工作不如回到业务单位做点实际工作

此外，我想谈谈年轻党员能不能领导的问题。我们系里的老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总说能领导，毫无问题。我个人则认为大有问题。这些年来年轻人（主要是党团员）与老年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年轻党员领导的直接后果。首先，这种领导关系不自然。拿我们系来说，这几年来党员系秘书、党支部书记及委员们大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毕业前受先生们的教诲，对老师很尊敬，一毕业就大模大样对系主任及全系教师摆出一副领导面孔，这怎能自然呢？他们无论在业务、经验、常识哪一方面都不如先生们，即使在政治觉悟方面，高得也极有限，只是比大家先走一步而已。结果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方都感到别扭，工作不易做好。第二，年轻人居高位易助长青年得志、目中无人的官僚作风。第三，年轻得志，还会助长不知艰苦、不肯老老实实去踏本门业务的歪风。凡此种种说明年轻党员居领导地位不但工作不易搞好，就是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害处。为了爱护年轻的共产党员，不如叫他们回到自己的业务单位上老老实实地去刻苦钻研，做点实际工作。

（摘自5月29日北京日报）

新“九品”釋

朱承立

昔兩晉設“九品中正”門閥制度，因此產生，今西語系三年級有新“九品”，“九品”之間有不可逾越之鴻溝，彼此不通思想，甚至不通語言。特列表說明如下：

黨員	元老黨員	永遠正確，小事不管，大事一句“金言”幕後決定一切。
	當權派黨員	道貌岸然榮譽永歸自己，錯誤永歸別人，群眾和後退團員。
團員	新入和預備黨員	小心翼翼，由群眾中來，但不到群眾中去。
	黨培養對象的團員	以唯唯諾諾歌功頌德，吹吹拍拍，以小彙報甚至打擊別人為入黨之階。
一般團員	沉默寡言，只知舉手贊成，跟着說，跟着走，有不平亦不敢提。	
	“落後”團員	愛提反面意見不但被視為落後，而且與組織對立。
群眾	團培養對象的群眾	看準風頭，一味吹捧。
	一般群眾	對入團心灰意懶，埋頭于圖書，寄情于音樂。
“落後”羣眾		其中有被除的團員，違反被斗錯的，他們永遠被摒棄于千里之外，無人過問。

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摘要）

費孝通

社會學問題的提法。

但是，這時候把社會學的地位問題提出來研究一下好不好呢？我覺得是好的，也是有必要的。我倒並不是因為蘇聯派代表出席了國際社會學會，新時代雜誌上又提出了中國沒有代表出席的話，才覺得我們該考慮一下在各大學里取消社會學系是否做得對，現在應當不應當恢復的問題。我是不很贊成這種態度的。我並不想再去討論几年前大學里取消社會學系是否是正確的。我也並不想在社會學這個名詞上來做文章。我覺得應當從當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上來提出這個問題。

問題是這樣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出現的許多新的、人和人的關係。其中主要的是新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改變又要求其他方面的

各种关系产生相适应的改变。这些变化都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我们如果能掌握着这些客观规律，那末改造起来就顺利些；如果摸不清这些规律，我们就会吃亏。这里就有学问，也就有科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有经济学，那是有了基础的。其他许多关系的研究我看还都没有很好的建立或发展起来。这话说了，就牵连得多了。我也没有考虑成熟，如果作为一般讨论，我不妨说说我的意见。比如我最近调查了一些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我意识到这里有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那就是怎样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这问题可以包括更多的内容，好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等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的新问题，是在阶级消灭后人和人政治关系的问题。把这些关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来研究它的变化和运动的规律，不是一门新的学问么？如果要挂个牌子，我想也可以说是政治学。

我这两年来又调查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其中有一方面是属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那是新的政治关系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和变化，如果專面加以研究，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我想又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的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是处理得不免太简单化了些，而且的确出了一些问题的。其实，这又是一门学问，我想就是行政学或管理学。

上面所说的那些问题，现在尽管没有进入学府来进行研究，在党派和政府机关里是有调查研究的。但是还有些人和人关系的研究却落了空。比如两性关系罢。这是存在于人和人之间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但是认真地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重要部门来加以调查研究却就很少了。现在不论在那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等都有一大堆，而且大家总是觉得最头疼的，甚至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妥当的。社会进步得这样快，这些方面得需要建立起和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关系，而新旧交替之际，出现些混乱现象是难免的。不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进行调查研究，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当的解决，搞得许多人生活不安定，思想波动，甚至违法乱纪，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

再举个例子：最近很多人注意了人人问题。这个问题不論怎样說法总是存在的。过去却因为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論，大家都不敢再提这个问题了，好像谁一提这个问题就該批判似的。实在說来，好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正可以否定马尔萨斯的理論而建立起我們的正确观点来。大家不敢談，並沒有取消这問題；以致一松口，就出現了“吃蝌蚪”的不科学的宣传。我並不怪宣传吃蝌蚪的人，更不怪吃蝌蚪的人，而要怪阻碍研究人口問題的帽子。

在这里我不想罗列出一大堆問題起来，只想指出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無事的。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調查研究比閉了眼

聽說沒有問題對我們有利。如果我這樣說法是對的，自然要問，誰來研究，由黨派和政府的干部拿出一部分力量來研究好呢，還是搞一批人出來專門做這些工作好呢？我想是專業來搞應當好些。搞得出一套學問來麼？我認為是可以的。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物，它的變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來，不就是學問麼？至於這些學科稱什麼名稱，那倒無關宏旨。如果大家覺得社會學三個字不討厭，用這三個字也要得。如果很多人看了不舒服，想出個順眼些的名字來，當然也好。

也許現在還有人懷疑這些是否够得上稱什麼學，我想也不必在這個字上引起爭執。如果大家承認這些問題有必要系統地調查一番，那就第一步先搞調查，稱“社會調查”也可以。我想反對“社會調查”的人理由是不會太多的。

（原載文匯報 1957年7月20日）

六、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對 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是產生三大主義根源

陳新桂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將越反越多

陳新桂認為目前“鳴”“放”中有五種顧慮。他說：其中有人根本懷疑整風有何用處。儲安平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提出“黨天下”“一黨治國”。儲安平的話還沒有說完。在蘇聯以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專政。把黨外人士看成是異黨分子，這樣，不出宗派主義就很奇怪了。這是一個理論問題：如何一黨專政？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如何監督？這要毛主席繼續發展了。在延安整過主觀主義，愈整愈厲害，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原載光明日報 1957年6月8日）。

陳新桂在發言中，首先說光明日報登載他的談話沒有登完全。他說，他所接觸到的知識分子，當前對“鳴”“放”有五種顧慮：（1）耽心再有一次暴風雨；（2）怕變象报复；（3）提了意見沒有下文；（4）怕衛道者、全面論者圍剿戴帽子；（5）少數人懷疑整風有無用處。

他認為人民日報這幾天所發表的社論，証明知識分子的顧慮不是過慮。

陳新桂說，儲安平“黨天下”的論點，是完全合乎實際情況的，只是他沒有再進一步追究據源。我們要從本質上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是歷史範疇，不是自古有之，也不是萬古長存。它不是目的，是手段，是工具，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中階級鬥爭的產物，是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治形式。這一政治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樣，可以根據歷史經驗作適當的必要的改進。他認為毛主席正在這樣作，已經這樣作。

陳新桂說，無產階級專政已有四十年的歷史，它的正確性應當確定，但它有缺點一面，有陰暗的一面。“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也提到，無產階級專政還有很多困難，很多弱點。陸定一在紀念整風運動十五周年的文章中說，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的地位，領導的地位，便利了“三大主義”的發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害？陈新桂說，共产党的执政，和無产阶级專政是同义語。共产党在执行国家领导和政治統治的时候，依靠黨員作核心，而民主党派和羣众团体是杠杆，傳導帶，这样一种方式就值得研究。他認為我国这几年来对旧知識分置的利用和改造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选派留学生主要看成份，看政治条件，按照無产阶级專政的邏輯，这是必然的。这样做，沒有宗派主义就說不通。他認為說專政是对敌人，对人民內部是民主，这說法是对的，但不全面。因为無产阶级專政的职能除鎮压反动派外，还要組織經濟工作、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他說，党首先信任党員，党員信任团员和积极分子，这样，如果没有宗派主义以及由此滋長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还不是“党天下”，是难以想象的。一千二百万党员，如果百分之一的人犯了“三大主义”，就是十二万人，这十二万人在全国各部門起决定作用，对天下大事关系重大。因此他說他竭誠地拥护党的整風，但是只依靠多少年一次的整風是不够的。他認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作为無产阶级專政用来联系羣众的杠杆、傳導帶，实际上是工具，完全被动，不可能發生主观能动性。要改进弱点和险暗面，必須使党进行领导时所应用的环节，發揮主观能动性，他說他认为毛主席已經这样作。“百家爭鳴”“百花齐放”，“長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是傳送帶，他認為这已經發展了無产阶级專政的理論。他又說，毛主席想的这办法，时间还短促，还需要更进一步推动。如果正“鳴”“放”，真正“互相监督”，这就能使党和党員經常洗臉。

陈新桂說，归根結底，就是扩大民主問題。

（原載光明日报 1957年6月11日）

宪法有的被徹底破坏，有的有名無实

九三学社候补中央委员顧执中的言論摘要

宪法所規定的条文。有些是名無实，有些被破坏而沒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許多現象却不是这样。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决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对时的行动證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規定的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的自由，事实都沒有得到保証。例如有些批評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沒有被登出。报社只登風平浪靜的东西，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稍为联系到某些人物、部長等便不予發表。集会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沒說不行，但事实却沒有人敢大胆的做。第九十四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請大家原諒，說因为学校少，生育沒有

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样宪法也被破坏了。

宪法自 1954 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徹底破坏了，有的有名無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規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張紙，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討論宪法草案的时间，大家都願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現在从刘委员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紙，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將來何堪設想！？

中宣部的宗派主义情緒很濃厚，解放后对老新聞工作人員很少照顧或者沒有照顧。解放后仍允許續办的一些報紙如文匯、新民等報也沒有得到政府的照顧，議非党的報紙自生自灭。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輕視，許多的机关还不讓他們去采访。

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义上有兩家——中国新聞社和新华社，实际國內新聞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

我建議：一、民主党派宣傳方面的負責者應該參加中宣部的宣傳會議。假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是句假話，即使不參加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也應該讓我們知道會議情況。

二、新华社应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样，成为国际性的通訊社，國內則开放讓民主党派、团体、地方办通訊社。

× × ×

參加了許多座談会，感覺有兩種偏差：羣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鳴”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設社会主义这个軌道，但在講話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

民主党派成員講話很苦，稍為講得厉害点，報紙上便批評，和風細雨一点，又会挨罵，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儲安平的發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詞不当，有刺激性，建議九三學社領導加以討論，以免起混亂。

(原載人民日報 1957 年 6 月 26 日)

論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兼評 1957 年 5 月至 6 月初的整風運動——

龐 卓 恒

讀者也許會以為这个題目本身就是自打嘴吧。但我却要說这是个天才的科學

的命題。此非作者自我吹噓，原是从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論中借用來的。但，妙題雖也借，拙文乃自作，文責身負，是古今通理，作者亦無旁貸之意。

一、階級的定义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階級”定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可以找到許多個，比較一下，各有所是，難于抓住共同要領。但暫且引証以下一段：

“當社會勞動所能提供的產品總量難以超出社會全體 最必需的生活 資料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強制勞動的絕大多數之旁，形成一個免除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從事於勞動管理，國家政務、法庭、科學、藝術等社會共同事務。因此，作為階級劃分基礎的是分工法則。但這並不是說在階級形成時沒有採用過暴力，掠奪、狡詐和欺騙手段這也並不防礙統治階級掌握政權時犧牲勞動者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領導社會變成加緊剝削羣眾”。①

以上論述很顯然並不完全適合中國今日情況，但與以下論述對照一下，是有意義的：

“我們的國家機關跟剝削者的國家機關不同。剝削階級的國家機關 是維持剝削制度的工具。我們的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每個人，都是同工農劳动人民站在同等地位的，他們同別的劳动人民做着不同的工作，這只是必要的社會分工。由於工作任務，工作繁簡、工作條件的不同，他們的劳动報酬和生活情況，在社會主義的目前發展階段同其他劳动人民會有一些差別，這些正如同工人同工人之間的劳动報酬有所差別一樣。只要這種差別是合情合理的，那麼這種差別也是正常的，能為羣眾接受的。可是，如果把這種差別擴大化，擴大到不合理的程度，那就會發生危險的後果。我們必須預見這種危險的傾向，及早加以防止。我們站位各級黨政領導人員同羣眾同甘共苦，同事實証明自己同羣眾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主動地、自覺地從各方面調節領導者和羣眾之間的矛盾。”②

可見：社會分工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階級劃分是社會分工的必然產物。

可見：基於社會分工而產生的階級關係，第一：是人們一種互助合作關係，第二：可能發展成“暴力”“掠奪”（恩格斯指古代）或“對抗性的矛盾”、“危險的後果”（人民日报指今日中國及社會主義國家），等等。

如果有人要找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或其繼承人的另外一些階級問題論述來反駁，說我歪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理論，那麼我就回答，上述引証和推論是一點沒有離開原文原意的。如果真的發生了歪曲，那不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自己歪曲了自己。（這不是侮謾它，它本身就有自相矛盾因素。）本來一切事物

① 馬恩文選卷 2 頁 150—151

② 人民日报 1957.5.3. 社論“同群眾同甘共苦”

都充滿着矛盾和自我否定的必然性。理論和現實之間發生矛盾後，總不應削現實之足以適理論之履。

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及其特点

社会主义革命比起“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革命来，达到了自有人类以来一百多万年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程度。还是介紹恩格斯的回忆來說明这点：

“当法国革命实现了这个理性的社会与理性的国家时，就看到，不論这个新的制度較之旧制度是如何合理，可是絕不是絕對理性的。理性的王国遭受了完全的破产。……理性的社会制度，也沒有較好的命运。富有与貧窮間的对立，非但沒有在普遍幸福之中获得解决，而且反而因为那种溝通对立的行会和其他的特权的廢除，以及那种稍微是和貧富对立的宗教慈善設施的廢止，而更加尖銳起来，在事实上所實現了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財产自由”，对于小资产者和农民……变成了脱离財产的自由”。在資本主义基础上的工業的迅速發展，使得劳动羣众的貧窮与困苦成为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

于是，人們猛醒过来，决定要重建真理性的社会来代替这个伪理性的社会，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他們失敗以后，人們繼續探求。終于發現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历史唯物論出發，找到了产生“暴力”“掠夺”的根源所在：

“資本並沒有發明剩余劳动，在所有这样的地方，当社会的一部分拥有生产資料的壟斷权，而劳动者不論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不得不在維持自己所必須的劳动時間之外，加上剩余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資料的所有主生产生活資料，这里所有主是雅典的貴族，还是爱脫魯斯的僧侶，还是羅馬的自由民，还是諾曼的貴族，还是美国的奴隶所有者，还是瓦涼的領主，还是近代的地主或資本家，都是沒有关系的。”②

这是对人类几千年“暴力”掠夺”历史的总结：私有制在長期殘酷的阶级斗争历史中，是最露骨的罪魁禍首。但只是到了十九世紀，馬克思恩賚斯才揭示出了埋葬它的規律和道路。現在 $1/3$ 的人类已沿着这条条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已經在地球上显示出無与論比的生命活力。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論的实践总结。

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論預測的消灭分工、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等理論，据馬克思主义繼承人說，这是在全世界进入共产党主义以后的遥远的将来的事。这里因篇幅及論題範圍限制，不加討論。

① 反杜林論頁 256—267

② 馬克思資本論卷一頁 265—266

無論如何，將近半个世紀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說明：分工，阶级，国家都現實地存在着。如果不是把已有理論視為聖經，就不應該裹足不前，而去科学地分析现实，作出新的結論。

全面深刻的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关系，是作者的知识能力所不及的。但为在崎嶇的科学道路上探尋迷疑之所在，不惜抛出拙劣之磚，借以引出精致美玉”。

現以我国情况为例：將当前社会阶级結構狀況表列如后：

阶级名称 (在社会生产分配中的地位)	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	阶级立場的一些表現
执政者阶级 领导政权的共产党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总代表，全社会生产分配的最高领导者	主导的：光荣的、偉大的、正确的、为人民服务。 从屬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少数党员有国民党作风。
协助政权的民主党派		主导的：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專政。 从屬的：攻击“党天下”，要求撤销党委系统……等等。
工人阶级	工业全民所有制	主导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工農化，工资福利不过高于农民兄弟。 从屬的：要帶家屬，要住房子，要提高工资等級等。
农·民阶级 (附手工業者)	农業集体所有制 (附手工業集体所有制)	主导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农業社会主义改造，支援工业，工人农民是亲兄弟。 从屬的：退社要求減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減工人干部工资，共产党只顧工人哥哥，不顧农民老弟。
知識分子阶级	科学文化事業公有制	主导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把科学文化推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屬的：共产党不应管科学，反对代革包專权，自由主义，利己主义。
消灭中的资产阶级	正在蜕变中为全民公有制的公私合营企業	主导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定息買賣願变剥削者为劳动者。 从屬的：撤出公方代表，定息廿年，反对脱胎換骨等等。

以上阶级划分是按照社会分工所分割的集团、各集团間对生产資料的直接和間接关系、各集团在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而定的。从一般感情上說來，阶级二字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易接受的。事实是：公有制否認各社会集團間任何高低貴賤之分。不过，仍旧沿用“阶级”一詞，是基于兩点考慮：

第一：分工就是現實存在的不平等。社會主義只承認“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尺度的平等。由於分工決定的“能”不平等，所以“酬”也不平等。一般說來，以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執政者階級和知識分子階級總比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一些，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也總比農民階級生活水平高一些。分工是客觀規律決定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報酬也是客觀必然的，所以，階級的劃分及各階級間政治社會地位平等，而經濟地位不平等也是客觀必然的。還是讓感情適應客觀規律，而不要期望客觀規律來服從感情吧。

第二：習慣上考慮也宜于襲用“階級”一詞。如稱工人集團、工人階層、農民集團、或農民階層……或別的名詞，聽來總是使人格格不入的。

總之，一切科學上的名稱總是不能完全如實地反映事物的內容，只要我們在概念里把握住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的實際含義和它較其他社會形態的階級所具有的特殊性質，那就不會在論述和理解中引起混亂。此外，如有人另擬出更適當的分析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結構成分的名詞，那就更好了。

在上述五個階級間，有着性質和程度不同的各種相互聯繫：共產黨和工人、農民及部分知識分子有著緊密的聯繫，而民主黨派和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及正在改造過程中的資產階級分子有較緊密的聯繫。所有各個階級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結成一個矛盾統一的整体。這個整體之內的矛盾鬥爭運動，是整個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源泉。在這個矛盾鬥爭運動中，各個階級之間都互相發生鬥爭和統一兩重關係，而主要的矛盾方面却是執政者階級和其餘非執政者階級之間的矛盾的鬥爭和統一關係。

上述各階級之間的關係，與社會主義社會以前各歷史階段的社會中的階級關係比較起來，有一個根本特點：就是任何一個階級都沒有壟斷生產資料的權力。公有制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並即將取得徹底的勝利。因此，雖有階級存在，公有制的經濟制度決定，無論任何階級如果利用特權非分占取社會勞動成果，就要被宣布為社會的敵人。這一情況，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的特點。

三、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及其特點

以下諸點是大家所公認的普遍真理：凡是差異、皆有矛盾；凡是矛盾皆有對立面的鬥爭和對立面的統一兩重性質；對立面的鬥爭是事物發展的源泉。

據第二節所列述各點，

可見：各階級內部和各階級之間都存在着差異——矛盾、每個階級本身都存在着主導的光明面和從屬的陰暗面。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非仅仅是死去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遺毒或外部的帝國主義勢力的滲入，而主要的是社會主義社會本身就存在着。

可見：如果把全社会各个階級、各個人的思想都抽象歸納為“工人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社會主義思想”和“資本主义思想兩大類，則每個階級，每個人都同時程度不等的兼有這兩種思想。並且這兩種思想的鬥爭，將永遠存，因矛盾兩極的鬥爭必然永遠存在。可見，“資本主义思想”和“社會主义思想”兩個名詞一方面帶有現實性意義，另方面帶有歷史紀念的象征性意義。實際上，每個階級，每個人的階級特性和社會特性皆各有不同。浮士德因與宙斯海倫諸般天神有親姻聯繫而具有神性，但又與摩非斯特魔勒斯品質融合而具魔性；豬八戒因曾任天蓬之師而具神性，因觸犯天條被罰下凡間而具魔性。而豬八戒和浮士德的神性魔性又各有異同。每個階級每個人的神性和魔性皆各有異同。

可見：人民內部矛盾也有對立鬥爭和統一調和兩面。如果有人只願看到統一調和或同志般的互助合作關係，而“不准”出現對立鬥爭關係，實在無異于謝德林筆下的那位剛愎自用的俄國官僚“不批准”使他頭痛的美國存在。

可見：如果在沒有帝國主義起主导作用情況下，執政者階級因遭到人民的某種批評武器或甚至武器批評就要鎮壓反革命或當作敵我矛盾加以處理，則不過說明統治者自己已經在反人民或部分地反人民而已。哥穆爾卡分析波茲南事件的性質時就指出了這一點。因為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終到底是進步的新社會制度和反動的舊社會制度的鬥爭。如果使用批評武器或武器批評來對待新社會制度下的統治者的人們，不足以舊制度的復辟為目的，就不是反革命。它是新社會制度下各階級關係本身的矛盾的產物。新社會制度的生命活力正表現在它對這樣的矛盾鬥爭運動不掩飾、不畏俱、不压抑；挺身而迎，欣然而受從而吸收壯大自己的生命活力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維生素。如果這樣的矛盾鬥爭運動受到人為的阻礙，則說明新社會制度下的統治者自己的生命活力已有相應程度的衰朽。這就可能產生“危險的後果”。我們已經看到，在波蘭和匈牙利，這樣的一批統治者已被人民撤換。

以上說明，分工存在、階級存在、國家存在，因而也就必然有階級鬥爭存在。這和人與自然的鬥爭相別而言，也可稱為人與人的鬥爭。

人與人的鬥爭，在歷史上有過各種形式。按文明進化程度排列起來，大約是按以下次序沿螺旋循環上升運動而轉化：人吃人、人殺人、人打人、人為人等等。這每種鬥爭形式都被有史以來滿胸高尚情懷的文人學士大加譴責：或云人性與兽性無異，或云人性被兽性吞沒，或云人性為兽性傳染。但是，無論如何，在進步着，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這些兽性表現往往同時存在於同一社會形態之中，但大體分析一下仍可看出，人吃人與人殺人的鬥爭形式是原始羣之間的鬥爭特點，人殺人、人打人的鬥爭形式是古代的、中世紀的鬥爭特點，人殺人、人打人、人罵人則是近代資本主義鬥爭的特點。現在我們看到人罵人、人管人的鬥爭形式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特點，在社會主義社會實踐中，也發生了人殺人的鬥爭形

式。

战争，从原始的野蛮战争到现代的科学战争，都是人杀人的斗争形式的集中表现。战争灾害是由于人对社会规律认识不清和掌握不灵而受其强制的结果，正如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和掌握不够就不免遭受水旱灾害的破坏一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比有史以来任何社会学说都更深刻地认识和阐述了社会规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使战争灾害的免除成为可能它使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沿着更广阔有效而又更能避免破坏浪费的道路前进。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实践中看来，批评整风运动、百家争鸣的理论思想斗争运动、民主参政（选举、代表大会、视察）运动等等，是常见的几种形式。有时也有局部的政治行动，如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之类，甚至局部的武装行动，如波兹南事件等。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执政者阶级和非执政者阶级之间是矛盾斗争的主要方面。这里，我要就国家和统治阶级问题多谈几句。

自古至今的一切国家都是社会的生产管理和分配管理的机构，它的职能归结起来不外是在生产和分配管理过程中，克服自然规律的强制（水旱灾害、生产力配置等等）和社会规律的强制（军事、行政、司法、和思想教育等等）。因而，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是全社会的组织。但是由于分工规律决定，国家是由社会中分化的一个专业的执政者阶级来主管，在生产力水平限制了直接劳动者不可能或少有可能参与国家管理及与此相适应的私有制条件下，一般是从与该社会历史前提相适应而在生产和分配中起领导管理作用的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资产阶级……等等中分化出一个专业的统治管理全社会的阶级。这个专业的执政者阶级和它由以脱身出来的那个阶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两者间的利益有着一致性：都是借助于对生产资料的特权、借助于同一性质的暴力掠夺手段来维持自己阶级的生存、来管理和统治社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国家的阶级性。但是，另一方面，执政者阶级和其原来由以脱身出来的那个支配生产和分配的阶级又不是完全一体的。在私有制社会的历史上，这表现为当权的统治阶级和在野的统治阶级的斗争。当权的统治阶级即执政者阶级，作为一个相当稳定的集团而存在本身，就决定：①它本身的特有利益，②它有本分特有的职能：在社会上各个阶级可能接受的条件下，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及其有关事宜；换句话说，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必然要按其本身存在和发展规律而强制必不可少地带有阶级偏见的执政者阶级服从自己的支配。这就势必要和在野的统治阶级发生冲突。反之，如果执政者阶级绝对地从一个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而违背国家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的组成人员就要被推翻而代之以另一批人来组成执政者阶级。这里，国家性质——职能和执政者阶级的性质——职能可以完全不变，仅仅是对执政者阶级进行了脱胎而不换骨的改变以使新的执政者服从国家本身的规定。

律。中国二千多年廿多个王朝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就是这一規律的作用的表现。有些人就把这种現象称为国家的全民性。

作为一个現象来看，国家的阶级和全民性，往往与該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尖銳或緩和的程度成兩極相反的方向变化。阶级斗争愈尖銳，阶级性表現愈濃厚，全民性表現愈淡漠。反之亦然。

总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論、亞里士多德的分工論、盧梭的民約論以至孙中山的众人之事論、皆非純粹的荒謬；而純粹一个阶级意志的国家也和純粹全民意志的国家一样，是黑格尔思想体系的产物，是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指出了“是什么”，沒有指出“为什么”？）

例如，按照純粹阶级性的理論，国家完全是一个阶级的意志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可以恣意使用的工具。朱元璋如果黃泉有灵，一定会感到有說不出口的冤屈：我为农民杀了不少地主官員，你們还罵我叛变到地主阶级那里去帮助他們建立了一个地主阶级的国家，难道毛澤东能够在六百年前就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我並非是国家本質的二元論者，我只是說明国家和一切客觀地存在着的事物一样，有本身存在和發展的規律，这就是一定社会發展阶段中一定阶级关系的矛盾斗争和統一运动的規律。这个規律决定着国家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轉移的本質：国家是社会上各阶级間或各种人間矛盾的斗争总体。掌握国家的人却按自己的观点立場給国家帶上了特有的阶级性色彩，（表現在私有制社会中，执政者阶级总是与該社会阶段的生产分配中的领导阶级站在一起“把领导社会变成加农剥削羣众”，由“社会公僕变成社会主人”。）以致常常把人們弄得眼花繚乱。

以上是在私有制下，国家、执政者阶级、統治阶级的情形。

再回头来看看，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执政者阶级与社会各阶级的关系。

这里，生产資料的公有制產生了兩個根本性特点：

第一、沒有在私有制下当权的統治阶级和在野的統治阶级之分。如在封建社会中，当权的王室、僧侶、官僚貴族阶级和在野的建封地主阶级同时是社会中支配社会生产和分配的阶级。兩者的統一，使人民受到狼狽为奸之害；兩者的斗争，更使人民受俎上魚肉之苦。类推资本主义社会亦如是。所以，阶级斗争特別残酷而帶破坏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社会上已沒有在生产和分配中，借对生产資料的壟斷权而享受非分的权利的阶级，执政者阶级是唯一的管理支配全社会生产分配（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的阶级，完全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片面的阶级偏頗，而尽可能的按照国家本身的存在發展規律来管理国家。

第二，执政者阶级的成员，直接从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等各劳动阶级中产

生出来，法律上否認他們有任何非分特权，就更能保証它能按国家本身的規律來管理国家。

这样的建基于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国家，是基于人們对社会規律認識的結果。人們愈能認識自然規律，就愈能克服自然灾害；愈能認識社会規律，也愈能克服社会灾害。預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以文明的、極少痛苦浪費的、但却又非常广闊有效的阶级斗争运动推動社会前进，这並不是非分的奢望。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执政者阶级，作为一个多少稳定的社会集团，有其本身固有的阶级特性：他們从各劳动阶级中脱身出来，只能以劳动者的利益为依归。这使这个阶级不得不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神性；另一方面，由于其社会地位和認識能力的局限，就不可避免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魔性。“三害”並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从外面注入这个阶级的肌体之中，正如为人民服务的品質也不仅是工人阶级注入它的肌体一样。一个阶级的神性和魔性是由該阶级自身的客观存在决定的。资产阶级消灭得無影無踪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执政者阶级仍会有自己的魔性，不过表现形式和程度可能不同而已。

自然，这並不是說社会主义的国家执政者阶级就平均地反映每个阶级思想或或者是一个超阶级的国家。公有制和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已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动摇的客观发展规律，本能或本質最能与这个规律相适应的是工人阶级，执政者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在内，不管本身願不願意，都不得不以工人阶级思想（主导的部份），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正像六百年前，貧农出身的朱元璋不得不以封建統治思想作为主导思想一样。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鲜明的阶级性。一个阶级的主导思想（非全部的）之所以成为一定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社会經濟結構的結果，是該社会各阶级关系的矛盾的斗争統一的結果。

国家的职能既是在社会各阶级矛盾斗争和统一运动过程中，管理社会生产和分配及围绕此中心而克服自然規律和社会規律的强制，（即生产的，經濟的，軍事的，行政的，司法的宣教的等等事务）因而，执政者阶级就在以下兩方面和各劳动阶级間發生矛盾的統一和斗争关系：

（一）調節社会各劳动阶级之間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包括围绕此中心的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

（二）調節本阶级的生产和分配（国家管理也是一种劳动分工部門）和其他劳动阶级之間的生产与分配的关系。

执政者阶级为人民服务的神性，决定了它与社会其余各阶级的矛盾統一的一面；它的魔性决定了它与其余各阶级間矛盾的斗争一面。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沒有魔性——斗争的一面，也就不可能有神性——統一面。印度民間故事二十夜間中說，“一件軟弱的东西不受打击，因为受它底柔弱底保护比受

千百个护兵底护衛还靠得住毒药不存在，才有好解毒方，美不存在，才有好德行；仇敌不存在，才有好堡垒，所以嬰孩底柔弱是有感力的衛护者。誰想做脆弱的蓮花底敌人呢？”

不解毒药的“好解毒方”，沒有美的“好德行”，沒有仇敌的“好堡垒”还有什到好呢？用“柔弱”保护的“力量”，有什么力量呢？

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要显示出自己的生命活力，就應該毫不掩飾自己的魔性，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者阶级和非执政者（二十夜間作家出版社 1955 版頁 31）各阶级要显示出自己的生命活力，也應該毫不掩飾自己的魔性，讓它在光天化日之下，來与神性斗争。應該防歛除掩飾魔性的种种障碍。政治是众人工事，但又是由一个專政的执政者阶级主管之事。在一人主管，众人参与情况下，才能作莲使执政者阶级和一切非执政者阶级不可能掩飾自己的魔性，不人为的压抑斗争，从而也不腐蝕自己的神性的目的。因此：严密健全的民主法制，大公無私的人事待遇制度，健康活泼的民主生活的习惯性气氛是扫除社会的斗争——进步运动的人为障碍的最强大有效的现代化武器，是不断克服三害的三剂特效良药、我国的政治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一切社会机体的專業医生，應該和广大人民一道来配好这三剂良药。这已是迫不急待的任务。

全部人类历史所昭示給我們的社会进步格言是：

劳动万岁！斗争万岁！团结万岁！

以上从理論上闡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諸問題。下面我想就当前的整風运动实践来考察考察这个問題。

四、关于当前的阶级斗争

自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發出“至于整風运动的指示”以来，至今只有四十多天的时间，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的政治生活面貌，却出現了一个如此急促的大轉变。打开各地報紙，从广州到辽沈，从遼寧到新疆都热火朝天一般卷入在运动中，目前要是在城市，下一步大約要以更广大的規模推向农村。

以今天的运动面貌再回照一下中共中央四十天的指示和作为指示扩充的人民日报社論，是有意义的。

指示和社論指出，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变革取得基本胜利后“人民内部矛盾就轉到舞台的主要方面来了”（五月二日社論），並指出領導者 和羣众之間的矛盾，站着“特別”的地位。指示認為發生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是党內許多人“不了解”“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經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羣众的拥护，有許多同志就容易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問題，而有一部份立場不坚定的份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風的殘余，形成

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群众。几年以来，在我們黨內，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在社論中指出許多同志……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其中少數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識份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讓他們有說話的机会，如果他們說了不满意的话就對他們採取打击的办法“五月二日社論”，有的同志發展了官僚主义作风，安于高高在上，發号司令，摆出一个“官”架子；不顾群众利益，工作中实行压迫命令的办法，靠党的威信吃饭。有的同志甚至思想上开始蜕化，斤斤计较名誉地位，一味追求生活上的享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五月一日社論勤儉建国）。

如果党，这个执政党在向全国人民袒露自己的阴暗面即魔性方面，表现了相当的勇气的话，在闡述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和执政党对此应抱的态度方面，更显示出这个党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理論方面的强大活力。

以下这一段我把它全文抄下：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發展……（省略）——（抄者）……而不至發展为对抗性矛盾。（五月二日社論为什么要整風）基于以上的分析，这个党对整風和整風后的前景作了極为乐观而又充满信心的估計；

“我們不但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省略）……（抄者）……更积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經濟和文化（同上）

如果说，这个党在理論闡述上表现了相当的明智，对当前的矛盾的实际状况的估計，和对于整風运动的規模的估計，则表现出相当惊人的保守，指示和社論都再三强调绝大多数担任国家工作的党员主观上都有着良好愿望，只有少數人有三大主义的毛病，并且似乎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在良好的主观愿望下的“三害”似的。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要和風細雨”整風，在指示中說“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并且预计主要是党内进行，而沒有估计到会发展成一个全民性的群众运动，指示第三节說：“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風运动，應該欢迎。但是必須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並且允許随时自由退出”。

但是，綑繩刚刚一松，就有駕馭不了之势，五月底六月的一两个星期，运动一下由你的平稳转入突然的紧张。主要是在知識份子阶级，民主党派人物，工商界这几种人中反映特别强烈。

这一时期，首都和各省一報紙連續以头一号大字标题报导了惊人的消息；光明日报总編輯儲安平發表反党的“党天下”論綱，人民大学講師葛佩琦連續發表反共言論，匿名恐吓信事件，政法研究付总編輯楊玉清要共产党人下轎下台，人民大学講師王德周說共产党已临危机……。

608人民日报發表了以“这是为什么”为題的社論，說有一批右派份子已經向全国人民發出了反社会主义，反党的阶级斗争警号号召人民来一个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党的领导的反攻击。

接着，看到人民日报上的头版通欄大标题：“对反社会主义謬論無法沉默，觉悟的工人羣众起而应战”，“沈阳鞍山工人分别举行座谈。我們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天津工人駁斥葛佩琦、儲安平等人的意見，我們亲身体会到誰也不能代替共产党的领导”，“农民們痛击反党謬言，农民和党血肉相连”，党的领导不容动摇，”师大教授痛斥背离开社会主义謬論”，“首都文教科学部門民盟基层負責人發表意見坚持社会主义，反击反动言論”，“程潛、熊克武等严斥反党叫囂”……各省市報紙也紛紛集中火力对付儲安平，葛佩琦等人言論。

現在我們把作为反动言論而进行全国范围的羣众性批判斗争的一些典型材料摘抄一部份于后：

儲安平的党天下論調

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綫工作部举行的第十一次座谈会上（六月一日），光明日报总編輯儲安平对党羣关系發了言，他說：在“全国范围内，無論大小單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組，都要安排一个黨員作头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他說，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黨員安置在各种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真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現在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他認為“党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义現象的最終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間矛盾的基本的存在。

儲安平接着举了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他說在1949年开國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他又說：“現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责任？”

葛佩琦發表的“反共”言論

5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人民大學教師座谈会的消息，其中有工业經濟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講師葛佩琦的發言，他說，“我認為今天党羣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麵。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質供应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这

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說良心話，物質供應之所以緊張，這是由於執行黨的政策的人犯了錯誤，例如，豬肉那裏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為執行按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發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

他还說，1949年共产党进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揚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产党是“敬鬼神而遠之”。老百姓几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有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當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要反對他們。例如：1945年抗戰時，受了日本人民壓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共产党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取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你們別是对愛發牢騷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看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不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羣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产党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不要共产党領導，人家不不會賣國。

8日人民日报再次記載了人民大學教師的發言，葛佩琦在發言中繼續發表反共言論。也說，至今羣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羣眾對共产黨的話不敢信任，共产党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羣眾是要推翻共产党，殺共产党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总有那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那也是沒有用的。又說：黨組織對人認為有用時，把殺過朋友，殺過同志、殺過黨內人的人都當作寶貝；不用說，把對流過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門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認，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兒子入党給媽媽來信稱同志。這種事例說明，羣眾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又說：1949年羣眾對共产党不會有這麼多意見，三害不鏟除，狂瀾既倒，若狂瀾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個可能被狂瀾沖走，葬身魚腹。

關於匿名信恐吓事件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国务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产党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種與別人不同的意見，竟有人寫匿名信來恐吓他：“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錫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国务院

殺青長助理的宝座了。你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牆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还敢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饒恕你了，还說：“共产党如果只認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死亡。

楊玉清談“下轎”“下台”

中国政治法律學会在五月卅一日和 6 月 4 日兩天下午繼續舉行法学界人士座談會。“政治研究”付總編輯楊玉清在會上發言，他把这次整風運動叫作“下轎”運動，他說，有些共產黨員坐轎子，脫離羣眾。他說有人說“上級干部太好，中級干部太少，下級干部亂搞”，他反對這種說法，他說：“一切發源于北京，亂搞就是北京亂搞起”。他認為首先北京的上級干部要下轎，他認為不但要下轎，有的還要下台。他說：還有一種人特別應該下台，人民日報總編輯非下台不可，因為人民日報几年來都在歌功頌德，這次運動想“收不”想“放”。

陳新桂談官了主義宗派主義的根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組最近开会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風。会上民盟后补中央委員陳新桂認為，把党外人士看成異党份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這是個理論問題：如何一黨專政？一黨專政，民主党派如何監督？這要毛主席繼續開展了，在延安整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無产阶级專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了主义宗派主义將越反越多。

王德周說共产党危机到了

王德周在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發言：“党已經到了面临危機的時候了：……
……（省略）……（抄者）……達到整風的最高效果”

北京大学西語系教授胡稼胎說

“今天毛主席提出整風是非常英明的，而不整風中國非常危險……（省略）
(抄者)……空中栽樹”

（以上摘自北大校刊）

以下抄一些北京大学大字报，談談無产阶级社会中的等級有名不具請怒不周，……省略……讀者在該大报上批：“深刻尖銳有力”“你說出了历史的真理”，

另一篇 致人民論階級的新發展

談論同學作

……省略……是反历史現實的，唯心的……一个自由耕讀掙扎受地

也受新阶级压迫者 1957.5.2

像“談談”“談論”这种声音，是極为低沉的，引起一些共鳴也是微弱的，在他們貼報的地方，貼上許多反駁言論，有的舉出許多統計材料，有的引經據典作理論辯駁，有的在旁边写着：“人們！你們要警惕啊”。

至于儲安平之类的言論，則在相当一部份子，甚至像民革付主席章伯鈞等人，得到了一些贊同的反映。

但是把視野狹小的知識界、工商界伸向广大的工厂农村的則是一幅別样的景色。

一个工人王宝深的話也許(在主要点上)是六亿工人农民的共同聲音和面貌。

工人日报報導这个工人在这个政治运动中的感情，观点和决心。

工人八日上午，照例又到了中国近代印刷公司一些夜班职工上工买报或去厂門口看报的时间，在这靜僻的北京城西南角，这件事像吃飯一些，已經变成了許多职工經常的一种生活內容………

六月二日，朱宝深从报上看到儲安平的發言。讀完以后，他特別生气，說儲安平太無理了，党邀請民主党派提意見，揭發錯誤是为了改进工作，不是为了别的。但是这位儲安平乘机說什么“党天下”这叫什么“意見”，这是在誣蔑党，我們工人可不同意，我非得說說自己的意見不可！

平日朱宝深总要午睡，可是这天中午他怎么也睡不着了。好多話要想說出來。于是他馬上拿起笔，弯弯曲扭地写了起来，从兩点写到五点，只写了六百多字終算开了一个头。因为要去接班，只得暫時擱下。可是人在干活，心里却不安稳……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已經是午夜兩点了，可是肚子里这股气还没有消除……眼看五个小孩子和媽媽在屋里睡得挺香，他干脆独个兒在外屋繼續写他白天所沒有写完的那封信，越写精神越抖擞，思想像万馬奔騰……直到清早六点钟，才把心里要傾吐的話，全部写在白紙上，整整写了七張，可是朱宝深还放不下心，在入睡以前，他还要爱人到上午九点把他叫醒，好把这封信赶上头班信筒开啓以前投邮，以便能够当天寄到人民日报編輯部。以后几天里，朱宝深还給人民日报社打了電話，查詢自己写的信。

他的这封信刊登在六月八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如下：

“編輯同志：我是貴報的一個忠實讀者，我出身是一個印刷工人……（省略——抄者）……朱宝深 1957.6.3 晨九点發。”

一幅紛繁繚亂的景象，一座充溢着憤慨激动的舞台，反映在观众的眼睛里显然是一批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与另一批反对社会主义的在进行兩条道——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或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論向全国人民呼吁一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已向全国人民發出了阶级斗争的信号。

其实，揭开烟雾弥漫的色彩了，剖出其赤裸裸本質，不过，是社会主义社会机体本身的魔性和神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每个人的神性与魔性的斗争。

储安平，葛佩琦，等匿名信者，杨玉清，王德周……是什么立场，我们这里暂且不去谈论和推测他的主观愿望和所抱的目的如何，只从目前事实指出他们现有地位是属于执政者阶级（民主党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阶级。他们和朱宝琛，熊克武，程潜……等等都是在中国的整风运动中就中国的事情说中国的話。他们各自说着自己认为是真理的話。他们的話来源于他们的意識。他们的意識来源于他们自身感觉到的客观現象：他们所感觉到的客观存在現象来源于客观事物的本质，然而，每一客观事物的本质只能歪曲——近似的反映在現象中，每一事物的現象又只能歪曲——近似的反映在每个人的意識中，每个人的阶级地位，社会閱歷的差異决定其意識对现实事物的反映的歪曲近似的方面和程度的差異。总之，一切意識，言論都非偶然憑空下降，主要亦非外面滲入，而主要是对社会本身所表現出来的神性魔性的近似——歪曲的反映，各种言論，思想的斗争，归根到底，不过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本身具有的神性和魔性的斗争社会对于兩者的暴露和兩者間的斗争都不加以阻碍再抑，就是該社会的生命活力的外在表現。

“拥护社会主义者，”和“反会对社会主义者，”之間的“敌我性質”的斗争的結果必然是：

如果以共产党为首的执政者阶级（包括民主党派）違背人民利益而独断專行，必然遭到人民反对；

如果誰要反对以共产为首的执政者阶级的正确领导，人民就要反对他，

如果以共产党为首的执政者阶级藉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經濟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而自私自利的夺取特权，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

如果誰要反对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就要反对他。

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各阶级間矛盾斗争——統一运动的客观規律，任何阶级，任何人不管他的主管願望是唐玄奘般善良或牛魔王般惡毒，都逃不出这个天命。最后我試圖回答人民日报的这样問題作为本文結語，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整風运动”么？一个医生任意地誇大和錯誤地判断人們的病情，宣布某某已經垂危某某人已經不治如果某人說，我虽有些小病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你所說的病情既不符合事实医生就說，这就証明你不願意医病打击医生积极性这就証明你已經無可救药，天下难道可以有这样不講道理的医生么？看吧：这位病人已因看到有这样一位不講理的医生而加倍振奋起来讓我們隨着历史的使者高呼：拙劣而严格的医生和倔强而健康的病人万岁，龐卓恒 1951.7.61.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陈爱文·江文

这次运动中，有人好談社会主义制度問題，有人忌談社会主义制度問題，交鋒之下，前者宣佈自己應不反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只是要改进某些“具体的制度”后者也声明並不反对某些“具体制度”的改变，双方突然失去了爭執的憑借——然則又何其洶洶滔滔乎！

斥絕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不是写在紙上的条文，它要有書面条文的根据（宪法根据）更要有社会風氣，社会力量的支持，它是起在广大人民生活中間的有生命的东西。因此，一种制度的形成必然經過如下的历程，爭取——宪法——再爭取（爭取立法的實現）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着这样的历程，1919年革命开始，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是第一步；解放后一系列的法制，特別是1954年社会主义根本大法的訂立是第二步，緊跟着第二步而来的第三步，正近在眉尖，1954年訂立宪法的时候，許多人忙于唱讚美詩，很少有人严肃地考慮，如何实施的問題，以所有1955年肅反中許多地方破坏法制現象的出現；宪法規定有言論自由，通信自由，集会結社自由，……等等。可是有的人却由于說了几句不同于習慣教條的話正被指为“反动言論”有的地方公然檢查信件，必然把正当的友誼聚会誣指为“小集团”甚至“反党集团”有的地方甚至非法拘禁，变相審訊，如北大24齋就一度被代用作牢房，这些明知是非法的，但是在当时却到处訴說，這說明了，仅有書面的条文，如果沒有社会力量的保障，就不能說这社会已經有了某种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須有羣众的爭取，过去如此，現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今天的领导者和羣众的关系迥異于过去統治者和人民大众的关系，但是矛盾仍然是存在的有了中央的鳴放政策，还必須加上羣众的爭取，才能够冲破保守力量的阻撓和束縛，才能保証貫徹中央的意圖，民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部份和全体的关系，民主制度還沒有走完备，恐作風問題是錯誤的，但是把它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所导致的，也是錯誤的；三害得以泛濫，是由于社会制度還沒有建立完善。我們目前的任务是：

爭取宪法的徹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

如果有人問你們标榜的是那一种民主，我們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在民主广场上自由講壇上出現的，正在繼續形成和發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歐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長的民主制度，我們要把它巩固下来，並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

們的要求，我們的目的。

侈談改革社會制度者可以休矣，假如你們要改變的也不過是人事檔案制度，留學生制度等，請注意這些並不是社會制度。假如，這並不是社會制度，假如你們要爭取的也不過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請注意，這正是我們要建立而沒有建立好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擁護毛主席的指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

但是我們反對的人“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們把一些離開傳統習慣的見解都指斥為“離開社會主義”肯定社會主義的基本特點是，經濟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有“否定這個原則的，就不能妄指為“離開社會主義”。

我們同意陸定一的話，要在風浪中站穩立場，而我們所理解的立場，並不是現在有些人所理解的凝固的狹隘的不顧事實的成見，只有沒落階級的立場才是偏見成見，先進階級立場永遠是代表歷史前進發展的要求的。

收起那些“聳聽”的“危言”擺脫那些“規戒”和“禁忌”拿出主人的态度來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文系 陳愛文 江文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

林希翎 5月23日在北大第一次發言（根據記錄整理）

我今天很激動，到北大吸到了新鮮空氣，而人大是教條主義的老窩，官僚氣太重，還是北大有民主傳統，繼承了五四的傳統。

胡風是不是反革命？這個問題還不能肯定，現在下此結論，未免過早。

我過去也寫過文章批判胡風，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很可恥。現在看來加給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據是很荒謬的。

胡風是對中央遞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為什麼向党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

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例如他批評庸俗社會學，要動搖機械論的統治，庸俗社會學、機械論就是教條主義，他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現在的藝術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藝術是反映生活的，現在的生活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機械的單調的。他反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說藝術要為工農兵服務，這個講話是抗日時期發表的，現在情況變了，知識分子也成工農兵了，不適用了。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胡風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不同的意見，現在百家爭鳴，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見嗎？劉紹棠就發表了一篇文章，不贊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胡風反對宗派主義，黨內是有宗派主

义的，胡風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長周揚、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風分子中有个别人有历史問題，但並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謝韜就是个很好的教員，很早就搞革命运动，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說他是反革命。胡風的綱領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說他是反革命，若是魯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說他們通信秘密，那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說他們私人間的友誼是小集團。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說真話，难怪有人說共产党六亲不認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圖推翻政权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風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4月，最高檢察院譚副檢查長到人民大學作報告時，有人問他胡風問題怎樣了，他說：現在偵察工作已經結束，但胡風很不虛心不接受意見！同志們，這說明什么呢？兩年还不公布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為難，沒法下台，錯了也不肯認錯，估計毛主席可能有兩種心情：（一）明知錯了，不承認，（二）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級干部中很多人還不通，現在若對胡風平反，是有困難的。

從赫魯曉夫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中可以看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是這樣被逼上梁山的，我們知道列寧在的時候，季諾維也夫曾出賣過情報，而列寧仍給他工作，在革命勝利到斯大林消滅了他們的肉體，這是斯大林的專橫。

赫魯曉夫否認美國國務院發表的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說是美國間諜機關製造的，這很笨，真是撤下了彌天大謊。如果說是間諜搞的，那這間諜就是赫魯曉夫自己！

“斯大林時代”一書出版了，這本書很好，斯特朗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對蘇聯的情況很了解，但這本書只有十一級以上的干部才能看（羣眾譁然）。蘇聯說這本書是反動的，文匯報登出來後，蘇聯還質問我們，這不是蘇聯干涉我國內政嗎？

我國也是肅反擴大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肅反時，一個晚上把逮捕証發給各單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連某禮堂都住滿了犯人，後來又都放了出來。

我曾經在區法院實習過，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檢查肅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檢查過去所有的案件，現在從法院、檢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訴書錯了的修改，沒有理由的補上理由，但是這還叫什麼檢查呢？

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

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这里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鬥爭！

現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們不要以為共产党用整風的办法，採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讓步就够了（羣众轟她，少數人歡迎鼓掌），我知道有很多人願意聽我的話，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講話，我要講下去。我經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个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的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現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大如此轟轟烈烈為什麼報紙就不報道？（有部分羣众鼓掌）人民羣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創造者人民羣众行動起來。

我們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處都有？不僅北大，還有南京大學、武漢大學、西北大學；各地大都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羣众轟她）我不害怕，大家不歡迎我，我就滾蛋，我既然到這裡來，就是冒着危險，坐牢也沒關係（羣众中有人喊：不要煽動。）

听说現在有風聲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吧，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級知識分子是放了，但廣大基層還沒有放，現在揭發的遠不及實現生活中的1%，因為這些教授都是老头，很世故，我們青年長個腦袋是干什么的呢？難道是讓人家牽着鼻子走的嗎？我們要說話！

北大是放了，但我還不大樂觀，因為還有很多衛道者，他們想把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社会主义成果，作為他們向上爬的台阶。（羣众轟她）

同學們，我們說話要警惕，不要讓他們鑽了我們的空子；

我們今天的鬥爭不限於發發牢騷，對一切缺點不能用改良主義的辦法！我們要建設真正的社会主义，讓每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在她發言過程中，羣众遞多條子，要求制止她發言，並且有條子罵她是“臭娘們”）

她講完以後，有三四十個人圍住她，要她繼續講。有個學生還找她簽名。另外一個女同學說：我們要警惕煽動性的話！旁邊一個學生打了這個女同學兩下。

（後來這個打人的人溜走了，沒有找着）接着有人發言反駁她的意見，提出質問，她又作了三分鐘發言。發言未完就被羣众轟下台去，有二三十個人推着她到大會旁邊另一個場上讓她繼續講，她講到她過去的部隊里，知道部隊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從馬塞冰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來。她還說：過去在我心目中，黨，組織，領導，非常神聖，我也很盲從，後來才有些轉變。

論人事檔案制度——請教嚴仁賡

校長助理並致国务院

人事檔案制度的建立，基于兩方面的作用：

一、系統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历史情况、工作經歷，优缺点及受过獎惩等，作为使用干部的依据之一。

二、审查干部的政治情况，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內部。

前者是內部問題，属于民主範疇，后者是敵我問題，属于專政範疇，前者对干部本人可以公开，后者必須严格保密。过去我們大量吸收干部，对他们的情况还摸不清楚，敌人也乘机混入内部，这两个任务密切結合在一起，所以人事档案必須保密。可是現在國內敵我矛盾基本結束，經過肅反、审干，干部政治历史情況基本弄清，人事档案制度第二方面的作用也基本結束了，因此档案材料对干部本人就可以而且應該公开。

至于發現个别干部有反革命嫌疑的，應該由公安部門建立档案进行偵察，这样做的好处：①可以迅速証实材料的真伪，及时破案；②怀疑未証实以前，不会影响干部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如果把这些材料放在人事档案里边，由于人事部門沒有偵察破案的力量，对于坏人，不能及时查出，对于好人，则使他長期蒙受莫須有的嫌疑，产生了消極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已經产生下列主要消極后果：

一、造成人事干部及某些黨員的特权思想，最近人民日报已經揭發了許多事實。我校也有这种情况，有詩為証：“……情郎名叫檔案袋，姑娘傾心好几載，姑娘啊，只怪你思想与他（檔案袋——本文作者）有界線，怎怪他不与你結姻緣”（見十六齋東牆底下，李辛楷，趙振忠，李林活，蔣鎮，王磊，張鐘所作廣場漫步）詩意然隱晦，正好道出了某些人的心理，以為“思想有界線”的普通人是没有权利看自己档案袋的，而只有那些“思想沒有界線”的人，才有权利看別人的档案袋。

二、不与本人校对，造成某些誣告及誤會的漏洞，如中文系新聞54級有一位“積極分子”（本着和風細雨的精神恕不指名）秘密檢舉了一個同學，說他曾向自己打听江苏省公安厅派往敵區工作人員的名單。幸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讓被檢舉者發覺，才查明是誣告的。試想，如果不被發覺，將對地造成怎么样可怕的影响。

三、由于某些領導者对干部的片面的評語，及一些莫須有的材料影响了对干

部的正确了解和使用。

四、形成干部对领导的隔膜和怀疑。到底他們对我的看法如何？”是否在我的档案袋中放进什么材料？这次运动中不是还有人担心自己写的大字报会被装进档案吗。

校長助理严仁慶同志关于这个問題答复說：“此系国务院規定必須保密，以后的鑑定材料，会經本人同意（送研究研究，向上級反映”的余地也沒有难道国务院規定就不可以重新考慮嗎？今后的固然要防止錯誤，可是，过去材料中的錯誤，就讓他过去嗎？我們要求以理服人，不要以“令”服人，在新的时期下沿用旧时期的人事档案制度，正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之一，改变这种过时了的制度，正是整風的目的。

中文系 江文

七、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反對民主集中制

剷草要除根

物四 岑超南

在激动的日子里，要想得更深刻，
史大林錯誤，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嗎？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

請注意：在人民作主的地方，就有了陽光，一切幽靈、宗派、教條、官僚都会被人民扫光，毛主席說：發揚民主，鼓勵批評，只有理論價值吧了，當人民的公民權利在實質上還沒有保証的時候，當打擊、报复、暗害盛行時，批評者地位沒有保障時，當你的命運還被掌握在領導的手裏時，鼓勵批評，不過是对批評的諷刺。

同學們：我們要滿足在民主傳統的北大，特別是學生時代生活是最民主的，因為我們沒有“經濟壓力”“政治壓力”更沒有頂头上司，想一想，为什么同在北大，同學大鳴，而老師噤若寒蟬。

很簡單，誰沒有提陞的要求，誰不怕暗害，打击，誰敢得罪命运主宰，是徹底民主化的时候了，要除三害，便要剷草除根。否則“野草燒不尽，春風吹又生”是信任人民的時候了，沒有人民的絕對權力，沒有人民的民主監督，不論如何整風，整來整去，都不過是一陣風！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掃空！

我堅決要求下列民主措施：

- ① 严格保証宪法的公民权利
- ② 人民领导有绝对的实际的监督批評罢免权力。
- ③ 反对人事制度的神秘化，專橫化，人事工作要受人民监督。
- ④ 除政府、軍事、及特殊部門外一般不濫行保密，以免借保密而干坏事。
- ⑤ 反对新聞封鎖，压制言論，扩大参考消息發行，民主增經常化。
- ⑥ 干部政策要德才兼顧，反对党团特权化，反对“盲从便是德”。

三 害 根 源

化三張錫鋸

(一) 制度問題：

制度可以籠統的講，不必加註解，說什么具体制度，制度中的某些环节。一些人一說到制度問題特別小心，硬要加上具体的制度，制度的环节。这样一來可小心翼翼的說小制度，很小很小的制度。

(A) 制度是人訂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二面性。制度要不斷改进才能达到完善地步。必須破除人們对具体制度的迷信。

(B) 無产阶级專政体現在制度上。制度並非神聖不可侵犯。这也不是个别环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些相似。官僚主义一定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不一定是官僚主义。兩個主义沒有本質区别。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人的思想意識落后于存在，这仅是产生三害的一方面；而目前官僚主义普遍的現象又如何解釋？历史上程度也不同，这又为什么？这是由于制度不同。

要扩張它还是收縮它，是制度与官僚主义接近还是远离，民主还是独裁。

如社会主义国家严重程度不同，既变成社会現象，就要从制度中去找。不然，为什么会变成普遍流行？因为有些制度方便于成長。

在我国 1954 年宪法出来后，人們乐于歌頌却忘了切实保障。如肃反时人身侵犯，以后又压制人們發言。又如 24 斛的牢房。公民人权無保障，法制不健全。又如損害名譽，动不动就是立場問題，一些人利用統治地位損害人权，敗坏社会風氣。

官僚主义者对这些現象熟視無睹，不是不知道。领导也不在乎，一手攏断，在人权無保障下作威作福，表面上（还是喊）为人民服务。

又如选举制度，选举几个提名几个。对选拔干部，不要光是来个工作积极，是个什么模范的介紹，还要考慮他的思想方法。有人对在大飯厅投票，大喊幸福，这难道是心坎中發生的微笑？实际上我們並未干預政治生活，連被选举人也不認識，一提意見就加上“反……”“反……”層層选举沒有直接选举好。这並不是說資產阶级选举方式好。連班上也如此。这就更不必要。一些干部总商量把誰調回來，調回來干嘛？强加于同学头上。

集中制度上的問題說的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制度下的民主。往往片面強調过去阶级斗争时期集中多，阶级斗争緩和以后，人們思想意識落后。如工人委员会比厂長制就好。注意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

政治思想上落后进步在宪法面前应平等。但並不如此，如考大學許多人因政治條件不好而不取。又如政治課必修問題。明明宪法規定有信仰自由，而又規定教徒必修猴子变成人，这平等嗎？

(C) 不民主的統治方法，人民从何处監督。光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形式主義的簽字，权限不下放，实际上討論机关都無权。

(二) 可恥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思想頗壞，滿足于作應聲虫——惡劣的社会力量，对领导盲目服从，对指示盲目推行，对下压制。

若沒有這股社會力量，官僚主義不可能到处橫行。人們習慣于体会領導意圖，以為左傾比右傾好，以為這是自己具有的身份，天生如此，還自認為立場穩。不体会反面就会誇大矛盾，強加于人民头脑中，以為人性次要，階級性重要。一些人，在以白骨搭成的梯子往上爬，良心何在？要摧毁這股力量，必須有積極力量對應聲虫回擊，尤其是抬轎子的人。

(三) 思想上的問題。

這與宣傳機關有關，要消灭家規的矛盾。我們作的應是教导人們接近客觀真理但同學得到的是教條化的东西。

“愚民政策”——凡是使人民是非模糊的宣傳都是愚民政策。如保密制度，連永利碱厂碱的产量也保密（化工老師講的）這除了增加人們的愚昧又有什麼？經濟上絕對數字的保密，相對數字的迷糊人，如廿大赫魯曉夫報告中談各國生活增長倍數，從而得出社會主義優越的結論，增長情況總與基數有關吧，同一水平比才行，這就是愚民，使人信服得五體投地，造成印象不真實（而政治經濟學就好些）這就擴大矛盾。此外航空學院連牌子都不掛，其結果也不過是愚民。有的地方連蔣光慈、黑格爾的書都不許看。又如科學院、原子能、國防化學方面的保密。

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宣傳上的片面性，也許我說這個又會來個立場問題。過去把社會主義說成是天堂，都說成是“最……”“最……”這等於告訴人們不要再前進了。還要什麼實現真理？連政治先生也說過：“過去對社會主義宣傳得太多，几乎完整的沒有缺点”。要全面認識，好像資產階級的東西一切無可取之外。

科學宣傳的片面性，自然科學方面對摩爾根一棒子打死，對自然科學要談階級性，扣上一句唯心，加上一棒打死，把羅蒙諾索夫說成十大家，石像放在大圖書館，似乎一切文明都成了俄國的。偏要如此灌輸，使人們不能認識客觀真理。對斯大林盲目崇拜，對經典著作不能批改，當作神明，從這意義上比作聖經也不算錯，教條主義統治比作中世紀的教會統治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上可與日本武士道、希特勒統治相比。

以前宣傳蘇聯一切都是天堂，二十大以後才知道農業落後，官僚主義者在銀幕

上出現足見普遍，但也說明了英明。又如匈牙利問題，从前宣傳得一切好極了。匈牙利事件爆發以後原來亂七八糟，這難道我們不知道？只是有意識的愚民。

又如南斯拉夫問題，過去一切寫够了，現在只稱之為社會主義，難道會不知道？我們黨水平那麼高，難道是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會辨別？到現在資料還是知道得很少。

愚民政策問題，不動腦筋的人得到欣賞，有意見的人就一直壓制，我只管效果不管動機，有些問題黨不是不知道，除了增加愚昧還有什麼？凡是混淆是非都是愚民政策，不管動機好壞，但導致效果怎樣呢？

人民盲目崇拜領導，便非常欣賞，認為立場穩，於是積極份子提拔成了官僚主義。把信仰代替知識，首先是信仰，把知識推到微不足道的地位。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就是不要人思考，一棒子打死，效果就是爬上去，說好聽點是領導，說得不好是統治，在思想上把矛盾拿開。

上述三方面匯成了一股洪流

× × × × × × × × ×

關於社會發展問題，他懷疑現在的社會發展是否符合自然規律。在他看來，目前社會發展不是按自然規律發展，因為是做作的，先設計個模型，人們再宣傳鼓動，使模型實現。當然先設計好再人為地作，最後必然與模子一樣。于是他懷疑目前社會發展是否符合發展規律。他說要社會自然發展，不要人為。例如人口問題假定多少年後，現在先確定那時人口是多少的模子，人們從多方面努力作到了。如可宣傳人口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宣傳節育，最後就一樣了。這就不是自然發展。

論現行選舉方式的不民主和 民主方式的實行

——要求民主選舉學生會

蔣 兴 仁

目前選舉方式是黨團提名介紹個人優缺點，投票選代表，再用同樣方式選舉領導機構，沒有競選活動不說明被選人怎樣工作，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的選舉，好像選模範一樣（其實並不模範），因此實質上不是人民當家作主，就是不民主，理由如下：

(一) 提名：提几个选几个，虽说可以选其它的人，但没有竞选，不知另选何人，几个人想另选某人，也等于废票。

(二) 提名时是介绍候选人品，如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联系群众(?)等，不介绍他将怎样工作，百分之百的通过，表面上是人民作主，实际上把主权让他去独裁，选举实际上成为人民出卖主权的手續。

(三) 这种选举产生的领导，其工作合乎人民需要也是自然的偶合，产生“三害”确是必然的结果。

(四) 选模范(?)式的选举可能选出有德(?)無才和不願工作的人，把工作搞糟。

(五) 这样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工作不易得选民的了解，提意见也不知多数少数，采不采纳，怎样采纳，由领导个人决定，根本不一定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名义上的主人，选举者根本无法干预工作的进行，实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怎样选举才民主

选举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体现，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必须实行有以下两个特点的选举方法：

(一) 选举前有竞选——由候选人向选民介绍他被选后的工作原则和实现此原则之初步计划——总称施政方针（至于作风正派，工作积极等可介绍也可不介绍）说明其好处缺点。由另外人批评其错误，经过充分宣传讨论和修正后，再开始选举。如只有一个候选人，没有与他竞选的人，也这么进行工作，也要充分讨论，这样选举才是选原则，选计划，不是选模范人品，才是选民意志的执行者，才是选民自己当家作主，不是另外找一个主人。

(二) 选举后被选人必须向选民报告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困难，缺点和对当前重大问题处理方法，举行辩论会及讨论会，在原计划未执行和有新问题解决方法不令人满意时要投信任票，罢免改选。

(1) 选举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选民是选自己的意志，不是选某人的人品。

(2) 保证工作，代表人民意志不是代表个人意志，不产生独裁和严重的官僚主义。

(3) 保证选得其人。不称职不願工作的人，不敢竞选也提出代表人民的施政方针也不会选上。

(4) 选举的机构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执行者，施政方针已得人民同意，更易深入人心，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

(5) 直接受到群众监督便易防止三害。

民主方式执行原则

- (1) 从基层做起，从百家争鸣已经开展的地方做起。
- (2) 供给任何人竞选的一切物质手段（如宣传费，以前工作情况，存在问题等各方面的资料）
- (3) 消除一切顾虑，鼓动人提出各种意见，竞选纲领，互相批评。
- (4) 用法律保证没有拉拢，收买，威胁人其它任何破坏宣传和选民选举的行为。
- (5) 党的领导体现在提出正确的施政方针，派出优秀的竞选人，不体现在其它制度上，这样的领导才是人民选出的，不是强加的，才能够联系群众，不产生三害。

实行步骤：

- (1) 首先在北大试验民主选举学生会，然后推广到各高等学校学生会，各地群众团体，合作社，工厂等基层单位，以致全国政权。
- (2) 在北大实行的步骤：——马上确定学生会任务，宣布具体选举法，在本学期开始，候选人提名，提出初步竞选纲领，收集同学对学生会的希望和意见，进行初步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在放假前正式确定候选人名单，各提出完整的竞选纲领（工作原则和初步计划）利用各种形式正式展开宣传活动，下学期初步进行选举，建立民主学生会。

生物系四年级 蒋兴仁

反正一样——再论现行选举方式的虚伪本质

蒋 兴 仁

现在选举不论是选班会，学生会，党团干部，还是人民代表，在候选人介绍时除个人经历出身不同外都是千篇一律，工作积极，思想进步，积极锻炼，努力学习，作风正派联系群众等等，没有多大区别到处照搬反正一样，而且这些内容既无客观标准，又是介绍者主观感受所以你选何人作何事反正一样。投票建立在相信党相信党组织所提出人选的基础上，结果等于履行指派公式选不选都是一样。而在基层选举上有时指派不令人满意如其他人另有工作无人可选这干部只可作此，有缺点可以帮助改正相信党团可以帮助他为借口勉强通过，履行公式假装民主把旧社会残余装饰成社会主义形式便歌功颂德达到固步自封，保持官僚主义个人地位的目的，这是阻碍社会主义现实的方法，民主与否根本不能保证。

我看民主

叶于淮

最近，社会主义民主問題，引起同學們廣泛注意。这不是偶然的。我的這篇東西，簡要的說明個人的初步看法，願與同學們共同深入探討。

一切社會都有民主

顧名思義，民主就是羣眾自己支配，影響自己的共同事物。只要有社會，就有民主，因為分工協作的生產勞動，本身帶有互濟的性質，就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各個形態的社會都有民主，作用的範圍不同而已，民主生活由來已久，是人類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民主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分工合作的擴展深化，民主生活必然的隨之相應發展。因為：第一，個體愈是依賴於集體，對社會共同事務就愈關切，民主要求就愈迫切。第二，個體在經濟共同體中的地位愈重要，民主要求就愈快得到實現。縱觀社會歷史發展大勢如此。

民主的階級性

在階級社會中，民主帶有階級的烙印，統治階級允許基本階級的成員，享有較多的民主，以便集中其階級力量，鎮壓被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則力圖縮小其民主權利，以分散力量，削弱反抗。

不能認為民主只涉及階級鬥爭。原始公社的集會議事，公選領袖就是民主生活表現，也不能設想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會消灭民主。

民主是進步的社會理想

幾百年來“民主”一直是進步的社會理想，資產階級，喚醒了民主精神，隨著轉化為它的敵人，無產階級宣佈自己為新的民主旗手，但在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里，却作得很保守。

社會主義民主是最高的民主

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質基礎，人

們第一次也可能获得發展个性，自由竞赛的均等机会，但是这种巨大的潜能，迄今远沒有充分展开。

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作为手段，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还存在，我們的中心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所以目前民主居于服从地位，但又必須充分利用民主”这一有力武器，才能团结全民实现反帝建国任务。

但是也是目的。既然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建立更高类型的民主，就必须承认它也是目的。

民主化問題上的保守倾向

社会主义国家多數是存在这个偏向的。（目前已着手糾正）表現在人民羣众不能确有把握地监督国家工作，法制不够严肃。民主权利如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等自由权利沒有澈底实行等方面，这种情况大大束縛了羣众的积极性，影响我們的国际威望。

必須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沒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說，要求它的上層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但是我們現有的政治理論、国家制度领导方法尚未能体现这个要求，这种基础与上層建筑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日益显露，並尖銳的反映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为了消除“三害”，發揮全民的积极性，單党整風是万万不够的，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大刀闊斧的进行上層建筑的改造和建設。

为此首先必须採取有效措施，消除实际压力、限制，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輿論来。

欢迎和同學們討論，請来找我或留下地址姓名

八、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蘇的謬論

龍雲的反蘇論調（光明日報 6 月 19 日）

(一) 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二）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三）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四）我們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摘錄)

九、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 個人主義的謬論

“利己主義”原理

王存心 57.6.15

“利己主義”由來已久，它的內容是很豐富的。限於認識水平，恕我不能詳細敘述，在霍布氏那裏，可以找到“利己主義”，實際上，“利己主義”是建立社會契約論基礎。由於霍布士對高尚的利己行為強調的不夠，他的“利己主義”不易被某些品德高尚的人接受。與霍布士相反，車爾尼雪夫斯基着重強調了高尚利己行為，提倡“美化的利己主義”。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化的利己主義”容易為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接受，但內容較為貧乏。甚至有人認為他主張的不是“利己主義”，只是不恰當的利用了“利己主義”這名詞。霍布士的“利己主義”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利己主義”都美中不足，完美的“利己主義”必須是二者結合，這種結合是極自然的。

人總是做最能使他滿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識的行為沒有不是這樣的。如果說人願意作自己滿意的事，這種願望是利己的願望，那麼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願望，正是這種願望在支配人的行動。

一件事對一個人有利還是不行，或沒有利害關係，取決於這件事和這個人以及評判者用以評判利害的標準、評利害關係可以是各式各樣的。舉例來說：如以健康為標準，則能增進一個人健康的事，對這個人是有利的。因評判者用的評判利害的標準不同。同一件事對同一個人可有不同的利害關係。為了明確“利己”一詞的涵意，究竟應選擇怎樣的標準？一種絕對的抽象的標準是否存在？

誰要是武斷的提出一種絕對的標準，這種標準雖對他自己是適用的，但不一定為大家所承認。當他按這種標準硬說一件事對某人有利，而那却都不滿意這件事時，不能認為這件事對那人是有利的。對自己有利的事必需是自己承認的。因此，一件事對一個人的利害關係，評判者最好是這個人自己，用以評判的標準也由自己選擇，致於如何選擇，選什麼，個人有所不同，並且既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時不會也相同。一個人對一件事感到滿意時，認為這件事對他是有利的；反之，一個人認為一件事對自己有利，在當時這件事使他滿意的。這句話淺顯極了，誰都明白。不過，請不要輕視這句淺顯的話，它給出了“利己”一詞的涵意，

是“利己主義”立論的基礎。“滿意”作為一種感受，是不需要解釋的。任何概念的定義，最終都是歸結於直接感受到或間接感受到的東西。一個人對一件事認為滿意，歸根到底這件事必能使他在直接的感受中感到滿意。

隨著每個選擇的用以評判的標準不同，幾個人的利己願望是千差萬別的。有的為名、有的為利、有的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有的追求物質生活的享受，有的喜歡驚天動地的英雄事業，有的喜歡沒有無聞的談澹泊生活，有的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顧損人利己、有的把幫助別人當做最大的樂事。如此衆多的人的利己願望，分別研究起來是費事的。有些有利願望帶有很大的普遍性，在正常狀態下差不多是全人類所共有的，如吃得飽，穿得暖。也有社會上某些集團的人共同的利己願望，如階級利益。此外、奇特的、怪解的利己願望也有不少，有的是十分荒謬的。所有這些，不管差別怎樣大，在前述意義下都是利己願望、千差萬別的利己願望，在利己這一點上相同。

人的利己願望及在利己願望指揮下利己行為，可以從利己的角度進行分類。雖然人的願望和行為是利己的，但其效果可能對別人有利，可能對人有害，也可能與別人沒有利害關係。以對別人的利害關係作標準，利己可以分為：損人的利己，不損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不要以為利人的利己這樣的用語有矛盾，它的意義是十分確切的。一件對自己有利的事同時可以對別人有利，對自己有利與否，取決於自己、對別人有利與否，取決於別人。

我們堅持的利己原則是：損人的利己，不損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都是利己；利人的利己受到歡迎、損人的利己遭到反對，只不過表明人人都利己。人都利己實在是很明顯的。只要經過思索，介一番選擇，人總是做最能使人滿意的事。許多人不識這一點，是由於不了解利己一詞真正的涵意，錯誤的把利人的利己當作損己的利人，把利人和利己對立起來。人在作利人的事時，常常要犧牲一些個人利益，但這是出乎不得已，是為了自己更大的利益他才這樣做。

關於利己行為，有一點要特別着重提出，就是，除了深思熟慮的利己行為，還有一些利己行為是不加思索就作出的，表面上沒有計較個人利益，而行為的效果却有利于別人，自己的利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失。例如，人在緊急關頭的自我犧牲，將士們在戰場上的許多英勇的英雄行為。這樣的行为是不是違反了利己原則呢？不是的。一個人在作出這樣的行为以前，對於這樣的問題，即在那樣緊急關頭採取怎樣的行為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早就有的考慮。既然主意早已打定，行動時也就表現得毫無遲疑。

為了着重強調高尚的利益行為，我想談談符合利己原則的“捨生取義”。人為什麼願意犧牲自己的寶貴生命去作他認為更價值的事？這和利己原則是不是違背？如果把生命作為人的最大利益（指沒有任何東西比生命更可貴），顯然，“捨生

“取义”違背了利己原則，但前一再提出：“利己”一詞的涵意不能这样简单的了解。“捨生取义”的行為究竟應該怎樣解釋呢？簡單得很。

各章早已提出的：“生我所欲也，義也我所欲也；二者可以兼得，捨生而取義在也”。請注意“欲”字，正是這個欲字給出了問題的說明，對於貪生怕死的人不明“捨生取義”，也可以作出解釋，因為他不欲按照利己原理，人都是利己的，利己本身所以不褒貶，不過，利人的利己受到歡迎，抗人的利己遭到反對，這是不容易的事實。因為人人都利己。行什麼樣的利己在好呢？從利的問題考慮利人的利己最有利，可以受到歡迎，少受到反對，既利自己又利別人。行之做一個利人的利己者不容易，許多利人的事常常使人感到不利己。做一個利人的利己者需要一番努力，作起利人的事來，才會感到很滿意，實際對自己又利，才能心安理得地“自我犧牲”。損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的劃分是抽象的，很少有人是三者之一，大多數人是三者之混合體，在人的一生中，有許多利己願望支配的利己行為，其中有些人是損人的，有些是不損人的，有些是利人的。

儘管人的利己願望是千差萬別的，各樣的同樣的都有利己願望，都要求過幸福、自由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利害衝突，並非絕對的不可調和，相反的，人們聯合起來會更有力量。會得到更多的好处，於是，有利己願望的人結合在一起，過互助的社會生活，人成了社會的動物。與動物本能的聯合（如蜜蜂的“社會生活”）不同，人的聯合是大家都有利己願望，都要求生活幸福的結果，是利己在以“契約”的方式構成的聯合，借助於此種聯合調和彼此利己衝突，並爭取共同的利益。

國家是“契約”的產物。在國家出現以前，人的社會生活是很不完善的，所以嚴密的國家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很大進步。有的國家，統治者利用國家政權為特權階級服務，並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這樣的現象是不理想的。不要忘了人們都是利己的，社會上的人都是利己者，只要有了得利的機會，一部分人就會爬上統治者的特權階級的地位。

不要把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的國家和少數人掌握的國家混為一談，實際存在的國家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大多數人的意志，同時又被少數人採取。歷史上一個個的國家被推翻，隨之一個個的國家又重新建立起來，不斷在改變着，總之趨勢是越來越好。以利己願望為基礎，人能聯合起來過互助的社會生活，尽可能地使彼此利害衝突調和，事實證明這樣的聯合好处很多，對大多數人有利。當人們都這樣聯合逐漸習慣之後，人們相處的越來越融洽，並且，個別的人離開了社會就幾乎無法生活。這裡強調的是人與人的合作。雖然如此，社會上人與人間的利害衝突還是很頻繁，所謂糾紛差不多到處都是。因為人與人的合作是以人的利己願望為基礎，不是什麼鐵一般的自然法則。為了調解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的利害衝

突，社会上不能不設特定的有权机构来处理由于利害冲突引起的人事的糾紛，如法庭、监狱之类。在沒有健全的民主法制以前，人与人間由于利害冲突引起的糾紛的裁判，往往依照少数統治者的意志，或以所謂上帝的意志为根据。少數統治者的意志，有时符合大多人的意願，也有違背大多数人意願的时候。当然最能符合大多数人意願的是健全的民主的法律。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对于人与人的利害冲突起一种調节作用。与法律相配合的，还有作为社会輿論的道德，是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持的用以評判人的行为标准。以此标准可依据，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人們表示贊成或反对，說它是善或說它是惡的，善与惡是人对人的行为所作的判断，不是人的行为本身所具有。因为在不同的人看来，同一的人的行为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惡，或所謂善惡。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人們用来評判人們行为善与惡的道德标准不斷在变化，与变化着的越来越完善的社会生活相适应。

社会上人們用来評判人的行为善与惡的道德标准，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己願望的体现。要想清楚的了解道德标准及善与惡的問題，必須回到一再提出过的利己原則，由利己原則作出一般說明。利己原則除了肯定人都是利己的，还說：利人的利己受到欢迎，損人的利己受到反对，因为人人都利己。举例來說，偷东西是損人利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家都不願意自己的东西被偷掉，于是大家都反对偷东西，社会輿論就認為偷东西是不道德的。与此相适应，法律上把偷东西規定作犯法行为。順便說一句，法律与道德並不完全一致；有些合法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有些合道德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能保証人民生活得幸福，怎样才能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呢？必須人民当家作主，按照人民的意願建立国家和制定法律。爭取民主，也就是爭取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民的意願可以充分表达出來並加以貫澈。国家的組織形式及法律程序等不合人民的心意时，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更換或加以修正，可以不用暴力而实行一些徹底而有意义的改革。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当人民中大多数的利益受到严重危害的，他們就会起来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当时的国家政权，同时掌握国家政权的統治者也向他們进行反击，于是就流血的殘暴的斗争就發生了。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已屢見不鮮。

与人民民主对置的是統治者的集中权力。为了有效的行使国家政权，使在全国范围内有利于国际民主的事务进行有一致的步調，为了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並有坚强的領導，权力的集中是必要的。不过，这种权力的集中必須作为民主的結果，才是民主的集中。集中与民主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否则民主將被限制而成为“集中的民主”。民主的集中是民主的，“集中的民主”不一定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

願。由于民主的集中与“集中的民主”不大容易分辨，民主的集中常常被“集中的民主”代替，使民主不能充分發揚。

民主建立的国家和民主制定法律，能使人民享受各种民主权利，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些民主权利是不可少的。在法律上作为人权看待的自由就是这样，人必須自由的生活，自由的行动，生活才能幸福。自由，不受約束。人可以作各种决定，按照这种决定採取行动。不在他人他物的胁迫下，即沒有約束，純粹是自覺自願的作出决定，並实行它，这就是自由。不管是一喜一怒，乃至把手举起，似乎是自由的，其实並不自由。推本求源都和别的事物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因此，通常談到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表現的自由，意志的自由。在法律上作为人权看的自由，就一般意義說也就是表現的，不过，它和最广义的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有所区别，有他独特的意义。法律規定的人的自由权利，是有限制的。允許人自由的生活，自由的行动，但以不侵犯他人利益的原則。这样的自由是維护人們共同体中每一成員幸福生活所必須的。因而是大家的要求，为大家的願望接受。

前面的叙述中，对个人的利己願望和利己願望的个人組成的集体，說得已經不少了。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領域在前面的叙述中沒有涉及，这就是社会上人的各种集团，既不是社会上一个个的人，也不是社会上人的全体。在同一集团里的人，由于有共同的生活狀況，使他們的利己願望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从而对許多問題有較一致的看法。他的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行动着，並不一定是为了自己所屬的集团，但他們的利己願望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因而他們的个别行动往往对他所屬的整个集团都有好处的。当他們意識到他們的利益是共同的时，为了他們各自的利益，他們为联合起来向侵害他們利益的人或别的集团进行斗争，他們之中的优秀分子，会为此表現出高尚的利己行为，以他所屬集团的利益作为自己最大的利益。这种高尚的利己行为並不違反利己原則，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卓越的文学家了解的較深刻），但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到的。

所謂階級就是社会上有共同生活狀況的人的集团的一种。比如工人階級，就是沒有生产資料並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的集团。階級之間經濟狀況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同的。由于階級之間的利害冲突，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上出現了階級斗争。社会上有階級这事实不容否認，不过也不要忽視各階級的成員都是有利己願望的个人（利己者）正如整个社会人的全体是有利己願望的个人（利己者）組成的一样。至于階級是怎样产生的，这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清楚的問題。通常認為階級是伴隨私有制一起出現的，由于生产力發展，剩余产品有了可能，加上分工和交換給財产的私人占有以便利的机会，于是出現了私有制，隨之也就出現了階級。还有战争中得来的俘虜，令其做劳工可以从剩余产品得到利益，也

是促阶级产生的重要因素。这种說法是可信的，我只着重提出一点，那就是：阶级的形成仍然是以人們利己願望为基础的，人如果没有利己願望仅有剩余产品，强占剩余产品的事仍不会發生，阶级仍不会形成。不要以为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現以前原始人是不利己的，实际上他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結成原始羣和部落等，并且会因为争夺事物等發生利害冲突。

談談阶级也應該談一談剝削問題。大家知道工人替資本家干活，並不能从工資得到全部報酬，一部分無償的劳动被資本家占去了，这种不平等的交易，即所謂剝削。这种不平等交易确实是进行了，但工人不就是心平情願的。在資本主义利益被推翻之前，工人不得不和資本家进行这种不平等交易，並且沒法爭取这种不平等交易，否則就有挨餓受冻失業的危險。工人要求打倒資本家阶级，推翻資本主义制度是为了自己切身利益。工人除了爭取徹底的把生产資料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也进行爭取提高工資的經濟斗争。工資多少是取决于資本家和工人双方的，一面方要使資本家获得很多的利潤，另一方面也要工人的生活得以維持。資本家依靠他对生产資料的所有权並利用工人失業压低工資，工人也运用罢工等手段爭取提高工資。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保証資本家获得够多利潤的条件下，工人工資的提高是可能的，不一定絕對日益的貧困化。

“利己主义”研究可以从兩個方面进行。一个方面是：这样那样的人各式各样的利己願望如何被决定；另一方面是：运用利己原則來探討各种人生和社会的問題。在“利己主义”的理論体系中，利己原則是中心，起樞紐作用。利己原則是淺显的，正因为它浅显的，所以它是可靠的。在探討人生和社会的問題时，如能注意这样一个浅显而又可靠的原則，对于問題的說明是会有帮助的。当然利己原則并不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原則，不具备别的知識，仅仅有一个利己原則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为了进一步指利己原則的功用，下面以商品的价值为例，略加解釋。

商品是为了交換而被占有的物品。交換之所以必要，因为分工；占有之所以可能，因为私有。商品有使用价值；即商品对人是有用的，能满足人的需要。商品有交換价值，指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能和另一数量的别种商品交換。确定了交換时商品之間的比例，商品的交換价值就相对的确定下来。商品的交換价值直接决定于交換双方，交換时商品之間的比例，必須是交換双方都同意的，否则交換就得不到实现。商品的交換价值不是固定的，由于市場上商品的多寡，及交換双方不同的需要，商品的交換价值会因市場上供求情况的不同而不同。通常，在一定的供求情况下，商品的交換价值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如果不是这样，包含劳动量多的商品的交換价值不按比例地高于包含劳动少的商品的交換价值，这时，生产包含劳动少的商品是更有利的，包含劳动量少的商品就会增多，因而破坏原来的供求情况。如果認為商品有一种既非使用价值，又不与交

是价值等同的属性，叫做价值，而把它了解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并且把交换价值换个名称，叫做价格，则可发现，有时价格与价值成正比，有时不是，有时价格等于价值，有时价格低于价值，但不远离。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经济学里所说的价值规律，它可以用利己原则来说明。

上面给予商品价值的说明，对于简单商品生产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很发达的时期。大家知道，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利润率。假如商品是按照所包含的劳动动多寡出售，确实是这样。资本有机构成生产的不同部门利润率不同，由于自由竞争，利润率平均化，随之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这就是政治经济学里所谓平均利润的规律，它和价值规律在表面上是有些抵触的。如何用利己原则来了解平均利润率的规律呢？为此，必须指出和简单商品生产不同，在资本主义很发达时期，资本所有者是不从事劳动的，资本家仗着他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工人的劳动中取得利润。既然可以自由竞争那一个资本家都不愿把资本投到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部门，相反地，那个资本家都想把资本投到利润率最高的生产部门去。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实质是：同样多的资本获得同样利润，从利己原则看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同一利己原则，运用到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的简单商品生产，得到的是价值规律，运用到资本家不劳而获的资本主义很发达时期，得到的是平均利润率的规律，两者表面上有些不同，其实质是同一的利己原则在不同条件下的运用。关于地租、地价、商业资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垄断价值及社会主义时期的物质利益原则诸问题，也可用利己原则作类似的考虑，限于篇幅，不能详细论述了。最后还举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可以由利己原则得出，需要着重的提一提。就是：不断改进的社会制度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

好的社会制度能使社会上大多数人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家都很满意，因而大家愿意保卫它，对于不好的社会制度，人们不满意，人们要求推翻它，改变它。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社会制度，一个个地被建立起来，然后被推翻被代替。在人民能充分享受到民主权利的社会里，社会制度有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能较容易的及时的用民主方式使之改进，不致于发生暴力革命。正如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改正错误一样，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不在于它如何绝对的好，而在于它能及时的按照人民的意愿改变。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当不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危害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民不能行使民主权利使社会制度无所改进，这时就发生了暴力革命。不受多数人欢迎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必须能满足当时社会上大多数的利己愿望，才能稳定。不是什么抽象的社会生产力之类在推动社会前进，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在利己愿望并不断要求这种利己愿

望得到滿足的社會上的人。社會發展暫時的有壞的社會制度代替好的社會制度的情形，但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好。.

談到社會生產力，大家都知道，社會生產是永不停地發展着的。但是不要以為社會生產力是自己在那裡發展，不是的，使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是人。人們為着自己的利益，不斷改进生產工具，使生產有計劃的進行，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誰都希望在進行生產時能少費力氣多獲得產品，誰都希望體力和腦力負擔很沉重的勞動生產能變得輕鬆愉快，這就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只要辦得到，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總是願意使生產力尽可能的提高。由於重重限制，生產力發展速度是有限的。不好的社會制度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改變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的總的趨勢。既然提高社會生產力是符合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利益的，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制度也就違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社會上大多數人所不容許。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好的社會制度被推翻，同時也解放了社會生產力。

5302095 於 1957. 6. 15. (即物理系 王存心)

“利己主義”者宣言

氣三一班同學

請耐心些，不要一看到利己主義就說我在宣傳資產階級思想。

1. 人原來是自私的（概論）

首先我說這句話是與資產階級的“人本質就是唯利是圖的”有本質的區別，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這種自私是生存所要求的，人為了生活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參加到一個集體中去，個人的利益總和就形成了部落的利益，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以後，這種自私就由生存和慾望共同來形成了，在私有制社會里，這種慾望沒有被應有的道德所限制。因此一些人的慾望就妨礙了另一些人的慾望，這是不好的。

到了公有制社會，人，仍然是自私的，這種自私也仍然是生存和慾望共同來形成，其慾望不外是物質上的，精神上的，它又包括榮譽，地位，興趣，理想等，只是這個整個社會的人們慾望類同，機會一般也相差不同，因此就不可能任所欲為而要受一定的道德觀念所限制，最理想的是做到損害別人情況下滿足個人慾望。

2. 人們這種慾望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里其沒有個人慾望就不會形成部落，私有制社會沒有個人

慾望就不会形成階級集團，也就沒有階級，但在私有制情況下由於慾望沒有被道德限制，其自身又產生了阻碍社會發展的一面。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由於受到適當限制，就成為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動力——主觀能動性。

3. 但一點却從被忽視簡單的宣傳什麼“絕對服從祖國利益”動不動就拿這是集體利益來壓人，但卻沒搞清什麼，才是真正的集體利益，他們忘記了在平時若不適當的滿足個人慾望，就要喪失能動性，大家都喪失能動性就等於喪失社會前進動力，也就要失去社會優越性，就企業的發展來說，社會主義企業加官僚主義比資本主義企業還不如的話是有些道理，因為失去了能動性，還有什麼推動社會主義企業發展呢？

4. 有人說“人民內部矛盾以前就有，只是與階級鬥爭比較起來不顯著，現在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了，也就相對的突出了”，這句話對，但不完全，革命勝利後人民內部的矛盾不但是相對的突出了而且也絕對地嚴重了。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程度隨着革命勝利這個突變，也要發生巨大的變化。更使人遺憾的是這種矛盾由於舊思想影響和一些壞風氣的保證，革命勝利後竟得到了不正常的發展，從而部分地加強了人民內部矛盾。

為了消除或減小當權集團與勞動人民的矛盾，我們認為應該取消黨政領導者的一切特權（為工作所必需者不算在內）這是消除目前主要矛盾的有效辦法，這樣做有百利而無一害，作為人民稱職的領導者，應該為了社會進步而具有慷慨的自我犧牲精神。取消領導人的特權其意義遠不在其本身可以為國家節省一些開支，更重要的是消除了當權者與勞動人民之間的實際差別，使得他們的思想意識更好的反映客觀，反映勞動人民的疾苦，目前我國提出的領導人參加體力勞動，實際上太膚淺了，流於形式。每一個真真的人民領導者應該基於他們的才能與自我犧牲精神取得羣眾的敬佩與信任，每一個領導人應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品質。但是現在很多領導人並不是這樣，可是他們通過“莫明其妙”的途徑取得了領導地位，因此我們要求改革我國選舉制度。叫那些不稱職的人下台，讓他們到其他崗位上去強調按勞取酬。

同時為了以後的錯誤得到及時的改正，必須樹立起有效的羣眾監督，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至於更具體的道路還有待大家討論。

十、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自由主義 與無政府主義的謬論

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物四 譚 天 荣

最近几天来，人民日报大为反对据说是“少数右派份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盧郁文接到匿名信。

一、在我看来不是这样一般地说共产党人不但有权利反驳，而且有用斗争会的方式进行压服的特权，說真的共产党剥夺别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倒是應該反对的。

二、……过去普选时大首長再三責我們沒有民主的習慣，沒有百分之百地參加选举，“真是給你們民主，你們還不要”，可是在今天，在广大青年学生爭取真正民主时，大首長們却惊惶失措了……。

三、……現在我們最低限度的民主要求像胡風提出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却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民主……。

总之，在我看来，盧郁文沒有实事求是，而是在無的放矢，他的意見也並不“平易近人”而純粹的廢話，毫無意義的空談，在这場严肃整風——民主运动，实在更沒有比这种言談更叫人噁心了……。

盧郁文的品質是不是“典型的無恥之徒”，是不是“为虎作倀”，我不敢發表意見，不过就常情而論，关于他制造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間的牆与溝方面出了不少力量的說法似乎可以信赖的要不人民日报为什么只字不提呢，考慮到这种人的本性，他們是不会放棄这种机会的，要不是他們什么話也說不出来的話，真的人民日报太盛气凌人了，为什么“作虎作倀”的虎，一定是指共产党呢？我看說他們是“三害”份子更合情理些。把真正的反对“三害”的言論，称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另一方面又登一些廉价的批評，不痛不痒地胡亂給“个别领导人”提一些意見，这就是人民日报拙劣的詭計，再則人民日报把給盧郁文写信的沒有留下姓名这一舉行加以責難，是多么可笑的自欺欺人，寫信人的顧慮可以用葛佩琦的遭遇來作充分說明，他們是不过不願意在槍林彈雨中暴露自己而已，林希翎也接到各种匿名信，她該登在什么報紙上呢，該通過那个電台

广播呢？这真有一点象俗語中說的“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点灯”这几天人民日报組織的讀者來信和其他方式，对这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圍剿未免太不中用了，这些言論很多地方我也不同意，比方說在我看來，他們滿可以不用盧郁文之流提什么警告，可是人民日报更显得軟弱無力了，在這場圍剿中，正人君子除了对这些荒謬論點，表示極憤慨以外，除了神經質地問“居心何在”和“有何意圖”以外，並沒有說出什么道理，正像北大学生會主持的辯論會唸紙條，在墙上公佈从天津來的討伐信件一样（支持我的信要寫成大字報可以貼滿北大每一塊牆，不过这样做多么乏味）人民日报組織的十字軍，充分表現了末落階級的情緒，那些有着內在權利的人，用不着煊耀自己的力量，想想看一种相信自己前途力量会为一封匿名信之类的小事大興問罪之師嗎？真太象为了轉移人們对学生运动的注意而有意制造的糾紛，这不过是垂死的掙扎而已。

紅色的是火燄；白色的是劍；这是最后一場的战斗！讓真正的勇士們前进吧！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論美國民主与我国現行民主比較的优越性

蔣 兴 仁

好多人坚定不移的以為我国的民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民主，但却又有人發出“民主已乘黃鶴去”我們不如資本主义民主等各种言論，我想大胆地把兩個矛盾的意見論一論。

一、民主的階級性，民主就是人民作主的意思，做主是一个行動，沒有階級性，階級性來自前面的所謂“人民”，人民不可能是所有的人，只能是一部份，在美国，主要是資本家，少數人，在社会主义國家（如南斯拉夫）也包括將來的我国，是工农知三个階級的大多数人，所以民主的階級性是使用者掌握民主者的階級性，不是民主本身的階級性。民主是个工具，被何人使用，就服务于何人，本身沒有階級性，所以沒有資產階級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

二、民主的真偽：——蛇無头不行，民主必須集中，把人民的意志集中执行是真民主。集中許多人意見由帝王一人來決定的独裁，也帶有充分的“民”主性。

相反的先集中了或者說先基本上决定了才讓大家举手的民主是假民主。形式主义的民主，帶有独裁性，美国、英國民主有充分討論競爭，有辯論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而我国不論大小由党領導一切事务（ ）先以决定，不許反對，沒有競爭，是假民主，什么也沒有給与人民愚民政策，便說明其虛偽本性，真是：

人民縱是大多數，不能作主也枉然。

帶著三害的人們，被“階級性”冲昏了头脑，敵視过去的一切（不是空气和自然科学都有階級性），拋棄了人类几千年斗争的成果，要創造空前絕后的文明，結果弄巧成拙，搞出过不三不四的所謂“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上富丽堂皇，实质上不如美国的民主，而且某些地方比某些封建帝王的个人專政还不如。

清醒一点，民主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就是使我国工农知三个阶级的每一个人民不受竞争限制地享受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本来是屬於人民，却全为三害夺去，我們要收回和三害斗争到底。

依教条主义分析方式得出的結論!!?

“国民党好得很!!? 旧中国好得很!!?”

（先把現實抛开，从厚些分析）

“民权是实现人民的权利你說不好封建好!

中华民国不好，滿清帝国好!?

你反对国民政府（疑缺字——录者）是反对三民主义，叫滿清王朝复辟。

你看我們不要纏足留辫子，不是自由多了，你去問誰不滿意。

你說我們不好，日本帝国主义好，你反对政府，說（?）三民主义不好，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好。”

是呀，你的話都对，你早出生十几年，我們也用不着革命建立联合政府和現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毛澤东一再說明三民主义是好的，也要反对三民主义的罪坐牢。

共产党应当解散，到国民政府去为虎作倀謝謝！你的理論真好，計（?）真高呀，你把我們和国民党比，你是否作第二个毛澤东，把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不敢，現在不必要，如果長期不整風，这样的人不少。

人民日报为广大人民服务， 还是为个别統治者服务

——論宣傳工具的傾向性

蔣 兴 仁

宣傳工具有兩种，一种为个人或少數人服务，一种为社会或大多数人服务，为个人服务的宣傳工具，完全可以听其主人的指使誇大事实，隱蔽缺点，作到所

謂隱惡揚善，其兩端卑劣作法，如果这个人道德敗坏得很利害，还可以在他的指使下無中生有造謠誹謗，进行各种違法行为，以达到自利的目的，这种宣傳工具不受人重視，我也無例可舉。

为社会或大多数人服务的宣傳工具的特点，就是全面客觀地介紹現實情況，記錄重要史实。古人曰：史官秉筆而記錄，就是这个冤鬼，季南子父兄死了三个弟弟，还是願殉节而不願歪曲事实（东周列国志某人杀齐君，要史官季南子記成病死，不这样記即处死，季南子父亲被杀后，又叫其兄記亦記，共死三人，还威胁季南子，季南子說，这是我的职，不能歪曲事实願死）

說明历史和某些为社会服务的宣傳品，絕對不歪曲事实，或用片面报导变像的歪曲事实，我們知道，歪曲了历史会給从历史吸取經驗的人帶來多大的損失歪曲了现实，使人不能了解实际情况，对要处理現實事务的將帶來多大的損失。

为社会或大多数人服务的宣傳工具，有不有自己的觀點和傾向性？有的，它不但有自己的觀點，而且还想把它的觀點，变成整个社会的。但是他只希望社会接受，决不成为变相强加的。所以他的觀點不表現在对事实單方报导材料的取捨上，只表現在他对各种事件的批語和用其他形式表現出来的看法上。

人民日报本应是为人民服务的報紙，人民要通过他全面了解國內外方面的情况，决定自己行动，管理自己的国家，但是隱惡揚善，一貫歌功頌德，完全忘了自己的任务，在所謂階級性和傾向性的所謂階級理論，把为人民服务轉變成个别統治者服务的工具。

人民日报社，我問你，你为什么忘記了自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而去向为几个資本家服务的资产阶级學習。

人民日报社，我問你，人民能否通过你全面了解國內外情况，我們国家制定政策方針是否只憑你的消息可以作出決定的。人民日报，我問你，为什么不發表北大同學討論我們社会各种根本問題的消息。一封匿名信就大吵大嚷，是大批反革命已經动摇我們的政府了还是怎么的？

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同志，你們不如季南子远矣，你們根本忘記了你們的職業的特性，你們工作的目的，你們根本失去了作人民宣傳員的道德，根本变成欺騙人民的工具，太愚蠢無知了呀！你要好好學習。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

王國乡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想給你的恩賜，不！不是的，

這民主是我們自己爭來的——裏面，還攪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我們盛贊共產黨毛主席，因為它（他）能“順其時”要不然匈牙利的火燄也會在這裡燃起，反革命乘機混水摸魚，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將受多大損失！

有頭腦的人，也不要那樣想，以為整掉某個共產黨員的三個主義，就會萬事如意，不，不會的，如果缺點只是個別人造成的，為什麼全國普遍各地都如此。關鍵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缺陷的問題。

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要保衛社會主義，就必須給人民權力，讓我們在精神上，正如在經濟上一樣得到平等自由。如果人民的義務只是“服從領導”體會領導意圖，那麼“三個主義”在運動中被整掉，還會再起。

也許一位“無頭腦的人”來一個條件反射，大呼曰，“怎麼！你說社會主義不民主，就是要資產階級民主”。你否認集中……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反社會主義本身……”。

天哪！別激動，你的思維失掉了聯繫，要知道，“要民主”不等於“說社會主義沒有民主”，不等於“要資產階級民主”“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不等於“否認集中”不等於“反社會主義”。我說我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因為他沒有使人民免於貧困的自由，我要集中，也要無產階級專政，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存在的根據。但是我要說：如果只集中，沒民主（我國只是民主不夠）就會變成秦始皇或法西斯；專政是對敵人，如果對人民，人民就會打倒你。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最優越的，因為它剷除了剝削——（我宣誓：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血保衛它）。但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領導方法和精神生活，都遠不是我們的理想，而且它僅轉過來破壞經濟制度優越性的發揮。

有頭腦的人，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鬥爭。首先就是爭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沒有權利什麼事也辦不好，社會主義也會瓦解或出現“斯大林”。

我認為民主不僅是一種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產主義必不可少的組成部份。如果只是方法，那麼建成社會主義後，就不再要民主了。——這多荒謬！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民法、刑法——等必要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意志、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大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

我們要作國家和自己的主人！
社會主義民主精神萬歲！

十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 绝对平均主义的谬论

我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301 教师 周 大 觉

自去年匈牙利事件以来，思想危机残酷地折磨着我；经过半年多的学习、请教，自己开始有一整套的想法，这些看法有些群众基本上同意；我要求党进一步帮助我研究问题，积极分子、支书们采取一种鄙夷恫吓的态度，不久前党委还有过抓小辫子、上材料一类行动，事情至此完全不由我了，只得把我的思想“暴露”出来，一方面可以“自白”，另一方面请高明人士指教，或许使我摆脱错误思想。

目前正在日趋形成一个领导者阶级

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引起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的集团……”；现在我们看到领导者已完全具有该定义所提到的条件：（1）在生产体系中处在领导地位，不进行生产活动，而靠进行管理活动获得经济上的优势；（2）对生产关系说：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附带地声明：生产关系包括所有权及支配权两个平行的内容，详见联共党史中斯大林所下的经典定义；只强调所有权是显然不对的，例如有人对某物具所有權，但沒有支配权（正象今天全民“所有”、少数人支配），这时这种“所有权”是有名無实，实际上根本还不如丧失掉的支配权。再举一例，我们知道毛选第一篇文章就提出买办阶级一概念，买办沒有生产資料仅仅具有国家财富的支配权，我試問：假若支配权是無足輕重的話，为何在生产关系上把买办与人民分开来而另成一阶级？（3）劳动组织中处支配地位，这点是很重要的（联想一下这次整风中揭发出来的在人事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引起多大的不满！），它是控制人的最积极的手段；（4）领导者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一个具有组织的集团。领导者具有以上形成一阶级的必要条件，因而产生一系列的必然结果，首先领导者领得财物較多得多，与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較，这里人为规定工资，人为的“按劳取酬”。与旧社会相当的工资悬殊……都看出事情是不合

理。然后，領導者享受一个巨大的公費开支（有的比工資高好几倍），得寸进尺地什么补助金、獎金等都不約而同的偏利于領導者，造成一个經濟上的优势。同时，在物質生产上領導与羣众有着不同的傾向，尖銳地反映在五年計劃上、在人事关系上的“宗派主义”等等后果，都是由生产的地位、生产关系、劳动組織中不同的作用而产生的；所以得出結論：目前正在日趋形成一个領導者阶级。再談一下分析阶级的几个应注意的問題，本来它們可以直接根据列寧的定义看出来，不过往往會不大注意，引起人們思想混乱。（一）阶级是否正在形成並不取决于它怎样形成，奴隶主是人民公仆被人民选出来后逐渐形成的，资产阶级是手工业者及商人致富竞争形成的；（二）分析阶级时不要攷慮上層建筑（思想领导、国家机构、民主方式、政策法令包括所謂“工資政策”等），而相反，从長远看，上層建筑总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三）当某阶级成员与国家机构成员合为一体时，不要忘記該阶级的存在，在攷慮官僚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时就应如此。

目前我国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阶级的性質

由阶级观点看問題，可把很多現象搞得更清楚。譬如，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領導与羣众之間的？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成为对抗性的，而这种对抗性只产生在領導与羣众之間，而在工人与农民之間？为什么矛盾产生在經濟問題上最突出：五年計劃、干部的經濟特权、人事关系的“宗派主义”……等？（注意阶级定义中的几个条件）答案只有一句話：由于領導与羣众不是属于一个阶级，因而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独特部份即阶级矛盾（在一定情况下，把这种阶级矛盾作是人民内部矛盾大概仍然可以。“人民”兩字是政策上的詞令，並不是政治经济学名詞）。今天三害空前严重，难道仅仅由于干部驕傲了！拿这种思維活动来解釋社会現象令人滿意！？“生产关系决定思想意識”对今天來說是过时了的公式嗎！？在和平生活中、在社会主义現實教育中，国家干部滋長了比不断走向胜利的解放战争时期多得多的驕傲思想（官僚主义）是什么原故？不是因为生产关系（包括生活条件）处在特殊地位嗎？所以，少数人形成集团、管理生产的生产关系决定三害的必然存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仍有阶级存在）是矛盾的尖銳（以至对抗）化的根源。請听一听南斯拉夫人所說的話：“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必須能够承担起来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任务（意即必須自己管理生产——本文作者註），否則他們將成为以他們合法代表而出現的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奴隶。他們的代表在管理生产資料方面一經独立，就不再是他們真正代表，而成为他們的主人”。这是光輝的馬克思主義的預見，它預見了今天工人运动中最普遍的現象，匈牙利、波蘭事件，各一長制、党委制国家内部矛盾尖銳化以及思想混乱与空虚等等。这些問題总的來說，就是鐵托同志所說的制度（指生产关

系，不指一長、多長、党委等問題，因后者只是領導方式問題而已。有人撇开这根本問題，既不談、又不討論，反而大談其領導方法，並肯定党委制优于一長制；实际上，这一点也还是有些可疑之处，一方面一長制也有上、下、左、右监督工作；匈牙利事件的錯誤是拉科西——格罗集团犯的；波蘭的肅反問題开除好些大干部党员党籍，可見也不是一人之錯；另一方面党委制也有一長——总書記，斯大林时代犯錯誤主要是党的領導放棄集体原則，終究还是党委制出了問題；若是党委可靠無疑，党中央为何也把这种重要原則背棄無遺？更重要的是：一長制在人的任命上有新陈代谢的作用，而党委制领导人的圈子限得更小了，只有十二万个党的有资历干部，这样不是危險性更大了吗？

对南斯拉夫、波蘭制度应多加研究

我对当局不积极介紹、翻譯南斯拉夫經濟理論有所不满，政府不應該把“異己”的看法視若仇敵（以高等学校为例，我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以来，直到現在党委還不會把“異己”不同的制度作过一次介紹，有人問起來也只回答說：“还不清楚，听说乱七八糟”），何况是这些“異己”的看法受到人重們視，何况当波蘭人民不顧各种阻碍建立了工人委員會、而且参加到生产中去，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走向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要求。虽然目前資料不多，但仍能从基本特点去理解南斯拉夫制度：生产管理归工人集体，全体工人不記名投票选出工人委員會，委員們不脱产进行工作，决定生产中基本問題（如分配、投資等），企業首長（唯一的脱产干部）被授与一定权力，对工人委員會負責；不受任何領導、不許組織企業間的联盟，因此領導者不致形成一个集体（注意联想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生产由社会的自發需求來調整，客觀地反映人民要求，加上國家（生产者院）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經濟結構談不上什么阶级出現，因而，根除了官僚機構，不存在三害；民主生活比較正常，人民生产积极性高漲。有人拿五年計劃指标来指責南斯拉夫制度，关于这点我个人看法大概这样：第一点，南斯拉夫比各东洲人民民主国家生产数字稍低是因为沒有苏联帮助，这种援助在建国初是特別需要的，剛剛南斯拉夫沒有；其次，南斯拉夫沒有工人自治型社会管理經驗，而其他各国有苏联一長制整套經驗，我們回想苏联在新經濟政策前后的一段困难情况，就会感到一种新制度剛出現总有阻力，因而不可免地影响生产力；最后，也是最基本的，生产指标不代表人民生活水平（卡德尔同志这样說过），比方，生产由国家規定，計劃了过多的高产作物的生产，結果大家吃粗粮，生活水平不是下降嗎？还举一例，加班加点不是与身体健康、生活水平相矛盾的嗎？可是往往在某些地方看作是完成“計劃”的最有效的手段。（据哥穆尔卡揭發，过去在波蘭就这样，以致影响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力大为降低。）

对今后問題一些初步看法

現在对解决人民內部矛盾提出整風的措施，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欢迎。显然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不是制度上的改革，怪不得有人害怕到將翻回来整；三害的根源既是生产关系，那就不能希望（实际上也沒人敢这样希望）它以后絕跡，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加会日漸巩固、加强（直到象苏联那样，一切由首長安排，連百家爭鳴都視為“忤逆”）。有人認為当腦力劳动、体力劳动对立消除后就沒有领导了，也就不会有领导与羣众的矛盾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首先，腦力劳动、体是劳动的对立消除后恐怕还需要有人管理生产吧！問題大概仍然是少数人管理还是工人集体管理？其次，等到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消除需要好几十年，讓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繼續下去，不說这事本身的危險性，就讓老百姓生活在三害（可能由于整風，时而严重、时而減輕）的統治下也是很殘酷的、不负責任的。所以我認為只有改变制度一法才是解决矛盾（阶级矛盾）的根本办法。改变制度就是改变生产关系，这是沒有代用品的；政策法令既不能代替制度，人事的任命方式、选举方法也不解决全部問題。（譬如：以前各阶级社会的选举方法，無論花样怎样多，解决不了矛盾的阶级关系。）我的初步看法是：應該建立工人委员会（學習南斯拉夫、波蘭人民）或同性质的組織开始进行生产管理。在改造资产阶级的同时改造領導者阶级，党的“领导”应逐渐退出生产体系。

（原載第 127 期“民航生活”）

論“階級”的發展

——錢如平（談論）作——

談談同學提出等級的存在，似阶级分野，然他为免和自称“衛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道者”堯嘵舌，不提“阶级”二字。小区区非神非聖，就十几年来对革命运动所見所聞及亲身領悟發表如下淺見，希大家补充事實，並加理論深究俾使達到改善現況之目的。

一、远在 1945 年我聞浙东游击队紀律严明，帮助农民抱不平……我出身貧农之家，深惡痛絕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尤如大火在心中燃燒，目睹善良正义的兄弟壯烈牺牲，深深同情，此外我也知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道理，在年幼的心灵里撒下了要翻身，要平等民主自由的种子，我自小學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我可以不受岐視鄙視……。然而七年的經歷証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慘狀目

不忽視……。

二、談到“階級”的發展，就要回顧一下什么是“階級”？根據馬列主義，我們知道它是社會上的各種集團，它們間是由生產資料的占有與否？在生產中的地位（指支配或被支配）產品的分配社會上的地位等所決定的，從土地改革徹底勝利之後，接着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等後，舊的階級關係粉碎了，因此從現有理論上來看，我國已基本上消滅了階級“衛道者”們沒有思想，1957年的今天理論已大大落後於實踐，而你們都却以此為滿足，高而躁的干叫“社會主義萬歲”“馬列主義萬歲”這和佛教徒求菩薩活一千年的唯心願望有何區別？我們要問社會科學理論是否在發展？如果舊的過時了，也就是說死亡了，那末怎麼會萬歲呢？如果喊馬列主義精神萬歲，還是對的，因為它主張科學地研究問題，而不是死保住陳腐的觀點去作阻礙社會進一步完善的人。

隨著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自然這與舊的不同，它有獨特的特點，粗略想來有以下幾點：

① 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現在的占有已不同於資產階級，他們是比較分散的，現在掌握政權的各黨政軍要人占全國人數比例很少，集體占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這點現在一時不易看清楚的，如果看一看分配關係就更鮮明。

② 分配，中央一級干部（或稱萬歲、九千歲、八千歲……）（或一價官、二品官……依此可排下去……）每月薪金500多元，

.....也許農民比不恰當，更以普通工人比較一般為40—60幾元不等也相差30多倍，據我所知在中國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即使中等資產階級也沒有如此大的純收入，因為資本家他極大部分利潤必須找回生產之中，我們可從講課中知道，中國許多中等資產階級他的總資本不過兩千元左右，因此，縱然形式上不是剝削關係，但事實上存在着不平等交易，也許人們要說：“他們是腦力勞動者高級又複雜……”此說下面再談。

③ 我們要向如此懸殊難道是符合社會勞動等價交換嗎？我看不是，只不過利用政權——領導者自己對物質享受的感興趣，自己規定的。在整個社會生產力極低的情況下，如果不是不等價（指勞動量相同）交換，不可能相差800倍，因為試想像：你周圍很落后的生產力，你一個人能創造如此多財富？毛主席等他們勞動竟如此珍貴？若告知天下農民賀歲者我看寥寥。

④ 社會地位，宪法上名義上規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不論工作、學習、游玩、吃飯……）均論等級，顯易可見不平等，一個小小的

党支部書記可以呵斥直到無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統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至多換了一个名义和方式罢了！

⑤ 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見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⑥ 变相的衙役公差存在，只不过美名曰“通訊員”，实則不平等待遇。以及公差仗勢欺人屢見不鮮，（可看报）此外对公民的不信任，犹如特務監視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因为最兇殘的国民党中美合作所，他們抓人也至少有些事实为依据，縱然枉杀者也有，但試看北大有200余人斗錯，被捕者兩人，也是早已有交待过反革命罪行的。可見現在根本沒有什么人权，生命安全时时威胁，一触犯上層貴族，就可以被冤杀枉斗关上几个月还以一淡淡的道歉。可見这种也可以和剥削阶级的統治，“媲美”，“衛道者”們会說我沒有“立場”，但我試問：人民不要听驕傲听平等自由無剥削……美好無比的社会……然而連生命也無保障，人的尊严随时可被侮辱，这算什么“美好幸福”的社会呀！如果这样的“社会主义”万岁，我宁愿拚死，不願再存，簡直是牛馬的生活！！！*

⑦ 历史上如朱元璋等打天下之初，总是为了爭取羣众，与人民一起騙得大家信任，一旦大功告成一脚踢开羣众，借故屠杀功臣，（朱元璋所作大家知道的）爭夺地位名利。在我国現在，也是伸手找報紙或打听一下儒林內部就一目了然，更有許多政客投机分子，削尖头皮鑽入政党，荣华富貴有勢有权，盛气凌人。

⑧ 也許这个比方过分，但比譬只能相似不等于相等，請看官辨清，这时还在初中一年級，一位国民党军官大叫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國父遺囑”“平等地权节制資本”象煞有介事，事实如何人家都知道，不贅述，今之自命“衛道者”之貴族說“辯証法、唯物論、民主、自由、平等、美好的社会……”事实象顧牧丁副教授只不过过去有些和旧政客來往和胡風也有往来，但馬列主义中說：事物是發展的，既然如此，过去有“問題”（？！）又怎能推出今天有問題（！？）这叫發展嗎？再說毛主席說過：“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然江書記說：对頗有“根据”，有檢舉“材料”沒有調查就宣布他为胡風分子，豈不是含血噴人？就思想方法而論徹头徹尾的唯心主义。甚至还不如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唯物呢！（可參看毛澤東选集談到我党應調查研究問題——毛主席所說過）因此使人不禁要問：現在的“真理論”是什么？因为馬列主义只是掌权者的招牌而已，实际行动又是另一种理論指导着。正象辛亥革命流产时一样，現在这样的現實“万岁”下去，我認為革命流产了，假如不急剧地扭轉現在歪風的話……。

三、你們会說現在工农生活不是提高了嗎？对，我看到的，但提高了多少？实际上提高了多少？社会發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总是上升的趋势，这点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一般收入总比资本主义社会好……。我国工农收入几年来实

际上增加不多，仅过吃饱不餓死的程度，倘使有人說以往半年吃糠吃不飽等等，來替現在社會分配、政治等不平等辯護的話，我要問：你也知道我們的眼光向奴隶社會的方向看去還是向更合理的社會望去？

資本主義不合理，我反對，但我認為現在也不足美，要改變。真正的勞動人民的代表真正的人民領袖應該是和人民共甘苦，尊重人民的偉大人格；他們是歷史的主人，挂羊頭賣狗肉者必須下台。

四、新的階級矛盾和舊的不同，可以利用羣眾的壓力和平的方法解決，必要時也可以通過暴力——到無可救藥時。任何企圖以歌功頌德，個人作用，一部分人的作用捧到天上来迷混羣眾視聽的人，在鐵的客觀現實面前粉碎，丑相畢露無遺。毛主席是偉大的，他知人民疾苦，功劳是大的，但我們更要記住，和他一起搞革命的數以萬計的工農知識分子無聲無息的流盡了血，黨是偉大的，作一個黨員是光榮的，但是沒有人民也將一事無成，一切功劳應歸功于人民（當然也包括黨員和領袖），把締造歷史的丰功偉跡划歸一個黨所有是反歷史現實的、唯心的。

五、要徹底改變現在作風建立起足以保障人民自由民主的法制，反對口是心非，反對對羣眾的欺騙，宣傳，反對唯心主義的傳播，反對特權階級的存在，制止屠殺，監禁無故的人民！反對新的變相的階級壓迫，人們要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現實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羣眾的歡悲哭泣，好的發揮壞的堅決剷除，如果有一個集團堅決違反社會的發展違反人民願望的話，我想人民一定會羣起而攻之，真正歷史創造者劳动人民知識分子萬歲！一切違反歷史發展者的姑惡不悛者應下台！正義萬歲！真理萬歲！民主萬歲！人身自由萬歲！

六、如果有人要駁請針對論點，希勿牛頭不对馬嘴亂放炮更勿歪曲原詞之義，勿斷章取義。

——一個自幼耕讀，掙扎，受地主，也受新階級壓迫者——

(註)聲明我不寫姓名，取作“談論”繼“談談”同學之後，有感而作，現在衛道者拿着籤條——一教條亂打人，我也得知一切新思想剛出現時，總會有反對者出來，而且很可能遭到迫害，因為幾年來事實教育我即使經過一定考驗的人也常常口說一套，做另一套江書記說過有爭鳴自由我現在深感可疑，其態度也不很誠懇，對顧牧丁之道歉冷淡淡的說一句，甚至可以說還嘲笑他歷史上有過問題。好吧，寫到這裡請提意見。

再論“階級的發展”

——談 論——

昨××楊君傳達和黃良元同志(史三中共黨員，有一定教條主義習氣，誠朴，)

會思考一些問題的好同志）。交換看法一致。

① 認為公有制比私有制優越得多。然而我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如何保證公有制名符其實，就是說公有了之後，如何正確的分配，我們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但目前問題不在此，而是不合理的懸殊的差別，這樣縱然占有公有，但實際上在分配過程中，無形中一部分佔有了另一部分人勞動，人民占有生產資料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產品（或相當產品的貨幣）因此，若分配不好，也就有剝削現象，這時雖然生產資料公有。

② 目前正是發展懸殊（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但另一方面制止它發展的因素增長，有自覺地自上至下的和平方式解決的可能性。

③ 双方一致認為習慣勢力固然是一重要因素，舊社會遺留下來升官的願望，輕視其他職業的惡習，但這是次要的，它只能在新舊制度交替之際起一些阻礙作用，像婚姻問題，有了法律保障，再加利用政權力量，宣傳和輿論，習慣勢力完全可以扭轉，重要的在於規定一定的法制採取強有力的措施。

④ 黃良元認為自己受蘇聯主義影響，起初看我文章時很反感，主要認為社會發展到公有制為基礎就萬事大吉，無需再考慮如何更完滿以及可能產生新的階級分野，沒有考慮如何防止黨、政府工作人員不脫離羣眾，沒有注意到要有一定的制度來保證（這裡制度指具體辦法）。

⑤ 黃良元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核心將放在分配上，如何完善管理制度，不好的管理制度會導向變相的階級分野，今后他將和同學們長期研究此問題，並提交給有關部門考慮。

⑥ 與經濟上差別相應的社會地位等，一致認為必須改變社會，應樹立起勞動光榮，各個行業地位平等，這要求分配上，政治上，（即參加一定領導工作等）權利平等，這是物質的保證，否則空談。

⑦ 我們對如何改進現在政府領導及黨、團地位有初步磋商：

1. 革命者應“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建議黨員，團員把一部份錢交給組織，作為社會費用，這樣實際收入比同級的其他同志少一些。現在恰巧相反，因此沒有體現革命者的精神，反而助長了對物質享受的無限要求。

2. 除個別特別優秀品質的同志外，領導人員應該長換，三、四年改造一次，改選出原來的羣眾中的典型、模範人物，這樣保證不脫離羣眾，又有個別有經驗的人指導業務，就能把行政工作搞好。

⑧ 我們的不同意見只在於用什麼詞來表达及對當前程度的估計，黃良元認為只提一下人民內部矛盾，對措施認為不重要，知道那麼一些意思即可，我認為“人民內部矛盾”此語太抽象，應該說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在分配、社會地位等問題已出現一定矛盾，現在還不甚尖銳，叫內部矛盾也未嘗不可。但必須指出來，

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問題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發展，而且基本上滿足“階級”关系的定义。因此，为了正視現實，重視這一問題，指出新“階級”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不能輕描淡寫地含糊的說一句“人民內部”矛盾。要解决它，必須从經濟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解决，其他都是次要的。

⑨ 我昨天受涼，不能亲自去，黃良元同志請楊君代為問好，深表感謝。他們昨天晚上7.45—8.45進行的，在友好，討論問題的氣氛中進行，因時間有限，只談主要問題，只好握手告別，大家認為有時間還有暢談幾次，很有好处！

⑩ 声明：許多同志对我提出許多意見，因時間有限，不一一答复了。許多由于誤解，以為提出社論改進公有制中的問題就是否定公有制等等。其他又如措詞不妥當、詞不達意等等都不多談了。許多具體材料也可以商榷，但不很重要，因为找一找報紙就有的，主要的是一些基本的看法。本人學理科的，沒有專門研究歷史、哲學等，文章也寫不通，這些請原諒，不原諒就批評，也受得了的。其他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管理制度的問題，本想專題再討論，因考試面臨，一個多星期沒念書了，想補一下，不再寫文章了，如有同志感興趣，請示尊址，或洽商約定地點面談半小時或一小時即解決，本人無法來時，請楊君或劉君前來。

〔註〕其他如思想方法問題，對過去工作的估計等，及個人品質形成和物質基礎也有討論，不多寫了，欲詳知者，請到30樓410號找黃良元詳談。

——論談——

1957年5月28日

談談無階級社會中的人的等級

在古印度，人們被分為高低貴賤的四個等級，婆羅門，刹×利，在古羅馬……在封建社會……在資產階級社會……在納粹，有優秀的雅利安人種……在新的時代人們進步了思想聰明了，等級也就更細致了。有出身世家的特種材料等級的非……有出身……的應聲蟲，吹捧等級，有第一可靠等級，第二……第三……可惜我沒作過人事干部，不能把這種新的“人種新麻衣相法論”中的微妙之處……向你闡明。

有人要說，你在此人为地製造分裂，但是親愛的教條主義先生，客觀的存在是不能因為你的否認而消失的！看看人所共知的事實吧！

① 留學生問題，大家這點談得很多，我就不多說了。

② 生產實習的問題，什麼機密地方而去什麼等的人，在我校也有請參考航

空學院的爭論，那里更尖銳。

③ 畢業後工作分配的問題，某些工作，某些人是不能去的，例証之一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研究，雖然在世界各國早已公開，甚至我們也帮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建設，但它對於中國青年來說，是保密的是要由些“人事專家”根據人種論細細的划清了你的等級後，欽定的，如果你本來就是賤民階級，你就今生休想。

④ 在各種運動中，如果你不是高貴等級，那你就準備挨打，挨斗吧！縱使你沒有任何罪（請參考牆上那些申冤書）可以証實。

⑤ 請參考各報上的發言，和前幾天報上的新聞記者的四個等級的區別。

好！够了！大家自己想想看，自己日常生活周圍吧！只要你頭腦還不是空虛到無一所有，你會找到更多的例証的，至於那些想否定這些的人，他有不可告人的隱私，正如資產階級不敢承認資產階級社會有階級一樣，那是由於他的……而決定的。

在解放前和解放後初期，在思想上人的類型的這種劃分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逐漸的由於有了物質經濟基礎於是“向上的心”就鼓勵著產生了一批鑽營吹捧，拍馬屁的，看臉色的積極分子，打擊別人，在小師上作威作福的人（三好學生）雖不見得是白痴，但也只有凡事乖乖聽話，正如胡適所說的，任人打扮的千嬌百媚的姑娘才行的。

他們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古語云：“好利之心，人皆有之”上升到了一個高的等級，就有着許多的特權和物質利益在引誘呀！

譬如留學吧！不就更進一步嗎？這種心情不值得“憐憫”和“同情”嗎？

听听那種似乎正經的所謂“爭取政治生命”的飯碗的呼聲吧！當然要是真有願為共產主義建設貢獻一生願望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但是在這種呼聲後面，人們可以嗅到更多的是米飯和肉湯的香味！我是學××和××的！我好是第×個等級的分子，即使畢業了那有些什麼來保障我的胃的要求和這個要求的進一步的提高呢？還是就加入到謀求等級轉變者的行列中去吧！千万為革命牺牲的烈士，將會為此在九泉下哭泣。

有些人平常大叫發揚五四精神，可是當青年們真正拿起火炬的時候，就張皇失措了，叫什麼不和風細雨呀！赶快拿出反黨反革命的帽子來扣了呀！以及批評“是時候了，”的那首馬雅可夫斯基式詩的作者們之流，讀者們！用上面我所揭露的“人種論”去分析一下，就會揭露它們為什麼會“如此”的“等級”根源來了，本來嘛，這是不值得什麼大驚小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嘛！

本來我想用“……人的階級”這個標題，可是鑑於大批書呆子人民大學放出來的散毒的蜜蜂，正是專門來鑽這種縫的，為了不作無味的爭論，我改了一個名詞，反正事實總是事實，至於那批毒蜂的教條主義，大家在政治課上已領略够了，

譬如大家就知道“馬列主義”的一位教師王××，就是以有名的公式：“苏联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造的原子弹会长翅膀，而美国由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所以原子弹長不出翅膀”。深刻地闡述了社会主义的無比优越而著名的，好，就到此結束吧，不过我要公开宣布，本文我不署名，是不是不負責任呢！不，这里面还有一个微妙之处，古語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大家還知道我校有个人事室吧！那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屬於你自己的口袋，專門記錄尊座的行为的，而且是你自己不允許知道的，对于国家安全必需的档案制度，我並不反对，但是过去已有过屡見不鮮的例子，由于尊名上加上黑点于是你就从第几可靠等級降到了第 M>N可靠等級，將來我在前面談过的那些东西，就会跟着你屁股轉，够你一生慢慢享用了。

所以这点請大家原諒，求生之心，何人不有呢？至于“無階級社會中的等級（或階級）这个問題的产生是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联系或者会存在多久的問題，可以讓書呆子們去爭論，反正“有”不会因为說沒有而变成沒有，“沒有”不会因为說“有”而变成就有的，反正（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

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

有名不具，請恕不周

談談

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右派反動言論參考資料索引

一、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1. 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立場問題

- 烏“畫”嘴 徐仲年 (1—2)
如此技倆 陳奉孝 (3—4)
我對目前形勢的看法 譚天榮 (7—8)
論“五一九”——現階段馬克思主義啓蒙運動與初步批判“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龍英華 (9—12)
我認為階級分析方法已經過時了 張祖榮 (15—16)
三個問題 徐中玉 (42—47)
對經過几陣“暴風雨”的看法 陳新桂 (47)
馬哲民的反社会主义言論 (54—56)
黨已面臨危機的時候了 王德周 (56—57)
黨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 黃紹竑 (62—64)
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儲安平 (64—65)
不要共產黨領導，人民也不會卖國 葛佩琦 (65—66)
陳振漢在經濟科學座談会上的發言 (87—90)
要求共產黨第二次解放中國人民 劉地生 (90—91)
羣眾要推翻共產黨 葛佩琦 (91)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蕭乾 (97—102)
自由主義者宣言 严仲強 (110—111)
墓誌銘 張元勳、沈澤宜 (116—116)
人之歌 張元勳、沈澤宜 (118)
大膽向黨和黨員提意見 黃繼忠 (131—134)
論社会主义社會的階級鬥爭 九卓恒 (140—155)
我對目前局勢的看法 周大覺 (185—188)
論“階級”的發展 錢如平(談論) (188—191)
再論“階級”的發展 錢如平(談論) (191—193)
談談無階級社會中的人的等級 沈迪克(談談) (194—196)
2. 民主與專政、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
- 關於人性與階級性 譚天榮 (16—17)

- 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龙英华（130—131）
 宪法有的被徹底破坏，有的有名無实…………顧執中（139—140）
 論現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蔣興仁（165—167）
 反正一样…………蔣興仁（167）
 这是为了反对三害…………譚天榮（180—181）
 論美國民主与我国現行民主立比較的优越性……蔣興仁（181—182）
 人民日报为广大人民服务，还是为个别統治者服务……………
 ………………蔣興仁（182—183）

-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王國乡（183—184）
 論“階級”的發展……………錢如平（談論）（191）

3. 社會主義制度

- 我們对于当前經濟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第一稿原稿）……………
 ………………陳振漢等（74—78）
 我們对于当前經濟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第二稿）……………
 ………………陳振漢等（79—87）
 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譚天榮（106—108）
 論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氣三一羣同學（112—114）
 世界何处去，中国何处去，北大何处去？……………龍英華（130—131）
 新“九品”釋……………朱承立（135）
 無产阶级專政是产生三大主义根源……………陳新桂（138—139）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陳愛文、江文（156）
 三害根源……………張錫鏡（163—165）
 我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周大覺（185—188）
 再論“階級的發展”……………錢如平（談論）（191—193）
 談談無阶级社会中的人的等級……………沈迪克（談談）（194—196）

二、肅反問題

- 关于成立“平反委員会”的發言……………羅隆基（18—19）
 肅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汪長風（20）
 白毛女伸冤……………劉奇弟（48—49）
 胡風絕不是反革命……………劉奇弟（50）
 肅反問題……………張錫鏡（51）
 肅反問題論綱
 ——与党委前書記史夢蘭同志商榷……………江文（52—53）

馬哲民的反社会主义言論	(55)
党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号施令	黃紹竑 (62—64)
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	葛佩琦 (65—66)
宪法有的被徹底破坏，有的有名無实	顧執中 (139—140)

三、農業合作化問題

党已經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	王德周 (56—57)
胡稼胎在西語系英法教研室座談会上的發言	(57)
胡稼胎在西語系教師兩次大会上的發言	(58)
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	葛佩琦 (65—66)
在經濟科学座談会上的兩次發言	陳振汉 (87—90)

四、工商業者問題

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获的收入	章乃器 (21—22)
重申贖买廿年的主張	李康年 (22)
为什么还要把阶级关系和兩面性抓住不变	畢鳴岐 (26—32)
怎样看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學習什么	吳金萃 (32—38)

五、知識分子問題

加强党与非党知識分子的团结	羅隆基 (38—42)
利己主义者原理	王存心 (171—178)
利己主义者宣言	氣三一羣同學 (178—179)
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	叶篤義 (70)
关于科学体制問題座談会的發言	費孝通 (71—74)
我們对于当前經濟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第一稿原稿） 陳振汉等 (74—78)
我們对于当前經濟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第二稿） 陳振汉等 (79—87)
在經濟科学座談会上的兩次發言	陳振汉 (87—90)

六、少數民族問題

反苏謬論	龍云 (70)
------	---------

七、統籌兼顧，适当安排

陳振汉在經濟科学座談会上的發言	陳振汉 (87—90)
-----------------	-------------

- “才”与“德” 施蟄存 (104—105)
 关于科学体制問題座談会的發言 費孝通 (71—74)

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 馬列主義的思想領導

- 关于科学体制問題座談会的發言 費孝通 (71—74)
 我們对于当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 (第一稿原稿)
 陈振汉等 (74—78)
 我們对于当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 (第二稿)
 陈振汉 (79—87)
 在經濟科學座談会上的兩次發言 陈振汉等 (87—90)
 馬列主義停留在 1895 年的地方 雷海宗 (102—104)
 一株毒草 譚天榮 (105—106)
 教條主義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譚天榮 (106—108)
 自由主义者宣言 严仲强 (110—111)
 世界何处去，中国何处去，北大何处去？ 龙英华 (128—130)
 关于社会学，說几句話 (摘要) 費孝通 (135—137)

2. 党的領導

- 第四株毒草 譚天榮 (4—7)
 党已面临危机的时候了 王德周 (56—57)
 关于成立政治設計院的發言 章伯鈞 (60)
 党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号施令 黃紹竑 (62—64)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見 儲安平 (64—65)
 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 葛佩琦 (65—66)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

民盟“科学规划問題”临时研究組 (66—69)

- 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 叶篤义 (70)
 如果学校無党派关系矛盾也就少 叶篤义 (70—71)
 关于科学体制問題座談会的發言 費孝通 (71—74)
 我們对于当前經濟工作的一些意見 陈振汉等 (79—84)
 陈振汉在經濟科學座談会上的發言 陈振汉 (86—90)
 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 划地生 (90—91)
 羣众要推翻共产党 葛佩琦 (91)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蕭乾 (97—102)

- “才”与“德” 施蟄存 (104—105)
談党的领导 王存心 (112)
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 蔣興仁 (114—113)
論党天下 蔣興仁 (115—116)
人之歌 張元勳、沈澤宜 (118)
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見 黃繼忠 (132—134)

九、关于少數人鬧事

- 是时候了 張元勳、沈澤宜 (8—9)